

炎黄春秋

第 **9** 期
2007年

从苏东剧变看什么是社会主义

李锐：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

于光远素描 （龚育之遗稿）

我在“三线”亲历文革

美方档案揭示的“八一七公报”

目 录

求实篇

- 1 从苏东剧变看什么是社会主义……………林蕴晖

亲历记

- 7 于光远素描——我的第三个上级……………龚育之(遗稿)
- 14 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访沈宝祥教授……………郭宇宽
- 18 我在“三线”亲历文革……………胡 阵

春秋笔

- 25 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李 锐
- 28 美方档案揭示的“八一七公报”……………高 崢(美)
- 31 任鸿隽“科学”理念的社会意义……………张绪山

一家言

- 34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资中筠
- 37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章立凡

怀人篇

- 39 孙冶方的“最小最大”公式……………冒天启
- 41 我的校长李品珍……………胡竞成
- 45 怀念父亲李宇超……………李晓光

文坛事

- 50 萧军与毛泽东……………张毓茂
- 57 鲁迅的一世纪……………朱 正

海外事

- 64 “真空罩”下:1920—30年代的苏联……………金 雁

往事录

- 67 莲花峰“七勇士”……………张天来
- 70 汤恩伯与南口战役……………吴家林
- 72 中条山战役引发的“笔墨交锋”……………王 鹏

故纸堆

- 74 涉及吴奚如平反的几封信……………李向东

古今谈

- 77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今谈……………官伟勋

编读窗

- 80 对《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的补正……………李 鹏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杜导正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 社 长: 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执 行 主 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阁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 5.80元

本期执行主编 徐庆全

从苏东剧变看什么是社会主义

林蕴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先后倒台。曾被认为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突然间发生这种多米诺现象,人们对其原因见仁见智。历史地看,这与最初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有着直接的关联呢?

一个老共产党人的反思

1989年冬,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日夫科夫对社会主义在本国的失败有过如下反省^{注1}。

日夫科夫说:我们有个弱点,就是记载下来的巨大成就有时压抑了我们总结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从而使我们对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势下,事情已变得越来越清楚,失却这种新的方法不仅使我们面临困难,而且使我们面临对社会主义本身命运攸关的非此即彼的抉择。后来我用一句短语表达它:“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那时,我并不完全清楚,社会主义的哪些地方需要改变。或者说,是应该改变还是更换。

接着,日夫科夫回忆了1987年5月在北京同邓小平会见时的谈话。他回忆说:

我在北京同邓小平谈话时谈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困难,从而也谈到了社会主义的命运。邓小平在谈中国发生的事件和过程时,像是要总结他说过的话,并提醒我注意一件他显然认为特别重要的事,说:“现在我正准备去见马克思。”

我很清楚,邓小平在谈话中插入这句话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也不是提醒我注意他已年迈,或者想暗示他的历史作用。他是在说自己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对未来的责任。他是在讲述一个为社会主义贡献一生的领导人的责任。对邓小平来说,“见”马克思意味着要对如何解决他的伟大国家的问题、如何克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扭曲和颠倒、新社会如何解决人的问题作出总结。

我一边听着邓小平讲话,一边在眼前幻化出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由此,日夫科夫不无遗憾地说: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社会主义的垮台,源于它最初建立的原则。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总结。



“8·19”事件中,坦克开上了莫斯科街头

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

什么是原有社会主义各国“最初建立的原则”呢？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曾有过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把理想变成实践的首先是列宁。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先后提出过两种不同的过渡战略:一是1920年前的军事共产主义;二是新经济政策。前者要求一举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私有制,由国家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统一管理;后者则允许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在国家监督下存在和发展,以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必备的物质技术基础。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到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过渡时期学说的重大修正,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也是逐步发展着的。最初,他曾经提出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在1923年的《论合作制》中,列宁明确阐明:“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注2}在联共党内,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本来就有不同,列宁逝世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城乡资本主义的活跃,斯大林认为退却已到了终点,该是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时候了;布哈林则坚持沿着新经济政策继续前进。事情

的发展是,布哈林的“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我们恰恰是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关于农业社会化的道路、关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等问题的正确主张被扭曲,并被打成“富农代言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以至“人民公敌”。

从此,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布哈林所作的政治结论,就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对持与布哈林相仿观点人的政治坐标。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以及不同党内机会主义集团作斗争并把他们打垮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注3},也被认为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共同规律,成为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人遵循的经典。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构成完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中央统一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以上构成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典模式。

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过去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各国,无一不是高投入低效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所导致的是短缺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为专人民的政。苏联和东欧各国,在政治上哪一家不是历史欠账太多,没有民主自由;经济上物资短缺,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

善。

走不出死胡同的苏东改革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针对多年积累的矛盾,苏联和东欧各国先后起步进行改革。

(一) 在政治和经济全面提出改革纲领的,首推匈牙利。

由拉科西为首的匈牙利领导集团在国内强制推行苏联模式,也危机四伏。在苏共中央的干预下,曾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纳吉·伊姆雷被恢复名誉,并被推举为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纳吉力图纠正拉科西照搬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夸大阶级斗争和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等错误,强调要发展人民民主,应遵循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列宁主义学说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掌权的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小生产者农民基于商品交换的经济联合的基础上,旨在实现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成社会主义的政策。为了实现后者,甚至也要利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因素,即不是直接通过产品交换,不是不要市场和回避市场,而是利用市场和通过市场战胜资本主义因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纳吉认为,“害怕自由市场,害怕农民经济的发展,害怕由于新经济政策而引起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复活,……这是极端‘左’倾的农业政策的代表者的特点,他们宁可倾向于某种‘军事共产主义’,也不倾向于一个正确地形成和被正确执行的新经济政策。用列宁的话来说,‘左’派最危险的错误是,‘把自己的愿望……当作了客观现实’。”^{注4}

纳吉的主张,无疑触到了苏联模式的要害。因而,引起恐惧资本主义的拉科西集团和苏共领导人的不满。1955年3月,在苏共领导人的支持下,纳吉再次被拉科西指责为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执行右倾路线,并被开除出匈党中央委员会,撤销一切职务。

(二) 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改革。

从贝利亚到赫鲁晓夫,首先是有限度地改正三十年代以来的冤假错案,削弱内务部门的超越法律的权力;强调加强集体领导。

赫鲁晓夫在经济上的改革措施:

在农业方面,主要是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制度,使集体农庄获得了对农业的经营自主权。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改变集体农庄的模式。他同样认为,集体农庄庄员自留地和饲养业的发展,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集体农庄市场的活跃将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的解体和产生新型的剥削分子。

在工业和建筑业方面,赫鲁晓夫主要是改革“条条”管理形式为“块块”管理形式;建立经济行政区;改进国家计划工作;扩大地方在经济管理中的权力。但是,这种分权措施并不能根本解决计划体制的弊端,只能形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

在计划和市场问题上,赫鲁晓夫更是含混不清。1962年9月,哈尔科夫工程学院教授叶·利别尔曼发表《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提出要以“经济手段(利润、奖金、价格、货币等)”代替“行政手段”来刺激企业的生产,把奖金直接同企业的利润和赢利联系起来,根据赢利率来评价企业的工作,“赢利率越高,奖金也就越多”。利别尔曼的主张,引起了苏联经济学界的一场大讨论。讨论由如何使企业关心最大的生产效果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方法等问题。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苏共中央决定采纳这些建议进行试验。但是,无论是利别尔曼的建议,还是赫鲁晓夫的试验,其基本倾向在于改进苏联的计划经济,远不是要将苏联经济引向市场经济。

可见,赫鲁晓夫的改革,从根本上说,只是在原有模式的框架内搞修补,并没有认识要改变原有体制的模式。对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有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注5}

(三)“布拉格之春”的夭折。

1968年春,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史称

“布拉格之春”事件。“布拉格之春”的实质是什么？事件当事人之一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实际上是一场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中欧和东欧的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头上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的危机。这种模式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实和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它导致了政治、经济和道德危机。“布拉格之春”是试图在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来解决这场危机的尝试。^{注6}

当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以下的改革设想^{注7}。政治方面：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在强调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同时，主张不要以党代政。党不是通过统治社会的方式，而是通过最忠诚地为社会自由、进步的发展而服务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用。二、发扬党内民主。三、发扬社会民主，要确保公民拥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和权利。四、强调民族阵线的作用。民族阵线要以马列主义观念作为政治领导的观念。各政党都是伙伴，不分为执政党和反对党，不同观点和争论通过政治协商解决。五、工会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捍卫工人和劳动人民就业和劳动的利益。经济方面：一、扩大企业的权限。企业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领导，有权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管理。二、成立工厂委员会，作为企业领导机构的直接组成部分。三、提倡生产和贸易组织可以搞多种多样的结构，允许“小型社会主义企业”的发展。四、取消外贸垄断。生产和贸易企业有权选择进出口机构进行外贸，也有权进行独立的外贸活动。国家将根据市场情况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五、农业合作社将完全独立进行经营，也有权经营其他业务，也可以直接向居民和零售商业网点出售部分农产品。外交方面：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

这个行动纲领的突出之处，是触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方式，提出了要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体制。莫斯科认为，杜布切克等捷共新领导的这个纲领，不只是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背叛，而且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于是，1968年8月20日苏联出兵占领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在他所著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对苏联领导人当时所以作出如此决策作了如下分析：除了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虚假报道和不真实的描绘之外，在这种致命的决策中起巨大作用的还有其他一些

因素。其中之一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任何背离你自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就等于是背叛，是犯罪。我想，勃列日涅夫是赞同这些模式的，并使自己确信：如果不干预事态的进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或至少是会损害自己作为苏共和苏联领导人的地位。”^{注8}可见，“布拉格之春”的天折，完全是苏共领导人维护斯大林模式的牺牲品。

（四）卡达尔也难越雷池。

卡达尔是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开始主政的。他在整顿秩序和稳定政权的同时，就将经济改革的问题提上日程，并于1957年开始迈出改革步子：一、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缩小由中央直接分配的产品范围；实行企业利润分红制；授予少数企业进行自主的外贸活动权。二、允许发展小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并用各种优惠鼓励私人小手工业的发展。三、在农业政策方面废除农产品义务交售制，代之以基于合同制的国家自由收购制度。^{注9}

1965年11月，匈党中央进一步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指导原则的决议^{注10}，开始了引进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改革。1966年5月匈党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注11}。确定：一、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同时，作为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民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以利于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二、国家仍是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组织各项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必须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三、为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可以让企业经营单位自主地制定计划。国家用贸易制度来代替由官方统配原料和产品的做法，充分利用受计划和调节手段控制的市场机制，把“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相结合，把利润作为中心，并运用价格、利润、税收、工资、奖金、利率等工具调节企业的活动，使企业生产适应国民经济计划的运转轨道，更好地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活动服务。在经过一段实践之后，1968年全面改革开始出台。卡达尔当时指出，经济改革的实质是：通过经济调节手段、工厂自主经营以及劳动集

体和劳动者个人的物质利益，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营。^{注12}

从六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计划和市场就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正当1968年匈牙利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遇上了苏联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事件。不久，苏联报刊指责匈的发展是“违背了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原则”，“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要匈来个“方向性的转变”；同时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加以批判，向匈施加压力。民主德国对匈的改革展开了公开论战。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领导批评卡达尔“搞西化”，经济机构正在脱离党的领导，敦促匈立即“刹车”。与之同时，匈党内部的争论也趋激化。在此情况下，卡达尔不得不谨慎从事。他在捷克事件5年后说过，这一事件对匈的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他因此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迈步，从而失去了许多时机。

由于卡达尔等领导人囿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框架，把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当成社会主义的固有本质；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始终无法从原有模式中突破出来。因此，到八十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开始滑坡，增长率下降，每年只在1%上下浮动。政府不得不用大量的财政补贴来维持居民的生活消费，这类补贴占每年国民总收入的32—35%以上；同时，又错误地将大量资金用于去拯救经营不善的企业（八十年代起，政府每年都得拿2000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结果，不仅没有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整个国民经济陷入绝境。^{注13}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危机。这就是何以在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冲击下，匈党内部思想发生混乱，以致最终倒台的原因。



叶利钦在办公

以上表明：苏东各国起步改革的时间虽早，但谁也无从摆脱原有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每一步改革碰到问题正如日夫科夫所说：“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因此，谁也无法走出斯大林的死胡同。

邓小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历史功勋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这对批了几十年修正主义的老一代领导人来说，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他向人们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14}又说，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注15}

贯穿苏东改革几十年姓“社”姓“资”的争论，最根本的还是守着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公式——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统治。1989年开始出现的多米诺效应，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相继亡党亡国，正是原有制度丧失活力而导致灭亡的反映。不然，如何解释，经过几十年共产党教育的人民大众，居然不再要这种社会主义，而会选择资本主义呢？这个历史现象，不正好说明这种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吗？

由鉴于此，邓小平指出，姓“资”还是姓“社”的

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16}这就是说,不能按一个先验的模式去判断什么姓“资”还是姓“社”;而要看其是否利国利民的实际结果。

建国后三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教训正在于此。由于强行按那种违背规律的主观意志去建设社会主义,必然只能靠行政命令去推行,实行强迫以至采取镇压的手段;为使人民顺从,必然制造个人迷信,用领袖的“权威”来驾驭局势;为了统一意志,就要搞“舆论一律”,不允许新闻和言论自由;为了统治的稳定,就不能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并使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专人民的政。

以三个有利于的原则建设社会主义,就不只是经济上从所有制、分配方式、资源配置方式应该遵循这三条原则继续改革开放;而且在政治体制方面,也应遵循这个原则进行改革,因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人的解放。邓小平就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他还曾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邓小平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强调了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但他并没有给尔后的什么“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画蓝图、划框框。而是给后人的实践留下无限的空间。

总之,社会主义只能是遵循三个有利原则进行实践的产物,既不可能是先验的固定模式,也不能是逻辑的产物。

(责任编辑 萧 徐)

注1 [保]托多尔·日夫科夫著:《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226—227、228—229页。

注2 列宁:《论合作制》,1923年1月6日。《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7页。

注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7月版,第330、395—396页。

注4 纳吉·伊姆雷著:《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第219、225页。

注5 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10页。

注6 [捷]伊日·贝利康著:《永无止境的春天——一个布拉格共产党人的回忆》北京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99—200页。

注7 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521—525页。

注8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88页。

注9 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34—135页。

注10 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163—165页。

注11 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166—169页。

注12 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186页。

注13 所引数字见阚思静著:《卡达尔与匈牙利》,第12、251页。据前民主德国最后一届政府——莫德罗政府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克里斯塔·卢夫特说:70年代,国内的消费增长比本国生产的增长还要快。社会福利政策所需金额的相当大一部分是靠向所谓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借日益多的外汇来提供的。1989年11月任职时,她所知道的外汇总额为100亿美元。其中由西德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筹划的两笔金额各为10亿西德马克的“自由财政贷款”。[德]克里斯塔·卢夫特著:《最后的华尔兹——德国统一的回顾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61—62页。日夫科夫曾说:“民主德国是当时我们常开玩笑说的‘尽管居民生活水平高,但还吃着两头母牛的奶的国家(从经互会和通过与联邦德国的特殊关系从共同市场)”。《日夫科夫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237页

注1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

注1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注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更 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刊出的《我是怎样被“补”成右派的》一文有两处排错。第59页右栏第2行“战友陈念橡”,应为“战友陈念棣”;第60页右栏14行“1987年11月”,应为“1978年11月”

季 音

于光远素描

——我的第三个上级

龚育之（遗稿）

本文是育之的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今年二月，他说要写一篇描述于光远的长处和特点的文章，作为对《祝于光远九十寿》一文的补充，因为“祝寿”文只概述了于老的工作和贡献。二月二十三日，他写出一个题为《于光远琐记》的提纲，接着就断断续续地口述文章内容，由我作记录。其间，经历了两次病危。四月下旬起病情逐渐平稳，但是每天要躺在床上做“血滤”八至十个小时，口述很难进行。他寄希望于病情好转，每次只透析四小时以后，仍然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一段一段仔细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并把文章的副题改为《于光远素描》。然而他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现在文章的开头和第一、二段给他朗读了三、四遍经他亲自修改过，其余大部分给他读过。文中的小标题大都采用了他提纲中的话，提纲中还写有“干校”等，但他没有来得及向我讲述，只能付缺。

——孙小礼

2007年6月26日整理成稿，7月8日定稿

我的第一个上级是赵^①，第二个上级是秦川，第三个就是于光远了。一九五四年中宣部单独建立科学处，由胡绳和于光远任正副处长，但胡绳是中宣部副秘书长来兼处长，并不能常来管事，常在科学处的是光远。一九五五年胡绳调走，光远成为处长，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中宣部被砸烂。所以，光远是我在中宣部里长达十二年的直接上级。

初识

建国初期，于光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很有名气，他是中宣部理论教育处的副处长（处长空缺。这里顺便说明一下，当时中宣部是部处两级设置，不设局），又是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的总编辑。一九五一年的一天，他到清华大学来，找学生中的一些党员干部开座谈会，理学院支部是何祚庥、罗劲柏、胡则维、我和孙小礼等几位党员去参加了。何祚庥侃侃而谈，他至今说，他记得自己提出了自然科学阶级性的问题。别的与会者也七嘴八舌，各抒己见。说些什么我可全都记不得了，但记得讨论中于光远忽然问道：“你们这里有谁看过《学习》初级版吗？”

全场哑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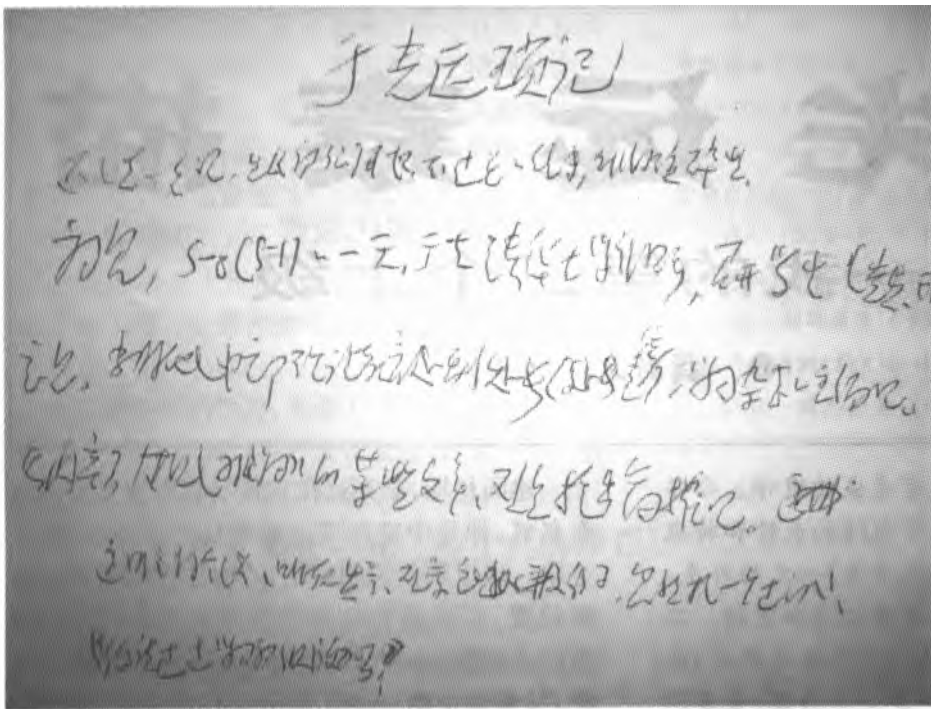
《学习》初级版是附属于《学习》杂志的一个小型刊物，大学生们以为是给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或者初中学生读的，所以一般都不看。

接着，于光远说了一篇话：大学生要学习政治常识和经济建设常识，基本常识学好了，理论才能钻得深。当时《政治常识读本》正在《学习》初级版上连载（以后还刊载过《经济建设常识读本》）。

于光远的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这恐怕不能说是一种广告词，而是他这位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又做了十几年理论宣传工作的老干部，根据自身的真切体会对当时的党员大学生的中肯赠言。

选兵和练兵

于光远到清华来开座谈会，单纯是为了了解大学生的理论学习状况吗？我一直觉得还有为



龚育之写作本文的手迹

中宣部选兵的目的。当年何祚庥一毕业，就被调到中宣部理论宣传处，成为了光远的部下。第二年，我和罗劲柏也被调到中宣部。我想这与光远那次到清华去考察不无关系。

光远的一大长处是善于选兵，他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在科学处聚集了一批年轻人，年轻，就比较有朝气。

光远在中宣部负责联系科学工作应属最佳人选，因为，他从名牌大学物理系正规毕业，又有从“一二·九”到延安的革命经历，这样的人不容易找。但是光远自己却不愿意，他说，他从自然科学转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已经十多年了，再转回到自然科学，弯子太大了。可是，一九五四年以后情况变了，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样，光远就顺理成章地到了科学处。

中宣部科学处对于光远来说，确实是很合适的工作岗位，而我们这些年轻人被他选到科学处来，则关系到今后的方向、道路和前景，是关乎一辈子的大事。我们本来都是准备从事自然科学专业工作，期望在专业上有所作为，乃至大有作为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时年轻人能到

党中央机关工作，好像很光荣，很神气，但是又什么都不是，没有职称，没有学衔，怎样发展自己呢？我们也想把自己培养成于光远那样“学贯两科”，既懂自然科学又懂社会科学的新型干部，近学其师，又谈何容易。他们老党员经历过的历史、条件，我们是不可能再经历的。

于光远善于选兵，也善于练兵。对于科学处里的这批年轻人，他很理解、很关心、很开明，很注意对我们的训练和培养。

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原来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应是第一位的。这一点于光远是毫不含糊的。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当所谓行政干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重视实践中练兵、参与中练兵、民主练兵。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比如，一九五四年党中央对中国科学院的两次报告作批示，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于光远也让我们去参加。

于光远从不以权威自居，做任何工作，都不是处长一拍板作了决定，干事们只是去执行。他经常召开会议，发扬民主，和我们年轻人平等地讨论问题，甚至热烈争论，要每个人都充分发表意见。他也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有时经过讨论，他会改变或修正原来的决定。

于光远勤奋过人，无日无夜地学习、思考和工作。他的床头总挂着铅笔和纸片，夜里想到什么就随手记下来，以免忘记。他常在晚上召集我们开会，集思广益，讨论问题。有时一直讨论到深更半夜，他困倦了，大家都困倦了，他就在会议室里睡一下，也让我们休息一会儿。他打个盹之后，再接着和我们讨论。

他不但督促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注重学习哲学和自然辩证法，训练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而且还要我们在专业方面继续加深学习。对于专业知识，光是大学毕业是不够的，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这对我就更加突出，我只读到大学化学系三年级。于光远给我们每周两天时间，分别到科学院各相关的研究所去进修。我去的是原子物理研究所，由郭挺章研究员指导我学习量子化学。为此，我同时自己补习高等数学、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放射化学，还参加翻译了苏联的同位素化学教科书。

那时，我的身体很不好，患慢性肾炎，浮肿无力，但是工作还是干得很起劲，在学习方面自我要求也很高，既要努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希望拓宽专业知识，从化学到物理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我处在四个边缘：健康和工作的边缘、学习和工作的边缘、物理和化学的边缘、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我感到有压力，也有烦恼。于光远理解我们，总是给予我们鼓励，想办法使我们得到锻炼和提高。作为处长，他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何祚庥分配到中宣部工作，虽说是联系中国科学院，没有完全脱离专业，毕竟跟专门从事自然科学专业研究有所不同。何祚庥当然服从党的需要和调配，但是，他从来执着于物理专业。记得他在清华大学当理学院党支部书记时，工作很忙，但物理功课仍然抓得很紧。在食堂排队买菜，他还拿着厚厚一本《原子物理学》的俄文原著在啃，同学们笑话他，他也不在意。他到中宣部后，很早就向部领导和处领导提出了他的愿望：在中宣部工作几年后，请允许他回到自然科学专业研究的岗位上。领导开明，都表示同意。在科学处，何祚庥是很得力的一位年轻干部，但他一再要求领导实现对他的承诺。一九五六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于光远以及部领导终于点头，使何祚庥如愿以偿，年底就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去从事专业研究了。

顺便说一下，何祚庥一九五一年到中宣部，正好赶上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他学识比较广博，又能说会道，主意也多，并有地下党和党支

部书记的经历，所以一下子就给他定为十八级了。我和罗劲柏一九五二年到中宣部，没能进入这一门槛，而是按照大学毕业生的“统一价格”，定为二十一级。一九五四年评级的时候，于光远说：“龚育之的级别太低了。”于是给我提了两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揭发：中宣部的各个处，为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都在准备提副处长，龚育之受于光远重用，连提两级，是准备提名做副处长的。对于提副处长这件事，后来光远回忆说，其实他当时虽然觉得龚也不错，但认为科学处首先应考虑的正处长人选是李佩珊。

批判与建设

在科学处，遇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事，于光远虽然不能不说些应景的话，但他是从来不感兴趣的。关于这一点，我想至少有以下两个事例可以说明。

一九五四年，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编选出了八个文集。当时我也想凑个热闹，写篇文章，去同于光远商量。他则不以为然，对我说：“你再写一篇，无非是给这八个集子再增加一篇。我们还是做一些研究工作吧！”于是，他就同我商讨起怎样编写《论科学提纲》，这个提纲是准备和科学处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研究以后编写的。这件事虽然因为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而没有做成，但是开了一个头，还保存下来一个底稿。

一九六四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宣部组织了好几个工作组分别派到有关单位去。去孙冶方为所长的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组，他请科学处副处长林润青担任组长。对孙冶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批判，作为处长的于光远则置身事外，没有参与。

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那半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以后，影响很大。于光远到医院看病，医生一看到病历本上的名字是于光远，就立刻说：“我们读过你的《政治经济学》，后半本什么时候出版呀？”但是后半本，即社会主义部分却迟迟没有写出来。光远从来不愿意利用别人的已有成果拼凑成书，他希望在自己有了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才

撰写后半本《政治经济学》。为了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于光远热衷于找一些人在他身边，同他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他曾发起“周四座谈会”，联系实际讨论经济方面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地点就在沙滩中宣部大院里的教育楼。可以说，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他探索了一辈子，讨论了一辈子，撰写了一辈子！然而在“文革”中，于光远却成为经济学界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一。

通达和稳重

于光远平时不管机关党的工作，但是政治运动来了，作为处长，他也不能不过问。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中，全国各机关都清理内部的暗藏反革命。我们科学处一位同志的弟弟在另外一个机关工作，被怀疑是暗藏的反革命。那个机关决定对其弟弟隔离审查，同时要求我们机关配合，叫这位同志在其弟弟隔离审查期间不得去看望。

有一天，那个机关向我们反映：这位同志去看过弟弟，要我们了解一下情况。于是，我和罗劲柏受党支部的指派，向这位同志盘问。不料这位同志竟谎说是到医院看病去了，没有去看弟弟；在我们一再追问下，才承认自己只是顺便去看了看弟弟，没有说什么。我们认为这位同志“不老实”，并把这个问题向光远作了报告。光远却轻描淡写地说：“关心自己的弟弟，去看望一下，这是人之常情。我看算不了什么问题，不必抓住不放。”这番话，使我们脑子开了窍，转变了思路和态度，不再把这件事当作什么问题。

肃反运动中还发生过一件事。外单位有人揭发说：有一个很大的反革命集团，其人员分藏在好多个机关，包括中宣部科学处。当时由一个大的机关主持这一大案的调查，凡有该集团成员的单位都派人去协助工作。于光远把我派去了，他向我交待说：“你去，就是听一听。”主持调查的机关对于追查这个集团的劲头很大，但是我听来听去，不过是一群在敌伪占领时期的大、中学生，他们苦闷，他们求友，他们也萌发着青春时期的爱情，经常结伴到西山去游玩。他们之中有人向往延安，甚至去过延安；有人向往重

庆，甚至去过重庆……如此而已，算不上什么反革命活动，说不上什么反动集团。这样，在我们科学处，就始终没有把怀疑某人是反动集团成员的事提出来，更没有要求本人作交待。

三年前，这位同志去世了。在于光远发起的追思会上，我才第一次把这件事情说了出来。此前，科学处的同事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肃反中的这两件事，使我深感于光远的通达和稳重。正是他的这种通达和稳重，使科学处的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保护。

要反复讲科学重要

于光远说，中宣部专设一个科学处，我们科学处就要宣传两条，第一条是宣传科学重要，要反反复复地讲科学的重要性，因为党内还有很多人不懂得科学的重要；第二条就是要讲办事的科学性，也要反反复复地强调办事要讲科学。

一九五六年开党的八大，这是建国以后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隆重。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国民经济建设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报告。有上百人作了大会发言和书面发言。于光远就是在大会上发言的一个。大会发言不仅要印发，还要在报纸上刊登，影响是很大的。当时，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等人为什么都推举于光远在大会上发言呢？一方面是由于中宣部科学处代表党的机构，另一方面是于光远有管理科学工作的历史背景，联系科学界的时间也比较长。记得他的发言主要是发挥了他认为科学处要反复讲的那两条，还讲了党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怎样贯彻双百方针，党的干部怎样由外行变成内行等等。通过八大发言，于光远就成为了人们公认的党联系科学界的代表人物。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于光远曾写过文章帮着鼓吹小麦高产，他后来觉得这是作为科学处长一件丢脸的事。他还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过一个省委报告下面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长得多么多么大的事情，而事先没有核实，这也是一件丢脸的事。这两件事是他反省自己作为科学处长不科学，只记得“相信群众相信党”，忘记了相

信科学,而当了弄虚作假的传声筒的例子。这些事他在科学处里讲过,后来还公开写过文章。他不但要自己记取教训,还要人们都记取教训。

整风反右中的科学处

一九五七年整风,光远派我们下去听意见,即到科学院和大学去听意见,这样就产生了中宣部《宣教动态》登载的傅鹰的那两次发言,引起毛泽东注意的那两篇批示。主要由于这两篇批示,傅鹰受到了保护,没有被划为右派。可惜中宣部的这个反映和毛泽东的两次直接讲到傅鹰的批示,没有能够在实践中起到保护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宣部并不管科学院的反右,中宣部内部的反右主要也是机关党委干部负责,当然行政负责人也不能不管。

科学处划了三个右派,一位学物理的大学生,一位学哲学的大学生,一位学工程的中专生。可能迫于当时的形势和于光远本人的困难处境,他没有能够像过去那样保护这三位年轻人。

我没有想到,当时提倡鸣放就是为了“钓鱼”;我的确参加过一次为了“钓鱼”的鸣放会。大约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下旬,上面已经决定反右,但没有往下部署,说是“光阴一刻值千金”,赶紧让那些右派言论放出来好反击。于是,中宣部机关在六月五日召开了一次鸣放会,主题是“等级和特权”,这是当时社会上

也是机关里的热门话题。部领导同志都没有参加,由一位被交了底的中层干部主持,参加的都是年轻干部。我和罗劲柏商量作一个联合发言,由我在会上讲。我们无非是讲要注意干群生活差别呀,批评现行工资制度呀,要研究巴黎公社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呀……会上的所有发言当即被整理成大字报公布,后来还编入中宣部机关的一本《言论集》。因为有这么一个编印本,我才得以保存了一份发言稿。现在重看,意见很天真、充满书生气,建议不切实际,要是观点错,恐怕主要还是“左”的错误。没有料到,这个发言转眼竟成为反右中的一个问题。反右时最大的案子是“章罗联盟”,我和罗劲柏的联合发言,在中宣部也被人们戏称为“龚罗联盟”。

于光远和钱

于光远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

他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他母亲每次都在回信中说明收到了多少钱。回信中所说的钱数总是少于他所寄出的钱数,原来是被那位服务员偷



1992年7月5日,本文作者(左)与于光远

偷克扣了。然而于光远却马马虎虎，竟从来没有觉察。

这位服务员是个小偷，而且是个惯偷，偷过很多人的钱。一次作案时，他被抓获了，并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可是于光远在回答法官的询问时，却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他的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钱。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于光远的这一轶事，在中宣部里很长时间都被传为笑谈。（这里，顺便坦白交待一下，在法庭上，那个服务员还供认：曾在龚育之挂在办公室的上衣口袋里偷过钱。而在此之前我也毫无察觉。）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也极大。他的稿费当然就特别多。稿费怎么用？那个时候时兴的方式是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有全部交，他留下一部分，以便自己来支配。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如，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中宣部机关幼儿园、中宣部建游泳池，他都是资助人之一。

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他是赞成两句话：既要“向前看”，也要“向钱看”；“向前看”是坚持方向，“向钱看”是重视生产，重视经济效益。至于他自己，对钱可是从来不在乎的。

农村“四清”中的于光远

一九六四年秋，我们都到北京郊区参加“四清”。于光远也去参加了农村“四清”，但他不隶属于由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挂帅的中宣部工作队，而属于刘少奇组织的“机动队”，蒋南翔是队长，他是副队长。机动队不固定在一个地方，于光远当时又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是副部级，可以坐着专车到各村转转看看。他不像我们那样

只在一个村子里蹲点搞“四清”，而是对了解农业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在农村大田生产中应用、推广农业技术的情况感兴趣。

“四清”时，于光远把两位帮他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教授送到我所蹲点的生产小队。两位教授把生产队的账目做了彻底清理。原来小队的会计自己总是交待不出两箱玻璃的去向，只好承认是自己贪污了。两位教授花了好几天功夫，终于把小会计的一笔烂账查得清清楚楚，证明他没有贪污这两箱玻璃。这件事，小会计满意，小队长满意，社员们也满意。为小会计澄清了两箱玻璃的事，使他极受感动，他主动坦白说，他曾经贪污过几斤芝麻。

大教授帮小会计查清了账目，当时被传为美谈。

这件小事也说明：搞“四清”，搞任何运动，都必须有科学的态度，绝不能搞“逼供信”。

“文革”之初的于光远

“文革”之初，因为“二月提纲”没有涉及于光远，所以他当时还比较轻松。我已经被点名批判，而且批判的来势很猛。

一天，中宣部组织大家去沙石峪参观那里“千人万担一亩田”的造田成就，顺带参观东陵。我已经是被揪出来的批斗对象，于光远还是要我一起去，大概是想解除一下我的紧张情绪吧！

在汽车里，于光远对我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再在中宣部工作很难了，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去吧！”

他不是抛弃我，而是安慰我、爱护我。然而他对形势的发展完全估计不足。不久，砸烂中宣部“阎王殿”，部长、副部长、处长、副处长，都被当作“阎王”、“判官”揪了出来，于光远自己也被揪出来了。不单涉及“二月提纲”，不单涉及“方求”文章，还涉及整个中宣部。连哲学所的造反派也来中宣部煽风点火，也来要我写交待和检查，也来揪斗我和于光远。有一次哲学所批斗于光远，还要我去陪斗。

记得于光远曾向人描述他的第一次挨斗，形容他被戴上高帽子的状态怎样可笑。看来他是故作轻松，其实他的心情是不可能轻松的。

强将手下无弱兵

很多人说中宣部的科学处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

于光远领导科学处，时间不过十二年，拿自然科学方面来说，人员不过十来个人，就有所谓“十来年，十来条枪”。他的部下，科学处的干事们，后来几乎个个都是不同岗位的得力骨干。

“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是光远爱说的一句话。在科学处，他为干部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环境，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他鼓励我们结合工作和专业进行研究和写作，支持我们开拓新的领域进行思考和探索。

党的十五大期间，我遇到明廷华，他也是光远领导下的科学处的干事。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在十五大的与会者中，从我们科学处出来的人竟有五个！”我倒没注意，问他，他扳着指头数，果然是：大会代表有三人：郑必坚、明廷华、龚育之；特邀列席代表有两人：于光远、林润青。郑必坚曾两任中央委员，林润青曾任中央候补委员。

科学处出了院士！

于光远是一九五六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第一批学部委员。

科学处还出了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

中宣部的干部要成为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专家自然不可能。但是从中宣部出来，到自然科学研究机关长期做专业研究，取得成就，则是可能的。何祚庥就是一个。

有人说，科学处人才多，“右派”也多。当年被划为“右派”的侯德彭后来相继任广西大学校长、广西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科委主任、教委主任，还担任过广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陈远在山东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科学处这些人后来的发展和当选，当然不全是由于在科学处做过工作，但在科学处做过工作，在于光远的领导下受过思想、理论和政治训练，这对后来的发展和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吧！我自己就深有这样的体会。

于光远的凝聚力

“文革”之后，拨乱反正，中宣部恢复了，成立了新的中宣部，但科学处没有恢复，自然科学工作完全划归国家科委管了。

科学处不存，但科学处这一批人还在，友谊还在，于光远的凝聚力还在。尽管经过了不同风风雨雨，但毕竟我们有过一段共同的经历，有共同的回忆和共同的感情。所以，中宣部科学处在北京的同事们，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年至少聚会一次。起初是轮流在谁家聚会，每人带一道菜去。后来条件好了，就到餐馆去，近十年都在文采阁。虽说是轮流做东，实际上于光远请客的次数最多。每次聚会，大家亲切交谈，忆往瞻前，十分愉快。

近些年来，于光远每年都要发给我们一封他亲自写的新年贺信，讲述他一年里的工作和身体情况。他那永不停顿的进取精神，每年都给予我们新的鞭策和鼓励。（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8年 家庭保健报

让生活不留遗憾 订阅家庭保健报

开始 订阅喽

订阅办法：全国各地邮局
 订阅价格：全年 99 元
 什么最重要？家庭！
 什么不能少？保健！

统一刊号：CN23—0022
 邮发代号：13—3
 彩色印刷；每周二、四出版
 咨询电话：0451—84652433
 84653121

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访沈宝祥教授

郭宇宽

郭宇宽(以下简称郭):在履历中胡耀邦同志学历低,可是在各种工作岗位上都提出过很多思想创新,这是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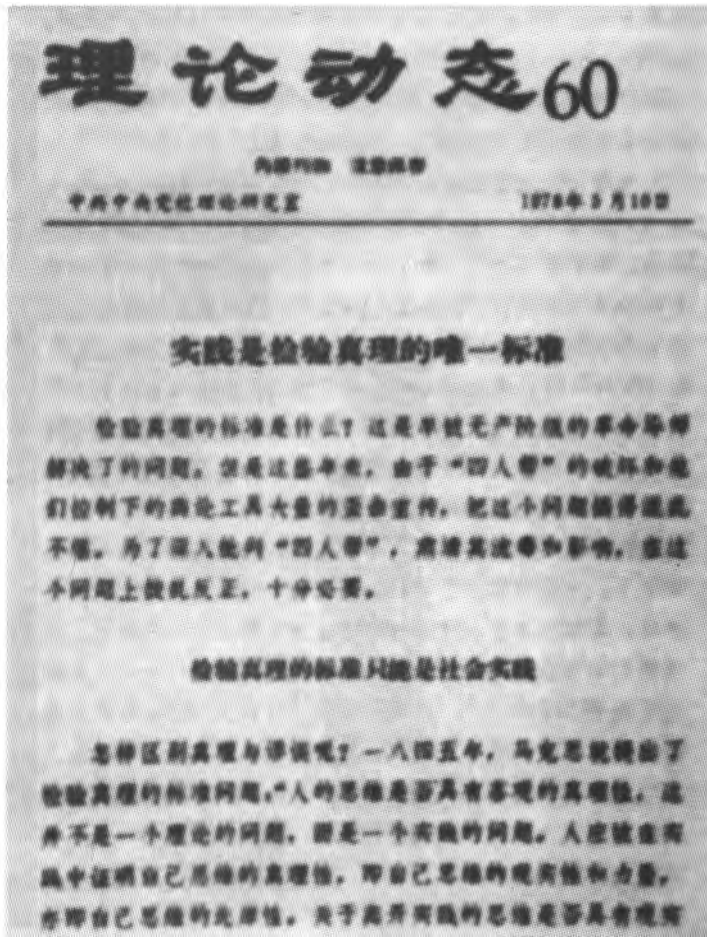
沈宝祥(以下简称沈):耀邦当年是有名的红小鬼,在延安的时候就爱学习,爱思考,这也是当时毛泽东特别欣赏他,把他当好苗子培养的原因。我感觉耀邦同志爱学习和他谦虚的性格有关,他总是觉得自己不足,要弥补,在多年的革命

工作中胡耀邦一直坚持读书学习。他的爱人李昭有一次跟我说,耀邦同志回到家里,也不大说话,一到家就是躲起来看书。再就是写文章,他对于文章总是改了又改,从来不让秘书代笔。而且他一直从骨子里亲近知识分子。我们党内有很多优良传统,但也有过一些不良传统,有代表性的就是长期轻视有时甚至敌视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视为异类。这有很复杂的背景,但在文革时候更是发展到极致,动辄斗争改造知识分子,以大老粗为荣。而耀邦同志一有机会就要为知识分子说话,尽可能给知识分子创造宽容、宽松的环境。他虽然党性很强,但骨子里不喜欢条条框框,不仅马列经典,有意思的书都要找来看看,特别喜欢亲近新鲜的思想知识。

所以我们这些正规大学毕业生眼里也非常佩服耀邦的理论修养,而且越接触越佩服。他谈起话来特别善于引经据典,非常有水平,就像陆定一说的,他是“从红小鬼到大知识分子”。他总有新东西,和我们聊天常常这么开头:“哎,我最近读了一本书……”他在给我们写的批语中曾引朱熹《观书有感》诗中的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重视实际,博览群书,又善于思考,他的源头活水不断。

艰难求索的心路历程

郭:你觉得这样一个从小参加革命的红小鬼,开始反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沈：总的说，耀邦不是一个盲从的人，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工作都很有创造性。他一直提倡要创造性的贯彻中央精神，反对片面强调服从，也敢于承担责任，他当陕西省委书记时对于中央推行的四清运动就是抵制的。

郭：可是他一路都是毛泽东提拔的，在文革的条件下，对于毛泽东的错误他敢于怀疑么？

沈：这种认识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不要说胡耀邦，当时政治空气相当压抑，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只是觉得这

这个社会不该这样，但一些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个年头谁敢质疑毛主席，那是现行反革命啊，可以说想都不敢想。耀邦同志自己对毛主席更有很深的感情，对于毛主席的风度气魄可以说非常崇拜。但他又听毛主席说过：“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这和他心目中一个无产阶级领袖的形象是矛盾的，觉得很困惑。有一次他和我谈到，过去毛主席对他一直很好，文革中他挨了整，他非常苦闷，便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可是石沉大海。从那个时期起，他对毛泽东也产生了怀疑，觉得毛主席不再是在延安时期那个和蔼可亲的毛主席。

但即使这个时候他的反思也是很深刻的，记得刚开始，谈到毛主席打击右派的做法，他也不敢怀疑这一做法本身的合法性，只是嘀咕：“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右派呢？”

四人帮被抓起来以后，他对叶帅说的文革后的国家大计：“中兴大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可以说是经过反复思考，被称作“新隆中对”，条条都抓在点子上。但是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些思考仍然停留在实际工作层面如何推



胡耀邦和邓小平在一起

进，没有触及理论根子的问题。真正深入的思考是随着实践开展的，接下来就会自然而然地遇到理论根子问题，要停止批邓怎么可以？”邓小平是走资派”是毛主席定的，不批邓不是反对毛主席么，这在那个年代可是死罪呀。要平反冤假错案，可不少案子也都是毛主席拍板的。不把一些理论根子上的问题搞清楚，做事情就推进不了。

在这样的工作探索中，他后来真正意识到毛泽东也是人，特别要把毛泽东的错误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

郭：那他对于文革的认识过程是怎样的？

沈：他对文革一直是反感的，但到了后期他集中思考的问题，就深刻了，不仅仅是咀嚼自己遭受的打击，而是思考这个文革在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发动起来的？有一次他聊天中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日本鬼子这么厉害，抗战八年都打完了，这个国家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搞上整整十年。

后来，在1977年5月他在党校大会上总结说，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所以在中国能够通行无阻，靠的就是两样：（当时，还不能讲毛泽东的错误，只能讲林彪、“四人帮”）一是“以假乱

真”，把一些私货说成是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来欺骗广大人民群众，像君臣关系，家长统治，无限权力，株连抄家，其实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再一招就是“法西斯专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言论专制，思想专制，谁有不同意见，谁敢反对就把谁抓起来。这两招相互配合，在这个国家就可以横行无忌。

走出文革的阴影

郭：经历了文革的历练，很多人变得谨慎世故了，这有没有影响到当时的胡耀邦？

沈：他不是那样的人，经过文革，人和人都不敢相互信任，到处都非常压抑，可耀邦同志到哪里就把一团春风带到哪里。他对人特别真诚，从来不把人往坏处想，遇到普通群众也一点没有架子，坦诚地交流观点，从不说套话。我给他汇报工作，他常会叫我“老沈，别急走，坐下来聊聊。”其实我比他小很多。他和你聊天你感觉就是和一个普通朋友，和你坦诚相见，有时候讲高兴了，他让你坐在沙发上，自己站着走着说半天。

郭：可是他毕竟是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人，总得有一些政治斗争的经验吧？

沈：他理解的政治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为人民服务。他觉得人都会犯错误，他不愿有了权力就把人一棍子打死，对别人特别宽容。他特别痛恨整人，反感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别人可以伤害他，但他不愿意伤害别人，过去刘澜涛在陕西整过他，他掌权以后绝不报复，反而厚待刘澜涛。他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头，可文革过后，他一直呼吁“冷处理”，生怕带着情绪过激的报复。1987年学潮时他也提倡要“冷处理”，这也引起很多对他不利的非议。

郭：这似乎有一些违背常理。

沈：确实他这样的人很少见，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别人非常宽厚，对于自己却特别严，有赤子心肠。有一件事可以看出他的品格，记得他在团中央的时候，出国访问，回来才得知，一些同事已经被打成右派，他非常难过，当时的政治压力下他没有为打倒的人站出来说话，他一说话自己也要被打倒。他为此一直自责，明明这不是他的责任，他也可以以旁观者的姿态说几句漂亮

话，但文革过后他挨个给这些人鞠躬道歉，总觉得自己良心不安。

郭：耀邦同志是不懂得那些权术，还是懂得了也不愿意去用？

沈：当然我们很早也隐隐为他有些担忧。他这样的人绝没有害人之心，也缺少防人之心，有人已经在背后整他的材料，他还对人坦诚相见。除了他性格的真诚以外，我觉得他在文革以后，把形势看得过于乐观了，低估了斗争的复杂性。当然他对这个党感情太深厚了，总不愿朝坏处去想，他和我们谈话即使在压力再大的情况下也很乐观，只是有时候提到党内的不正之风，他会非常愤怒。

那些风云激荡的日子

郭：胡耀邦同志推动思想解放的工作是从哪里开始的？

沈：中央党校是耀邦同志恢复工作以后的第一个岗位，当时他到中央党校当副校长，自然大材小用了。当时中央党校的情况不比现在，当时党校的房子都被林彪在文革中批给总参了，记得胡耀邦就在别的单位的院子里找了一套房子办公，他一个星期在党校住五天，记得他的起居室只有13平方米，非常简朴，他天天吃食堂。有些像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种环境下谁知道耀邦把中央党校办成了推进社会变革的思想理论阵地。

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没有拨乱反正的提法，他刚来就找到我们几个人，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他召集大家说，咱们要办一个刊物，把混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给纠正过来。当时不像现在各系统都有机关刊物，那时候中央党校办出《理论动态》真是独一份。那时我们几个人就叫“理论动态组”，没有主编，耀邦同志是实际的主编。他作风非常民主，过几天就召集大家开会，开会就是大家在一起聊，气氛轻松，看看当前有什么紧要的问题，讨论中就形成了策划，从选题，写作，改稿，定稿，每一个环节耀邦都深入参与，那时候我们工作真是常常通宵达旦，非常紧张。第一期印了三百份，送给谁的名单都是耀邦亲自定的，接着就连连加印，我们每一期的选题几乎都会成为当时领导干部中

讨论的焦点。

郭：工作中有没有遇到干预，比如上级封杀？

沈：当时不像现在，办刊很简单，基本没有什么人干预，也没有什么审批程序，我们只要印了就发，包括华国锋最初都很支持，两次表扬我们，到后来涉及真理标准讨论才有一些压力，但也没有影响我们的工作，在业务上我们很独立，只是在政治上能感到压力。

比如中央给耀邦一个任务，要中央党校总结第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当时斗争刘少奇这些事情因为是毛主席定性的，还被当作经验来总结，不敢说是教训。这实际上是交给中央党校总结“文革”的任务。对于如何总结，我们内部有争论。而胡耀邦明确提出，总结不能根据中央文件，也不能根据某一个人的讲话，要看实践、看结果。这和当时党中央的态度是有距离的。当时大多数人还不敢想这些问题，还有一些人看透了，但是装糊涂不说，耀邦同志这种点破窗户纸的勇气，体现了他政治家的魄力。带着这种锐气，《理论动态》上就搞出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论战打个比方就好像放开了思想解放的总阀门，其他一系列问题都摆上了台面。有一段时间我们搞“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当时搞生产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光荣任务，是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我们提出来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首先为了人民的生活。当时余秋里误解了我们的意思很生气，因为当时大庆是提倡“先生产后生活的”，觉得我们是否定大庆，就去告状。耀邦同志开会告诉我们，“惹乱了，有人给我们扣了‘反大庆’的帽子”。我们有些紧张，但他接着说一句“不过也不要紧”，让我们都乐了。

郭：在他离开中央党校以后，是如何参与《理论动态》工作的？

沈：耀邦把这本杂志看得非常重，12月他去当中央组织部部长，专门找我们几个来开会说，组织安排我新的工作。当时我们都觉得很突然。他接着说，我还要和大家共命运，《理论动态》我决不会不管。后来，他经常把他的一些策划想法告诉我们，风雨无阻，每期稿子都由他审阅，他都在第一时间处理，最长不过第二天。有时候我们稿子不够尖锐，他就会批评我们“不敢抓主要矛盾”，后来他当了中央宣传部长，还是一样。我们

的稿子从送中组部到送钓鱼台，后来他搬进中南海办公就送中南海。他也和在中央党校一样常常召集我们一起开会，1978年那一年，后来我查笔记发现我们光是到他家里开会就有11次，在他办公室开会就没法统计了。1981年六中全会上他成为了党中央主席，9月29号，他专门把我们叫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了整整半天的会，像平常一样谈了很多当时的理论问题。他没有说告别的话，但我们都明白他的心意，以他这样的位置以后不能再具体领导我们的工作了，他只是叮嘱，你们大家一定要继续把这本杂志办好。

后来我再也没有为了杂志的事打扰过他，但每年12月31日我都会代表编辑部给他汇报我们一年的工作，他总是非常热情地问候大家。有一次我不在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专门到党校找我，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原来是转达耀邦的问候。他一直把《理论动态》放在心上。耀邦去世后，我总也忘不掉，那时我们在一起办刊时的点点滴滴。记得有一次他特别有兴致，对我们说：“等我死了以后，你们讲情义可一定要替我记上一笔，胡耀邦，生前办过《理论动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选刊》编辑部

小说选刊

邮发代号：2-210
月刊，定价：8.00元
全年订阅价：96元

2007年全国文学期刊中唯一一本“价升量涨”的刊物！他成功的奥秘是什么——

- 在火车上读着《小说选刊》2007年第一期上的《无果》，那分久违的心窝颤动和伤感的泪水便伴随了我整个旅行更多的归途……
江西南昌航空大学环艺系 傅 琦
- 下课后，女儿她与我相依为命。修理自行车的收入维持着我们母女俩的生活。十年了，日子虽然艰苦，但我们因从书中心灵的《小说选刊》里找到了欢乐，找到了坚强，找到了希望。女儿今年考上山东大学……
山东省临沂市工模具厂 王 平
- 骑上那我任教的自行车几十里山路，如月一般的脚步只因因为那里能买到《小说选刊》……
河南省安化县牛角坪小学 夏赞良

地址：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小说选刊》杂志社 邮编：100013
读者热线：010-64294136 64293503 网址：www.xsxxk.com

我在“三线”亲历文革

胡 阵

1964年秋，毛泽东一声号令，近四十万铁路工人和铁道兵战士火速开进大西南的深山老林，开始了“大三线”的铁路建设。头一年打通了川黔线，第二年打通了滇黔线，第三年便集中兵力于大小凉山腹地，穿崇山峻岭，越急流险滩，在绵延一千多公里的线路上，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成昆铁路建设。工程规模之大，环境之险，进度之快，在中国铁道建筑史上可谓空前。

为了统一指挥，统一号令，中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书记、大三线建设总指挥李井泉兼这项工程的总指挥，铁道部长兼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任副总指挥，并从全国各地调集八百多名风华正茂的青壮年干部（铁道部、铁道兵各占一半），按军队建制，组成了“西南铁路建设工地指挥部”（简称“西工指”）。随着丈夫一道，我也成了这个战斗集体的一员。

两年过去了，成昆铁路以堪称“神速”之势完工过半。边陲小城西昌的老彝胞们仍然过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太平生活。驻扎在这里的铁路建设指挥部也远离城市喧嚣，一门心思、全神贯注、争分夺秒地指挥着全线施工。然而，正当此时，不祥的1966年伴着“文化大革命”的凶险足音和邪恶身影，渐行渐近，悄然而至。

“桃花源”中风波起

事情是从政治部收缴每人手中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开始的。这本历来是共产党员必读的小册子怎么了？人们疑团重重。

一个阴霾的上午，西工指全体干部突然接到通知，到大礼堂去收听铁道部召开的电话会议。这会开得离奇，既无主题，又无议程，也不知谁在主持。九点钟北京那边宣布开会，随即叫喊声，口

号声，呵斥声，争辩声，乱成一片。习惯了铁道部那种井然有序、指挥若定的会风的干部们不得要领，满腹狐疑。铁道部肯定出事了。

两天后，漆黑的夜晚，一支神秘的小车队开进西工指大院。来人是李井泉和他的副手程子华。这样两位执掌着西南一方大权的显赫人物到了西工指，既不听汇报，也不作指示，连面都不曾露。原来李井泉是从成都一次万人批斗大会上被“抢”下来的，连夜逃离成都，到了西昌。李井泉的逃亡只保住了自己一条命，妻儿老小相继被迫害致死。两天后，小车队又在夜幕掩护下向着昆明方向逸去。车队的神秘来去，留下了无数的问号，人们更加惶惶然而无所适从。西工指这台高效灵活运转的庞大机器突然出了故障，吱吱嘎嘎，乱摇乱晃，眼看就快不行了。

为了不让这条倾注巨大国力修筑的铁路功亏一篑，西工指党委向全线数十万筑路大军发出“战斗动员令”，要求排除一切干扰，确保成昆铁路1968年7月1日通车。动员令被简称为“6871”，迅速传达到工地每个战士、工人和干部。在短短几个月里，“6871”成了万众一心的奋斗目标。然而，这一良苦用心不过是枉费心机，全线施工迅即瘫痪，西工指也在劫难逃。

一天，机关食堂忽然多了几个学生模样的孩子。本来，家属子女来探亲是常事，谁也没在意。然而，正是这几个孩子，一夜之间就在指挥部的每个角落涂满了歪七斜八的大标语。几位身居高位的部长、司令、政委转眼成了被指名道姓的牛鬼蛇神，“炮轰”、“火烧”、“油炸”……一个个血腥的动词让人不寒而栗。

那几个自称“红西南”的学生娃放了这把野火之后，就若无其事地到别处继续串联点火去了。和成千上万在那个年代被魔怔了的孩子一

样，他们只管行动，不问结果，视“革命”如游戏。然而，正是他们带出的信息——西昌深山里居然还有这么个藏龙卧虎的去处，却调动了更多孩子们的好奇心，招来了成都地区各式各样的“红卫兵战斗队”。来者不知道指挥部是指挥什么的，指挥部也不知道战斗队是来战斗什么的，大家都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红卫兵呼喊的就是一个主题：造反！造反！造反！原本的和谐安详被乖张暴戾所替代，到处是腾腾杀气。他们撒下的种子很快就开出了邪恶之花，西工指的群众闻风效法，各种“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全无敌”、“从头越”、“丛中笑”、“争朝夕”……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无数的誓言，无数的旗帜，造反！造反！造反！人们无暇思考，无法停顿，七八百不久前还在秩序井然工作着的人们，茫然地卷进了至今都不可理喻的“文化大革命”。西工指这架庞大的机器终于瞎了火，一纸“6871 动员令”转瞬成了“以生产压革命”的反革命铁证。

造反组织纷纷贴出大字报，发布各自的政治宣言，“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谁也说不清毛主席受到了什么威胁，自己要向谁开战，要革什么人的命，要造什么人的反，但谁也不敢提出这些疑问。我所在的政治部迫于形势，也在一天夜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样，我也成了“造反派”。各“战斗队”组建之初都是兵工混成，大家本来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聚合到一起的，都是很好的同志和朋友，现在也还是携手刷大标语，携手贴大字报，携手造反闹革命。然而，就在此时，一股名为“派性”的妖风飏然而至，在少数人的操纵下，“兵”和“工”一夜之间就被强行分割开来，昔日的亲密战友转眼成了冤家对头，针尖麦芒，水火不容，争斗长达四年之久。从唇枪舌剑到大打出手，再到真枪实弹，血溅墙

头。然而，没有是非，没有对错，也没有胜负。

初识恐怖滋味

正当兵工两边闹得不可开交之际，一队现役军人突然进驻机关大院。这支番号“501”的小分队，是从石家庄铁道兵学院派来的学生兵。三十多个横眉竖眼、人高马大的小伙子，军服崭新，皮靴锃亮，气势汹汹。他们似乎很有来头，很有仗恃，机关对立的两派立即情势大变。一派如添翼之虎，斗志昂扬；一派如失怙弃儿，惶惑无主。

“501”的第一号公告就是宣布吕正操是反党篡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西工指是反党篡军的“吕家王朝”。铁道兵一派组建的“红战旗造反总部”是机关唯一的革命造反组织，其他都是“保皇党”。“501”和“红战旗”很快合二为一，以指挥部主宰自居，不断地发号施令，导演了一幕幕反



作者(后排左一)与同事及其子女在“造反大楼”前

人性的恶剧。

一天上午，广播通知机关全体干部到大礼堂开会。在一片哄乱中，“501”的几名学兵反扭着铁道兵副司令员郭维城的胳膊进入会场。他们狂暴地揪掉将军军服上的领章帽徽，把军帽狠狠地扔到地上跺了又跺。一个学兵大声宣布，郭维城已堕落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投靠“吕家王朝”的黑干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吕正操在北京被江青点了名，成为铁道部和铁道兵造反派联合揪斗的对象。在西昌，揪斗郭维城就成了必然。郭早年曾任张学良的秘书，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儒将，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建国前后的铁路抢修抢建中屡立战功，如今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侮辱毒打。当时，我只觉得心都要蹦出来了，好像末日来临。而这一出“杀猴吓鸡”的戏，以后又反复上演多次。郭维城无数次地被揪斗，他那魁梧的身躯被压弯到九十度以上，双臂反剪，几乎被拧到脑后。初冬的天气，他头上的汗水却不停地流淌。这样惨不忍睹的摧残折磨长达半年之久，将军的尊严在泥淖里被践踏。和他同时被反复揪斗和惨遭毒打的，还有1926年就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指挥部副政委刘建章，曾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黎光，以及由铁道兵总部派出而被判定已“投靠”他人的参谋长张治安等。

“501”学员的恶行激起铁路职工强烈的愤怒，他们不时和“501”的学兵激辩。一位机关报社的编辑是个壮族同志，人称“老壮”，年轻气盛，常常将“501”驳得无言以对。他们因此设下陷阱，蓄意加害于他。一次辩论中，对方故意问他叫什么名字，“老壮”说：“你们没有权利问我的名字。”对方挑逗说：“难道你的名字那么高贵？”老壮说：“就是高贵。”对方进而设套地问：“难道比毛主席的名字还高贵？”老壮猝不及防地回答：“就是最高贵！”这一回答令他落入了陷阱，立即被对方揪住，说他是胆敢把自己置于毛主席之上的“现行反革命”。十数名“501”学兵把他打翻在地，拳脚交加，打得鼻青脸肿，血流满面，然后游院示众，最后被关进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黑屋里，不见天日长达三个月之久。我亲眼看到满脸淌血，被捆绑游斗的“老壮”，后来也亲耳听到“老壮”叙

述在黑屋里的遭遇。

“红战旗”夺权

正值此时，上海“一月风暴”狼烟骤起。张春桥、王洪文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夺权的乱象迅速向全国辐射。西工指的“红战旗”也乘乱夺了权。1967年1月23日上午，我看到二三十个军人押解着西工指的几位领导人走进办公楼。其中有铁道部副部长，铁道兵副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在二楼的小会议室，几个造反头头让他们围站在会议桌边，大声宣读了所谓的夺权声明。声明文字很短，大意是说西工指党委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现在把“党政财文”大权交给“红战旗造反总部”。根本不允许他们说话，即责令每个人在夺权声明上签字。往日叱咤风云的部长将军们此时像绵羊般驯服，轮番乖乖地签字画押。倒是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愤愤不平。这时从人丛中突然钻出一位敢于对抗的铁路干部，是一位专攻定点爆破的工程师，他义愤填膺地说：“你们不能签这个字！这是要上对中央，下对群众负责的！”当然，这种反抗只不过是“螳臂当车”。这位工程师后来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权力一旦落到一派人手中，白色恐怖立即降临。先是对西工指领导人实行军事看押，接着便是镇压对立派的群众。高音喇叭里一遍遍地广播“夺权声明”，宣布除“红战旗”外其他一切组织都属非法，全体人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政权。当天傍晚，指挥部下属铁道兵某师一下子开来五辆大卡车，打着响应毛主席“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的旗号，运送数百名全副武装、刺刀出鞘、子弹上膛的士兵进驻机关。他们宣称“红战旗”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这个权“夺得对！夺得好！”谁反对红战旗就砸烂谁的狗头”。铁道部的干部职工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阵仗，被猝不及防地击垮了。

“红战旗”对铁道部人员使出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收编，把干部职工按司、政、后系统收编到麾下，强制脱掉军衣，摘掉领章帽徽，成为“红战旗”的二等公民。硬的一手是镇压，凡反对夺权、拒绝收编的则压服、打服。这时，西工指主要领导人都已军事看押，后来又一个个揪回了北京。死老虎不再有批斗价值，打击的重点就放在了铁路

中层干部身上。他们把干部部长打成“保皇司令”，交给机要处一批年轻战士去批斗。这批年幼无知的新战士三句话没说完就拳脚交加，几乎是天天批斗，天天殴打，会场如刑室，四处血迹斑斑，干部部长差一点被活活打死。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被交给专案组秘密审讯，直审到胡言乱语，神经错乱。就是认了罪的，也没有好下场。一位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在认罪的大字报上写“我辜负了毛主席和党对我的培养教育”，只因“和”字写得潦草，像一个“私”字，被“501”学兵当即抓住，说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有“私党”，殴打游行批斗关押数月。对一般干部也不放过。司令部通讯处的一位工程师被打成“保皇狗”，任机要秘书的妻子被打成“保皇母狗”，年仅七岁的儿子被打成“保皇小狗”。他们当着孩子的面羞辱父母，当着父母的面欺凌孩子，把自己和野兽划上了等号。机关食堂一位大厨只因反对夺权，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罢了他厨师的官，夺了他掌勺的权。他们一天一个噱头，施暴成了日课。在那二百多个日日夜夜，铁路干部职工饱受屈辱和惊吓。我害怕天明，天一明就会有熟悉的同志被点名；我害怕广播，一广播就是杀气腾腾的批斗；我也害怕天黑，怕漫漫长夜噩梦袭人。

一天深夜，和我们毗邻而居的组织部副部长的家突然被抄了，这是后来大规模抄家的开始。他们说来抄“黑材料”，把衣物被褥翻得乱七八糟，什么也没抄着，便扬长而去。我知道下一步抄家该轮上我们了。其实那时的家极其简陋，既没有可抢的财物，也没有可抄的“黑材料”。唯一担心的是随身带到西南来的各自的日记和结婚前后的数十封书信，那是我们青春的轨迹和感情的见证，是弥足珍贵而绝不愿示人的。我们决定把它烧掉。深夜，像作贼一样，一本本日记和一页页书信被一片片撕碎，一团团烧毁，当时那种沮丧和愤懑哪堪向后人诉说！

“红战旗”为了争取下属工程局职工的支持，不得不对机关职工显示几分宽容，组织了一支兵工混编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往甘洛，我也被编入其中。甘洛位于成都与西昌之间，是成昆北段铁道部工程局的所在地。到甘洛不久就目睹了一场惨剧。工程局政治部宣传部的部长不堪凌辱，钻到一辆卡车下自杀，由于是辆空车，加之车

速慢，未能殒命轮下，只是轧断了一条腿，血流如注。造反派闻讯赶来，不是赶紧救人治伤，而是立刻擦起两张高桌，把他硬架上去，实行现场批斗。他们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连他是吕正操的远房外甥也被当作十恶不赦的罪过。批斗者声色俱厉，唾沫四溅。被斗者面无人色，惨不忍睹。更令人战栗的是，这位再也不愿经受摧残的干部，当夜用小刀划开自己的肚子，把肠子拉出来，终于自杀身亡。

到甘洛的第三天，我和另外两人被派到一个叫翘脚河的工地。那是一片荒山野岭，工人们在山坡铲出一片平地，围上芦苇席，人与荒野就只一席之隔，吃住都在芦苇篷里。若不是数百工人聚在一起，是很难抵挡豺狼野兽袭击的。然而，就是这种地老天荒的角落，文革也没有放过它。

我们刚到这个工地，就碰上揪出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行是他上厕所时，用印有毛泽东头像的报纸擦屁股。“作案”当时，人赃俱获。这件事使工地上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防范迅速升级，不同造反组织的工人更加敌对。立即有人要我们对此事表态。在那样的气氛下，我们哪敢多说什么？造反派十分不满，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对工地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看的？……这时的我们只能说，来工地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得熟悉情况之后才能发表意见，好不容易把这批年轻气盛、怀着敌意的工人对付走。眼看工地的形势已经威胁到我们的人身安全，工人们也完全不买“红战旗”的账。干嘛要在这可怕的地方担惊受怕？三十六计走为上。所幸我们在翘脚河时间很短，没有串联，没有“支左”，否则，势必铸成大祸，脱身不了，后果很难设想。

“红战旗”向下属工程局派宣传队纯属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但没有获得铁路工人的支持，反而把成昆北线工人造反派的注意力引向西昌。最终把“红战旗”赶出西工指的正是这些工程局的工人。

“六一七”树起了反旗

我在甘洛的这些天，北京的风向标又在转向，西工指也在起变化。先是持枪“支左”的某师

撤离机关，后是协助夺权的“501”学兵全部返校。不可一世的“红战旗”一下子失去了左膀右臂，元气大伤。机关大院到处是三五成群窃窃私语的人，司、政、后的铁路职工都在串联，新的风暴即将兴起。

风暴中心生成于机关印刷厂。清一色的印刷工人个个自认是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造起反来无所顾忌。看到夺权的那批人声威大减，就率先发出了彻底否定夺权的呼声。一时间，几十个原属铁路职工的造反组织重整旗鼓，通通树起了反旗。“砸烂黑战旗”的口号甚嚣尘上。压迫和反压迫的争斗迅速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刀枪相见。

铁路职工一旦崛起，便接受教训，不再各自为战，而是“集中兵力”，将所有的战斗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战斗群体。那天是1967年6月17日，这个联合起来的造反组织就定名“六一七”。

铁路职工另树旗帜，士气骤涨，声威大振。西工指地处邛海之滨，芦山之麓，既无街衢，也无人家，铁路职工这一派却三天两头敲锣打鼓，示威游行，彩旗猎猎，口号震天，砸烂打倒，乐此不疲。这时铁道兵一派则采取守势，尽量克制，不出击，不争辩，甚至不接触。这一来，“六一七”更加无所顾忌。尤其是那些年轻的工人，无班可上，无工可做，浑身精力无处发泄，就把打派仗当作游戏，唯恐天下不乱，乱得不够。只要兵工之间稍有争执，他们就立刻赶去，大打出手，以图一快。在成昆北线施工的十几个工程处的工人造反组织也纷纷来机关串联，无一例外地站在“六一七”一边。到处是“砸！砸！砸！”“打！打！打！”的喧嚣，令人日夜不得安宁。

在西工指机关乱成一团的同时，整个西昌局势也急剧恶化。地方两派的武斗不断升级，真枪实弹相向。各派都出现了慷慨赴死的黄继光、邱少云式的“英雄”，死后就被埋在所谓“烈士陵园”的荒山野岭里。每当夜深，九公里外的西昌城曳光弹横空乱舞，机枪声彻夜不停，仿佛是大屠杀的前夜，恐怖啃噬着每个人的心。

在铁路工地，接二连三有工人来指挥部造夺权者的反。当权的“红战旗”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工人来到指挥部，根本不问皂白青红，看见穿蓝衣服的便视为“同一条战壕”的战友，看见穿

黄衣服的轻则辱骂，重则蜂拥而上，饱以老拳。“红战旗”一派终于招架不住，全体撤离指挥部机关，搬往成昆南段铁道兵的一个施工点去了。这样的撤离，实际是对夺权的自我否定。他们中间的激进分子咽不下这口气，时时准备报复。最不愿撤离的是通讯站里的一帮年轻战士，在撤离不久的一天夜里，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带着武器，乘着军车，闯回机关大院。小分队的出现，引起铁路职工的惊慌。那时，四川的各种造反组织手里都有枪械，有些还拥有大炮、坦克、装甲车，甚至战舰，所以基层工地来的造反派都带着枪。就在那个黑风高的恐怖之夜，人影憧憧，彼此害怕，终至开枪对射。“红战旗”当场死亡一人，不敢恋战，匆匆撤离。临走留下大标语：“血债血还！”工人造反派一见闯了大祸，纷纷逃回工地。死者是西工指通讯站的站长，一位木讷忠厚的技术干部。他本人并不是打派仗的激进分子，只因担心下属的年轻战士闯乱子，才随车同来，谁料想竟死在乱枪之下。另一次枪击死人的事更是离奇。“六一七”得到情报，说“红战旗”次日凌晨将有一辆吉普车前往成都，意图不明。为了弄清情况，就求助于西昌地方造反派，请他们在必经路口设卡查问。次日天亮前，当车行至哨卡时，由于司机情绪紧张，拒绝停车，导致地方造反派向吉普车开枪，后座一人中弹身亡。事后得知，死者并非军人，而是一位铁路干部。他倦于派仗，商得“红战旗”一位朋友的帮助，同意他搭乘便车，回东北去探亲。可怜还没走出西昌，就命赴黄泉。这两件命案都不了了之，文革中这种事实在太多了，生命在那个年代几乎不值一文钱。

造反大楼里的自我囚禁

为了躲避报复，“六一七”几百人一下子迁出了机关大院，挤进一座被命名为“造反大楼”的三层楼里。这座楼原是军阀刘文辉为蒋介石修的“行宫”，解放后被用作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的院址。大楼背山面海，居高临下，好守难攻。一座仅供少数人享用的楼房，居然能容下几百人，“战斗”长达年余，也算得上是“蔚为壮观”。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造反大楼”的全景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二层的门窗统统用砖头封死，墙上留着一

个个射击孔，既可向外窥视，又能伸出枪筒射击。顶层门楼上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那时大家都用毛主席像做护身符，要是对方敢向这些护身符射击，那先就成了“反革命”，不战而败。大楼防守严密，只在楼的右边留一进出的狭窄侧门，由两个持枪手警卫。顶楼前后设有哨位，昼夜二十四小时有人持枪站岗放哨。四百倍的地质勘测望远镜不时搜巡山下的公路、邛海的水面和楼后的陡岩松林，如大战将临，大敌当前。“造反大楼”成了一座武装到牙齿的军营，然而住在这座杀气腾腾的军营内的，却并不是一群彪形大汉、杀人魔王，而是几百个文质彬彬的干部、工程师、技术员、编辑、记者、画家、摄影师……他们满怀激情来为祖国的大三线建设奉献青春，却在那不可理喻的年代变成这种不可理喻的模样。

随着西昌武斗加剧，邮路完全断绝，西工指数百名铁路职工自从撤离机关大院后便和家人失去了联系。“造反大楼”好似汪洋大海里的孤岛，楼里的人有说不尽的孤寂、恐惧和迷茫。从68年初到69年夏季，几百人自我囚禁了一年有半。多亏“六一七”的勤务员们，是他们利用文革前掌管的部分资金，冒险到周围农户去采购粮食和菜蔬，这才维持了数百人的生计。作为“六一七”的一员，我也是沾了这份光的。文革中，特别是在大小凉山这样的深山老林里，不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参加一派，否则，不仅没有吃饭的地方，死了都没人埋你。如果不是当年大家都还年轻，真不知会发生什么悲剧。

在指挥部机关，从铁道部调来的一批中层干部处境更是艰难。自从大当权派一个个被揪回北京，这些中层干部便身不由己地上升成主要目标。“六一七”为了表现革命造反精神，不为对立派所垢病，时不时要从他们中间拉出几个来批斗一番。好在丈夫平日处世低调，人缘尚好，群众并没给他吃太大的苦头。只是有一次，在“造反大楼”的食堂里，当他正在作检查交待时，一位青年工人一时兴起，端起手中的卡宾枪，对着天花板就是一梭子，会场立时大乱。事后我问丈夫：“怕不？”他说：“不怕。是他自己心里烦，不是冲我来的。”是的，干部和群众哪有那么多的怨仇？无限度地上纲，无休止的批斗，干部受苦，群众嫌累，

大家心里都很烦。

大约在住进“造反大楼”两三个月后，突然从西昌军分区传来通知，叫西工指的中层干部一律集中，到距西昌几十公里的一个叫马坪坝的山窝里，和地方干部一道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些中层干部就这样被军分区派来的卡车匆匆拉走，糊里糊涂地离开了西工指机关。我们夫妇在危难中分手，前途难卜，惶惑不已。

学习班开办一段时间后，允许家属去马坪坝探望，我和小马决定走一趟。到了那里，夫妻见面十分拘谨，不知说什么好，更不敢深谈，我们的探望和探监也差不多。意识到不可久留，我俩次日一大早就返回了“造反大楼”。然而，就是这样人之常情的事，在铁路职工内部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渐渐的，人们开会不再通知我们，“保夫派”的冷言冷语也传到我们耳中。一次对亲人的探望竟使我俩被排除在“自己人”之外了。我和小马决计搬出“造反大楼”，回到机关大院去住。我们估量，即或“红战旗”杀回来，好像还不至于要我们的命。

我们搬出“造反大楼”，没人阻拦，也没人帮忙，大家都麻木了。机关大院四层的办公主楼早已空无一人。我和小马，还有一位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三个女人和三个孩子，就这样潇洒地把原来可容几百人的办公大楼“占领”了，但一日三餐仍要到造反大楼去打饭，否则只有饿死。

逃离西昌

西昌军分区那个“学习班”几乎和所有的“学习班”一样，是支派的。对西工指的两派，自然是支兵不支工。铁道部去的干部，首先就得承认“红战旗”是“革命造反组织”，“大方向是正确的”，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丈夫他们在低头认罪的同时，也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这些话传回“造反大楼”，引起铁路职工的强烈不满，骂这些干部都是软骨头，回来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们。“学习班”在经历了一段紧张批斗后，气氛有所放松。除认定的“牛鬼蛇神”外，其余的人允许请假回家看看。一天，小马的丈夫和我的丈夫相约，偷偷回了一趟西工指大院，不幸被“造反大楼”的蟹望哨发现，立即来了

几个人，令他们过去“谈谈”。这一谈，从晚上六点一直到次日凌晨三点。我焦急等待，忧心如焚。等到丈夫回来时，只见他疲惫不堪，满脸通红，知道他挨了打。我问他：“伤着哪里没有？”他苦笑说：“没有。”随即就呼呼入睡了。第二天，在好心朋友的掩护下，丈夫避开蟹望哨，溜到邛海边，沿着芦苇丛，像越狱的囚犯一样逃跑了。

三个女人和三个孩子住偌大一座院子和偌大一幢楼房，可谓宽敞舒适。每天，我独自坐在窗前，一边看着邛海和对岸的峰峦，一边想念着故乡和亲人，有时不禁潸然泪下。这样的生活，如此寂寞，也难长久。一天，大院忽然传来久违的嘈杂声。二三十个地方造反派手持冲锋枪，押着指挥部通讯站的几个工人，强迫他们来大院掘地。这些人是从西昌城里来的，开着架有机枪的大卡车，冲向“造反大楼”，说是要“抓头头”，“收缴枪支”。进机关大院掘地三尺，就是要找埋藏的枪支弹药。这事本来就十分荒唐，自然什么也找不到。可他们见到收音机、手表、毛毯等物品却如获至宝，喜不自胜，拿起就走。不久又来了一拨人，腰间别着手榴弹，明晃晃的大片刀绑着红绸，攥着黄铜军号，亦真亦戏的。他们冲上我们住的大楼，挨个房间搜查，把我们这些妇孺赶到操场，站到已列队的人群中间。一个一手挥大刀一手舞手榴弹的男人用地道的四川话大喊：“谁是头头？谁有枪？给老子交出来！哪个不说砸烂他的沙罐儿（脑袋）。”他们逐个盘问，遍体搜查。当盘问到我们时，我们说是带孩子来探亲的家属，什么也不知道，这才躲过一劫。

我们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西昌太凶险，必须马上离开。可离开谈何容易？任何交通工具都没有，总不能带着孩子徒步走出崇山峻岭吧？所幸天无绝人之路，次日来了一辆军车，要把铁道兵的档案转移到军分区，以防地方造反派冲击抢劫。在这危难关头，人性毕竟战胜了派性，负责转移档案的铁道兵干部很爽快就允许我们搭乘他的军车离开，这不啻于救了我们的性命。兵工本都是善良百姓，都是相亲相敬的同志，何来真正的仇恨？

就在那个恐怖之夜，“造反大楼”的全体人员也如惊弓之鸟，一夜之间逃散一空，谁也

没有想到通知我们一声。“造反大楼”又成了一座空城，如果我们次日走不了，立刻就会陷于没吃没喝的绝境。

我们离开后，西昌城里的造反派全都得知有这么一所大机关有利可图。他们蜂拥而至，明火执仗地抢劫和破坏。全套载波通信设备被捣毁，文件、档案、书籍丢失殆尽，大小财物洗劫一空，拿不走的统统砸烂。文革后期铁道部曾派专人去收拾残局。回来的人说，那里除了满目疮痍，再也找不到一件完整有用的东西。一个中央直接领导，全国通力支援，担负着提升中国国力重任的庞大建设机器就这样灰飞烟灭。

此后，我决心不再回西昌。然而，西昌的山，西昌的水，西昌的人和事，却时时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去年，我终于摆脱不了越四十年的牵挂，改变了自己的决心，又去了一趟西昌。山川依旧，往事如烟，故地徘徊，怆然欲泪。西昌有芦山邛海令我无限眷恋，西昌文革如一场噩梦令人不堪回首。

（责任编辑 萧 徐）

糖尿病之友
糖尿病教育专家

4个栏目精彩纷呈
170000读者共同关注
2000名医生协同参与
8位知名专家携手打造

欢迎订阅

2008年订阅价：6元/本 全年：72元

订阅方式一：在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42-253

订阅方式二：在各地《糖尿病之友》的发行点订阅

地址：北京东城区东滨河路甲1号大众投资大厦6层(100013)
咨询电话：010-51089130, 51089131 网址：www.tmbz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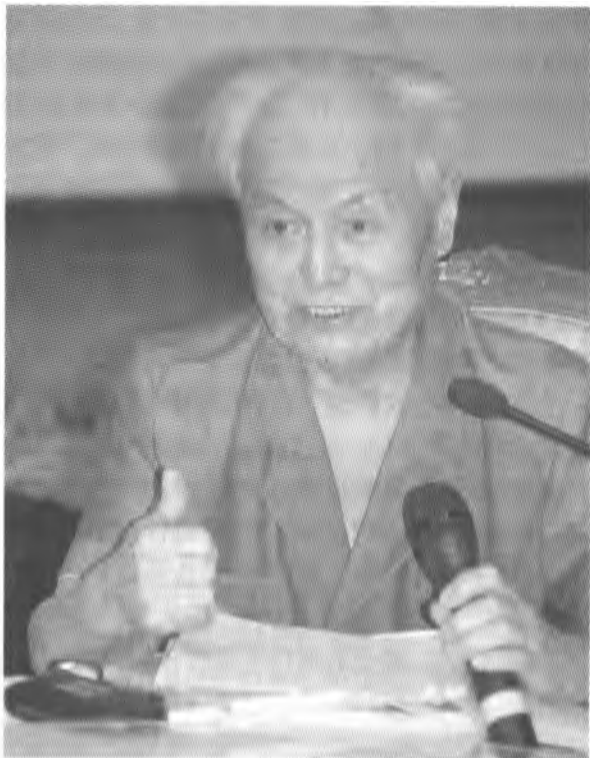
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

李 锐

在1995年1月《同舟共进》上，曾看到朱正的《一次没有实行的改革》文，他就唐纵日记中的材料，介绍了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内部围绕政治改革问题的一些谈论，很引起我不少回忆。当时就着手写一篇谈唐纵日记的文章，拟了一个草稿，但一直没有最后定稿，压了十多年，清理杂件中找出，现在整理出来。

第一个通读了唐纵全部日记的人，就是我。1949年南下到湖南时，我任《新湖南报》社社长。大概是1950年初，省公安厅厅长同我谈起，他们得到唐纵的全部日记。那是唐在离开大陆去台湾之时，交给一位朋友保管的；长沙解放后，那个朋友就主动交了出来。公安厅长知道我对这类东西特有兴趣，就全部交给我一阅。日记从1927年唐纵进黄埔军校六期写起，直到1946年底。一律用写钢笔字的黑皮笔记本，大小一律，好几十本，字也端正。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人生活严谨，工作也认真踏实，深得蒋介石器重。抗战时，蒋让他当侍从室第六组的组长。侍从室主任是陈布雷，成员自是蒋的亲信幕僚和智囊，代蒋草拟文告，调查情况，执行交办任务。这第六组主管情报工作。在国民党的情报系统中，唐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做过军统局的帮办；到台湾后，任内政部次长，警察总署署长。当年他不但与蒋常有直接接触，常去蒋家；同国民党内许多高层人士也有颇深的关系，知悉较多政坛内情。因此，他的这部日记，对于了解那一段国民党统治的历史，诸如党内部各派系的情况，抗日战争的态势，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蒋待人处事的习惯等等，都是一种极为难得的很有价值的资料。当年没有复印机，我只能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打上记号，请字写得好的报社编辑柳思抄了一厚本。

我还记得，唐纵的日记本里夹了不少蒋介石写的批示条子，都是约半寸宽、两三寸长的小纸



李 锐

片，包括“中正”签名，字写的很端正，内容极短，只是几个字的批复或交办某事。唐纵收集了好多张，很珍重地将它夹在日记的相关部分，我还特意取出两张夹在那个摘抄本里。

1952年我调到北京后，同田家英谈起此事。田将这个抄本要去了，还转告中办主任杨尚昆（杨当年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杨看到了这个抄本后，于是下令将唐纵的全部日记调到北京来了。

我在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建设工作后，彻底投笔从工，以后也没再同田谈起过唐纵日记之事。杨尚昆大概是不满足于只看我的抄本，才下令把全部唐纵日记原件从湖南调来，作为研究用的资料。

回想当年，我是以很大兴趣阅读这几十本日记的，特别是其中读到我们党的部分。我一面看，

一面以自己的回忆来对照，有关亲身经历的那些事情，国民党方面是怎样看待的。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并确切记得的，是这样一条：1942年8月23日，唐纵在日记中有此一段：现在延安情况很混乱，可惜我们在共产党内没有一根内线，得不到确实的情报。我就回想起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时期那种可怕的情况来了。抗战初期，一批批满怀热情的青年，不畏艰难险阻，千里闯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还包括在边区长大的。这些天真纯洁的青年，在这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都受不了逼供信，在斗争会上“坦白交代”自己的“特务身份”。一时特务如毛。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打出了一万五千个特务（韦君宜的《思痛录》中有细微的描述）。可是国民党方面的唐纵，这一特务机关的首脑，他慨叹的却是在延安“无一根内线”！就是说，没有一个同他们有联系的打入共产党内部的真正的特务分子；我说，只要有一个，他也不会这样说了。当年从境外潜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是有的，延安保安处就逮捕过这样的特务，但是都不属于正牌子的军统特务）。而我们却一时闹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自称“特务如毛”了。这事于我有切肤之痛，我也是抢救运动中在保安处关了一年多（当年共关了老号、新号好几百人）。在逼供中，我受的刑罚还是较轻的，只是带手铐，挨耳光，坐矮板凳、长时站立，以及五天五夜不让睡觉而已。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谈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他说，在当着共产党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在肃反问题上搞错了很多人，走过这样一段弯路，包括我自己在内。抗战时期，出了山东省湖西肃反的错误，在延安又来了这样一个“抢救运动”。我看，延安犯的这个错误非同小可，因为延安是有全国影响的。他又说，特务本来是少少的，当着潮流起来的时候，没有例外地觉得特务相当的多。关于特务，从前的估计是“瞎子摸鱼”，究竟有多少并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只是极少数。在这次“七大”上，毛表示，对搞错了的同志，要向他们赔不是。

在这篇讲话中，毛甚至还对他在江西打AB团一事承担了个人的责任，他说：“内战时期，我（按：他没有加“们”字）就打过AB团，”他还说：“1930年一二月就打AB团，我讲不要搞肉刑，结

果还是搞了。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

从1985年开始，十多年中我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时，曾统计过十年内战期间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因为红军最多时才三十万人）。于是延安“抢救运动”时的“九条方针”，才有第一条“一个不杀”的规定，也杀了几个，如王实味）。回顾历史，根本问题在：对打“AB团”事件及整个“肃反”运动，从没有做过认真的总结。我们从历史发展过程看，为什么从1930年开始的，这种自相惊扰，施用酷刑，自相残杀的可怕的运动，一直不断，且规模越来越大呢？从本质上说，当然同中国的农民战争（痞子运动）和暴力革命有关。内战时期打AB团起的肃反运动，当然还同当年我党尚处于弱势，也与领导者多疑与个人维权等原因有关。延安整风文件中，斯大林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有一条是：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大规模肃反是1936年开始，比中国打AB团迟）。抢救运动当然也属于向苏联学习经验，不过规模大大超过，变成“特务如毛”了。在这种运动中，总是强调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要认清敌人，不要错把敌人当做自己人；为什么不提醒，要警惕莫将自己人当做敌人呢？这就关系到对“人”的尊重问题。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极深的国家，也是有农民战争传统的国家，从来没有过“人权”的思想传统。在革命运动中尤其战争中难免伤人、死人，但是养成对人的生命都无所谓的习惯，死多少人都无所谓，无动于心，只是说“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人头掉了长不出来”这样的俏皮话。看来这确是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七大会议上讲了那样一段话，为什么1949年后，依旧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不断地伤害着党内党外的老同志、社会精英、乃至知识群体，最后登峰造极，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甚至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直到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都当做反革命来肃了呢？这种中外历史上没有过的似乎难以理解的惨痛教训，其原因还有待更深入研究，这篇短文中暂不谈及。

唐纵日记的抄本送给田家英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我的手中。有时虽也想到其中的一些内容，苦

于无法查到。这次看到朱正的文章,才知道群众出版社已将这部日记整理为《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一书出版。于是找来一看,上面提到的那一条有关内容乃1942年8月23日,书上只摘录了这样两行:

“晚在罗家湾座谈会讨论共产党问题,切实检讨,对共产党毫无内线,所得报告,皆空泛无所据,至可惊叹!”

“毫无内线”之意,我记得很准确。印象太深刻了,事隔多年也不会忘记。我记得还有几句交代背景的话,如说目前延安很混乱之类。看来,8月23日的这些内容,在整理出版时给删掉了。还有一些我依稀记得的段落。在这本书里也没有查找到,看

来被删之处甚多。我以为,像这样有重要价值的书,最好不要删节,应按原貌发表;即使确实有一些一时不宜公众阅读的内容,删节的也应限于必须删节的,尽量少删多留为好。这是六七十年以前的日记,在我的记忆里,似乎想不起有什么必须删节的部分。我希望此书能重新完整出版,深信必将受到史学界的欢迎。

听朱正说,他的这篇读书札记在《同舟共进》发表时,也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他说,那是受了杂志篇幅限制而作的技术处理。我向他索阅了原稿,以为其中不乏可供参考之处,曾希望原稿重新发表一次,可这也是办不到的。(责任编辑 萧 徐)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赫鲁晓夫回忆录》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几个重要历史时期,自1964年失去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后开始写自己回忆录。他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长期以来讳莫如深的苏联最高层的重要活动,介绍了某些政治事件的始末。是一份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从坦途到困境,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因在全国组工会上的发言,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五虎上将”之首,从东北局副书记骤然跌入低谷,下放基层24年。屡遇坎坷,但不屈不挠,对革命忠心耿耿。一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中国革命崎岖沧桑的大面积。

《命运与使命》继《走出个人崇拜》后,这是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力作,一个敏感却又不能回避的历史和现实研究课题。作者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探求了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实现社会变革、追求现代化历程中的艰难与曲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	杨继绳	36.00	7.00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张秀山	43.00	7.00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唐筱菊 陈少铭	38.50	7.00
1949年后的梁漱溟	汪东林	23.00	5.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学问人生(上、下)——中国社科院名家谈		79.00	8.00
定西孤儿院记事	杨显惠	25.00	6.00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天堂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	罗平汉	32.00	7.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刘太医谈养生	刘弘章	35.00	7.00
病是自家生	刘弘章	38.00	7.00
是药三分毒	刘弘章	38.00	7.00
蒋介石日记揭密(上、下)	张秀章	88.00	8.00
风雨彭门	滕叙究	35.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38.00	7.00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	袁 鹰	26.00	6.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	马立诚	36.00	7.00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	朱元石整理	26.00	6.00
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	马畏安	32.00	7.0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季羨林	22.00	5.00
共和国大审判——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沈国凡	26.00	6.00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汪东兴	23.00	5.00

美方档案揭示的“八一七公报”

高 崢 (美国)

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签署了关于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联合公报,习称“八一七公报”。它与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一起,并称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三大基石,在官方文件和学者著作中频频提及。近年来,随着美国一些外交档案的解秘,“八一七公报”谈判前后的某些细节渐为人知,耐人寻味。现将美国方面的材料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故事追溯到1976年10月2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召集了国务院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有两个议题引人注目。一个是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形势发展。当时四人帮刚刚垮台,会上有人预言:“华国锋成功的概率是五对五,而邓小平能否复出,将是形势转折的关键。”另一个议题涉及到台海形势。基辛格指出,如果台海发生武装冲突,美国不能侧身其中,因为“去跟我们承认的国家开战,为了一块我们承认属于他们的国内领土而战,实在非常荒谬。”有人在会上说,“长远来看,台湾独立可能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但基辛格认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台湾决定加入北京,或者双方能自行达成协议。”这次会议反映出美国对台海冲突的关切和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在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国务院“亲中派”和“亲台派”在美国对台军售问题上的较量和斗法。

时间到了1981年,“亲中派”以基辛格的继承人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为首,包括了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何志立(John Holdridge),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洛普(William Rope)和驻华临时代办傅立民(Charles Freeman),试图着手解决对台军售问题。黑格最初的意图是,一方面,向北京提供最先进的武器和科技,另一方面,又继续向台湾出售新型喷气式战机。在他看来,这种方案的好处显而易见。从

政治上看,美国可以据此显示台湾关系法的战略意义,安抚那些反对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人。从经济上看,批准台湾的军火订货,又是里根总统对他忠实的支持者诺斯洛普公司的酬谢。至于北京方面,能够得到最需要的先进的武器和科技,想必也会乐见其成。事实上,最受欢迎这个方案的,倒是白宫和国务院的“亲台派”。里根的国家安全助理艾伦和美国驻台代表李洁明,正在积极奔走,力图促成对台出售FX战机的交易。但是,中国政府强烈反对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特别是FX战机。

是年8月,黑格通知北京,他已经拟订好了一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清单,并急切盼望北京的军购首席代表刘华清来访商谈。但是,他被告知,刘的访问已被取消。与此同时,邓小平接见了香港媒体,明确地表示,美国的做法,将导致两国关系的倒退。邓的警告绝非虚声恫吓。早些时候,在荷兰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潜艇之后,北京驱除了荷兰驻华大使,并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国务院中国科的官员私下议论道:“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闹翻的局面。”傅立民从北京得到的消息颇不乐观,而洛普则忧心忡忡。10月3日中国副外长章文晋访问国务院,洛普做谈话记录。他对章文晋所说“情况会急转直下”印象深刻。事后他立即呈交黑格一个备忘录,建议里根总统利用在墨西哥坎昆出席南北高峰会议之机,通知中国领导人,美国已经决定不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他引用了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声称台湾并不需要此类战机,并且强调这个问题的政治影响非同小可。他指出,中央情报局持有同样看法,“如果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机,可能导致美中关系出现裂痕。”

黑格对洛普和国务院中国科的反应十分不

安。他把何志立，洛普和少数几个官员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他找到了一个新的解决办法。第一，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事，可以继续进行。第二，将FX战机的交易掉包。让诺斯洛普公司作些改动。国务院可以对北京说，这是对美国一直向台湾提供的F—5E台湾现役战机的改型，并非FX。改型后的战机具有FX的全部性能，但外界无人知晓。洛普立刻表示反对，他说：“如果我们这么干，结果一定穿帮。”黑格认为北京不会知情。但洛普坚持说，这是瞒不了北京的。他们可以从国际防卫杂志的报道中发现其中奥妙，而且他们的朋友，像前助理国务卿豪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等人，也会把真相告诉北京的。

和许多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一样，洛普毕业于耶鲁大学，曾是1973年美国驻华联络处最年轻的外交官，对中国事务具有极大的兴趣和了解。他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官僚，而且相信，如果美国试图掩盖事实，结果必然“适得其反”。于是他联络他的耶鲁校友傅立民，以及国务院负责政治和军事的办公室主任帕特和何志立，希望一起来说服黑格。但与黑格同为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何志立，虽然支持洛普的观点，却不愿拂逆上司的意愿。

在坎昆南北高峰会议上，中美两国领导人会面，谈及美国对台军售，但没有达成任何共识。问题交给了两国外长解决。黑格原打算在10月23日会见中国外长黄华时，阐述一下他的计划。但是，他却无法开口，因为黄华交予黑格的一份外交公文，口气之强硬让他瞠目结舌。

在这份外交公文中，北京明确要求美国停止对台军售。这一目标可以分期实现，但美国必须确定最终日期。在现在和最终日期之间，美国对台军售的水平不能超过卡特政府的水平。而且，必须

逐年递减，直到最终完全停止。黄华说，如果美国政府拒绝这一要求，北京将降低两国关系的层次，召回大使。黄华还说，希望美方在一周内给予答复，因为届时他将赴华盛顿面晤里根，向他表达中国的立场。令黑格更为惊讶的是，黄华与里根会面时，果然态度强硬，丝毫不怕激怒总统。他估计，黄华一定得到了北京最高层的详细指令。

黑格感到气愤和挫折，也认识到事情可能会是“一场大灾难”。他又找来何志立、洛普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商讨。众人一致认为，他们无法确定“最终日期”。但是，洛普仔细研究中方文件，突然感到，北京的立场并非没有转圜余地。北京要求美国对台军售逐年递减，更为关键。他指出，卡特政府的最后一年，对台军售特别高，达到了8亿3千5百万美元。黑格可以向北京承诺，美国无意超逾这个界限。洛普认为，北京实际是在寻求一种原则性的与过渡性的安排，因此双方可以妥协。最后黑格和他的高级幕僚们决定，利用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十周年之际，再次发表一项联合公报，宣布双方在对台军售问题上的原则共识。洛普提出，美国同意对台军售逐年递减，但以北京同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前提。紧接着，他又设想，不久前北京公布的叶剑英对台声明，可以证明和平意愿是北京的“长期政策”。感恩节当天，洛普和他的工作班子受命赶拟总统的备忘录，在此基础上，国务院起草了可供中美公报使用的美方文本。黑格立即批准了这份文稿。1981年12



1982年9月30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

月初,它被放到了里根椭圆形办公室的桌子上。

“亲台派”极力反对切断对台军售。他们以国家安全助理艾伦(Richard Allen)为首,包括时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伍夫维兹(Paul Wolfowitz),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的部长助理阿米塔奇(Richard L.Armitage)以及驻台代表李洁明(James Lilley)等。艾伦在一次与中国大使晤面时,曾粗暴地打断大使对中国立场的说明,提前退场。阿米塔奇支持国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否决对华技术转让申请。李洁明接到黑格指示,让他说服台湾接受美国最终停止军售的决定,他却回电说行不通。伍夫维兹更是两次撰文,公开批评黑格对北京让步太多。但是到了1981年底,形势发生了有利“亲中派”的变化。首先,艾伦因受贿丑闻下台。其次,波兰危机严重,可能引发美苏冲突。美国朝野意识到,在这种形势下,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是对付苏联挑战的必要手段。

1982年1月,里根下决心解决军售问题。1月6日,洛普奉命草拟了总统的决策备忘录。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恒安石(Arthur Hummel),开始负责与北京的谈判。何志立、洛普、负责欧洲事务(包括波兰)的国务院官员戴维斯(John Davis)等六人组成的谈判小组飞往了北京。从美国方面披露的材料看,接下来七个多月的谈判充满了戏剧性,需要专文描述,这里暂且不表。值得自豪的是,谈判尚未开始,中国就已经占据了主动,把对手推到了它的政策底线。8月17日,联合公报最终签署。对美国来说,最重要的一段文字是: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由于里根坚持,洛普文稿中“最终停止”军售的提法,变成了比较含混的“最后的解决。”联合公报签署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恒安石。邓用开玩笑的语气对美国大使说,希望美国

逐步递减军售的幅度,一年不会少于一美元。其中深意,自然不言自明。如果美国能够严守联合公报的诺言,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哪怕再慢,“最后的解决”也会是“最终停止”。

八一七公报是对“亲台派”的重大打击。但是此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完全信守公报的原则。特别是1992年,李洁明、伍夫维兹和钱尼(Richard B.Cheney,时任国防部长)联手促使布什把F—16战机卖给台湾。中美关系经历着起伏,美国国务院中国专家的仕途亦是如此。在一段时间内,“亲台派”的力量又占了上风。黑格将军为促成中美谈判不遗余力,与“亲台派”多次冲突,并且竭力阻止里根向台湾出售军事零件。1982年6月,他却不得已提出辞职,挂冠而去。不久,何志立被外放到印尼做大使(伍夫维兹接替了他在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职务),傅立民被调离了驻华使馆和中国科,洛普则被调去处理南欧和土耳其事务。他们的涉华工作,为期不可谓太长,但是,他们的努力和贡献,却令人长久铭记。

(作者系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汇款订杂志
即可获图书

局订和汇款订并单

邮发代号: 82-723
月刊, 单价5.50元
年定价66.00元, 可以破订

地址: 北京复兴路四号
中联部当代世界杂志社
邮编: 100860
电话: (010) 83907147
83908407
E-mail: ddsjcn@263.net
ddsjzz@163.com
http: www.ddsjcn.com

本刊有少量近几年合订本
每本定价60.00元
可直接向本社邮购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 全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敬请 当代世界

权威解析世界焦点 深度认知国际关系

当代世界风云变幻, 集权威、知识、趣味性于一身, 熔世界最新信息为一炉的《当代世界》, 自然成为中等以上文化程度、欲深度认知当代世界读者的首选杂志。

《当代世界》作为全国社科类核心期刊, 紧紧依靠中央外事部门, 以各大院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为主要依托, 拒绝粗浅表述, 注重以独特视角来权威解析世界焦点、深度剖析国际关系, 传播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生活信息。

《当代世界》每期均呈送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和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参阅, 并赠送各国驻华使领馆。许多文章引起各方关注, 其政治和社会影响独特, 文章转载率连续多年居同类刊物前列。

《当代世界》主要栏目有: 本刊专稿、专家论坛、焦点透视、世界纵横、政党世界、风云人物、经济瞭望、军事管窥、历史揭秘、世界博览、他山之石、书海流连等。

《当代世界》为国际流行大16开, 64页。

2008年更有值得您期待的改版。

任鸿隽‘科学’理念 的社会意义



张绪山

任鸿隽

任鸿隽(1886—1961)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卓越的科学活动家,科学社创始人之一。1909—1911年留学日本,1913—1918留学美国。留美期间曾任《留美学生季报》总编辑,并于1914年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月刊。1918年10月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3年参与“科学与玄学”论战,是丁文江之外科学派的主要战将之一。1922—192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东南大学副校长。1925—1935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专门秘书、董事、干事长等职。任鸿隽终其一生都在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科学精神的培育奔走呼号,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文化运动以后,“科学”与“民主”成为中国社会追求的目标,“科学”的威望已经确立起来。胡适在1923年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序)但是,对于舶来品的科学,整个民族对其本质的认识是肤浅的,不消说普通民众,就是大多数文化人,对于“何为科学”、“何为科学方法”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仍然是不了解、不清楚的。因此,任鸿隽不得不煞费苦心,首先从“科学”思维的常识讲起,向国人阐明“何为科学”、“何为科学方法”的基本道理。

对于“科学”的理解,任鸿隽不同于同时期大多数文化人的泛化倾向,他对科学的定义是:“科

学者,知识而有系统之大名。就广义

言之,凡知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知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学。”他强调科学方法对于科学的重要性,“今之物质与数千年之物质无异也,而今有科学,数千年前无科学,则方法之有无为之耳。诚得其方法,则所见之事实无非科学者。”他非常赞赏并多次引用哈佛大学校长爱里亦脱(C.W.Eliot)关于东西方思维习惯差异的见解:“东方学者驰于空想,渊然而思,冥然而悟,其所习为哲理。奉为教义者纯出于先民之传授,而未尝以归纳的方法实验之以求其真也。西方近百年之进步,既受赐于归纳的方法矣。……吾人欲救东方人驰骛空虚之病,而使其有独立不倚、格致事物、发明真理之精神,亦唯有教以自然科学,以归纳的论理、实验的方法,简练其官能,使其能得正确之智识于平昔所观察者而已。”任鸿隽认为,“驰于空想”而惰于实验是国人探求知识的习惯,是传统思维的大缺陷,是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重要原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第1卷第1期。)

为了说明科学研究以自然事实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特质,任鸿隽反复强调,“科学的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科学家以自然界的现象为研究对象,应具备进取精神并掌握实验原则这两个前提:“第一,他们以为自然界的现象,是无穷的;天地间的真理,也是无穷的。所以只管拼命的向前

去钻研,发明那未发明的事实和秘藏。第二,他们所注意的是未发明的事实,自然不仅仅读古人书,知道古人的发明,便以为满足。所以他们的工夫,都由研究文字,转到研究事实上去了。惟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要是专靠文字,就可以算科学,我们只要卖几本书就够了,又何必费许多事呢?”(《何为科学家》《新青年》第6卷5号。)他反复强调,“我们的东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中国几千年求学方法上的一个大毛病,就是重视心思而轻视官感,换言之,就是专事立想,不求实验,其表现是,对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讲得天花乱坠,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始终没有一个正当解说,脱不掉以故纸堆为研究材料的老路。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科学方法”,以逻辑原则为科学方法的全部,从这个原则出发,强调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与近代西方科学家研究活动的一致性,认为顾炎武、阎若璩的方法同伽利略、牛顿的方法是一样的,戴震、钱大昕的方法同达尔文、巴斯德的方法也是一样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由于忽略了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中的实验原则,胡适将墨子、程朱和清代的中国学术都称为“科学方法”,墨子、朱熹和清代朴学大师都变成了“科学家”。

针对胡适等人所坚持的这样“科学”概念,以及以“整理国故”来落实其“科学方法”的做法,任鸿隽明确表示不以为然:“近来我们的朋友,很有表彰汉学的科学方法的;其实他们所做到的,不过训诂笺注,为古人作奴隶,至于书本外的新智识,因为没有新事实来做研究,是永远不会发现的。”(《中国科学社第六次年会开会词》《科学》第6卷第9期。)他突出地强调近代科学方法的实验本质:“凡言近世科学的历史,必推英人培根为鼻祖。因为他注重归纳的方法,主张凡学须从实验入手。这实验两个字,就是近世科学的命根。”(《外国科学社及本社的历史》,《科学》第3卷第1期。)又说:“今之科学,固不能废推理,而大要本之实验。有实验而后有正确智识。”(《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第2卷第12期。)这样的科学方法论,在新文化运动一代文化人中是非常突

出的,不独有别于人文学者胡适,也有别于同为科学家的丁文江。

丁文江在当时被认为是“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作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其工作性质使他非常清楚实验原则对科学研究的意义,然而,他在很多场合对科学方法作了泛化的诠释(至少在科、玄论战时期是如此),如认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通,科学的贯通,不在它的材料,而在它的方法。爱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谈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将爱因斯坦、詹姆士、梁启超和胡适的研究相提并论,实际上只是突出了其研究活动的相同点,即逻辑原则。他之所以如此,乃是客观环境使然。在中国文化传统缺乏严密逻辑体系的事实面前,丁文江所希望看到整个国民都能像他一样,“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逻辑原则,是普通人加以努力也可以做到的,但实验则不同,它不是空口白话或几本书就可以办到,而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并且具备相当的设备才能实行。他对科学方法的解说显然与他普及科学的使命有关。

二

爱因斯坦认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一是以欧几里得几何学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二是文艺复兴时期证实的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的重要结论。(《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574页。)换言之,严密的逻辑原则和系统的实验原则是科学思维方式的两大基本要素。任鸿隽的“科学”理念所强调的正是这两个原则。

科学在本质上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科学各学科取得的具体成就,一是统御科学各学科的思维方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提到的“科学”概念,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它的思维方式。科学精神包括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一是坚持客观事物有规律可循的信念,没有这种信念人们就不会去从事研究活动。这是形而上的方面。二是坚持获取知识

的两种最基本的程序,即逻辑和实验,不通过这两种程序人们就没有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规律的途径。这是形而下的方面。这两个方面使科学区别于迷信和巫术。因此,坚持“科学精神”或“科学态度”,说到底,就是坚持以严密的逻辑和系统的实验手段的密切结合,作为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根本途径。逻辑推理和系统实验二者缺一不可,仅以逻辑推理还不能保证一定达到真理,因为逻辑不以实验(而且是反复的实验)来检验,其本身并不能在论证中区别诡辩论,只有“系统的实验”才是思想认识正确与否的终极检验标准。在社会活动中,“系统的实验”主要表现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实践出真知”这句话所强调的,正是实践的最终检验作用。坚持逻辑推理和系统实验二者在认识社会和自然事物中的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性,意味着掌握了科学精神的精髓。

“大革文化命”时期,“一句顶一万句”的口号响彻云霄,甚至连那些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人们都被迫信从;“大革文化命”结束后,又有人提出两个“凡是”。从科学思维的角度,“一句顶一万句”和两个“凡是”的错误在于,它们都是以政治权威作为真理的评判者。以权威(政治的、宗教的、学术的)的思想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意味着忘记了科学思维的基本要求,其错误在于:一是任何权威的思想本身并不能证明自己就是真理,它本身必须同其任何思想一样接受理性逻辑的审视和评判;二是它是不是真理,关键在于它是否经得起实践(实验)的检验,权威的思想不能享有不受实践检验的特权。单纯地以所谓的权威理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违反科学的根本要求。

我们注意到,在当下“传统文化潮”升温的氛围中,有人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找到“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以证明这些东西在中国属于“古已有之”。于是,《中庸》里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被一些人总结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其实,包括《中庸》在内的中国传统经典所教给人们的,只是有关“人事”的学问,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哲学,属于任鸿隽早已批评过的“冥然而悟”的修身功夫。谈“科学精神”离开“客观事实”这个前提和科学思维方法这个手段,是不可想象的。

新文化运动之后的80余年中,科学在中国

的发展成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难以想象的。不过,据此断言科学精神已深入人心,为人所正确掌握和领会,则是言过其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坚持“科学精神”或“科学态度”就是坚持“科学思维方式”这一核心要点远未被人们透辟理解。人们讨论“什么是科学精神”,往往列举出诸如“怀疑”、“无私”、“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创新”等等一些特点为主要内容。这些内容不能说与“科学精神”全然无关,但绝不能说得其要领,因为这些特点只是“科学精神”的“外围”而不是核心。所以,我们看到的事实仍然是,“科学精神”至今还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的状态。有的学者感到难以对“科学精神”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于是干脆认为这个名词是一个“模糊概念”,甚至说“科学精神不是 $1+1=2$ ”!但问题是,既然连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都说不清“科学精神”为何物,又怎能让我们的普通民众对“科学精神”有清楚的了解?既然不能有清楚的了解,又怎能要人们弘扬这个莫名其妙的“科学精神”?可见,对“科学”这个名词的熟悉和滥用,并不说明掌握了“科学精神”的精髓。确立和普及科学精神——即坚持科学的思维方式——在我民族仍是任重道远的艰巨任务。

(责任编辑 徐全庆)

敬告作者

一、投寄我社的稿件,三个月内未接到拟刊用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二、不刊用的稿件,凡打印文本和手写短稿,不予退稿;手写长稿,如作者要求,可退稿,请在投稿时付足退稿邮费。

三、向我社投寄稿件时,不要寄拟配发的照片,待我刊决定刊用后再与作者联系。

四、拟向我社投寄两三万字以上的长文和长篇书稿,请先与我们联系,经同意后再寄,以免丢失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五、向我社投稿的作者,请在稿件上注明详细联系方式及作者本人的身份证号码。

《炎黄春秋》编辑室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资中筠

自“五四”运动先驱们提出“德、赛”二先生，曲折走来到今天，终于“民主是个好东西”公开见诸权威报刊，最高领导人公开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进而阐明：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不再冠以“资产阶级”，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讨论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民主是对专制而言，作为一种制度，其核心一是公民参与，二是权力的监督。人类在文明进步中经过长期摸索，建立起一种机制，保证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同时明确各类掌权者的权限，并受到各方监督，杜绝某一个人或一小群人有“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就是民主制度。我们一般想到民主，往往先想到议会和选举，于是又会联想到议会和选举的种种流弊和实施的困难。事实上，如果没有完善的配套机制，单纯的选举并不能真的体现民意，而且确实可以弊病百出，中外“贿选”、“黑金政治”例子不胜枚举，不必赘言。实际上民主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必要组成部分是法治和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指的公开表达意见，不是私下议论。民众议于野，自古以来就存在，尽管专制君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甚至使出密探举报、鼓励互相揭发等等手段，也很难杜绝街头巷议。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必需有公开发表，形成“舆论”的途径，那就是新闻媒体和各种出版物。因此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分不开，而且必须受到法律保护。新闻自由至少有几层意义：

首先，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公民参与”必须

建立在知情的基础上。新闻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传播真相，所谓“知情的公众（informed public）”才是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消除无知，一是普及教育，二是发展新闻事业。毋庸赘言，愚民政策是与民主不相容的，如果公众参与政治，那么他们必须有机会了解与其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国家的主人——相称的信息。

舆论更主要是实行监督的功能。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已经没有争议。监督有两种：政府内部的互相监督和公众的监督，而后者更重要。因为，如果只有政府内部的监督，而不为广大公众所知，也无法参与，那么无论制度设计得多么精致严密，最终流于无效。中国历朝历代不乏“言官”的设置，“谏议大夫”、“御史”、“监察”等等，也不乏直言敢谏尽责的官员，甚至以身殉职，但总是正不压邪，无法挽救朝政的腐败乃至灭亡。即使在现代，如果设想西方国家的国会的争论都是在秘密中进行，公众不得与闻，媒体不得报道，或只许根据权威发布的内容报道，那么，难免形成暗箱交易，议员虽是民选，其作为选民代言人的资格就值得怀疑了。现在基本的事实是，除了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议题外，欧美国家大部分讨论都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每个议员的立场、对议案投票的记录都是透明的，才能使各方权力和利益得到公众的监督。

在民主制度中，新闻自由的基石之一是自由批评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而对于在位者，运用手中的权力压制批评是一种很难抵挡的诱惑。所

以,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独立前后,争取新闻出版自由也是在与政府干涉的反复斗争中实现的,而且同法律的完善过程相一致。美国独立之后,那些高呼“不自由,毋宁死”的开国元勋们成为执政者。他们如何对待反对自己的舆论,关系到美国向何处去的选择:是继续进行社会变革,把那些战斗口号付诸实施,还是地位一变,立场就变,转而压制言论自由?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宪法通过以后,紧接着通过的十条修正案,称《权利法案》,至关重要。因为它用明确无误的语言杜绝了任何侵犯信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法律的出台。同时,开国的执政者的决心也非常重要,特别是杰斐逊以坚定的信念维护新闻自由不遗余力。

在台下时倡导言论自由是一回事,对杰斐逊最大的考验是在他当选为总统之后,对待反对政府的舆论是否采取“叶公好龙”的态度。那时的反对言论并非温文尔雅的说理,而是包括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谩骂乃至人身攻击,并且对公众是有影响的。这种攻击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忍了下来,坚持做到不借助强制,光凭自由讨论来宣传和保护真理,来保持政府行动和观点的纯洁和正直,以此作为对民众判断力的信心的考验。对于那些真正的造谣污蔑如何处理?美国后来通过的有关诽谤罪的法律确立了“只有事实真相才可以用于诽谤诉讼辩护”的原则,而废除了旧的从英国继承来的政府可以以“煽动性诽谤”罪起诉公民的法律。这就是把政府与私人放在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从此新闻界以及任何个人对政府以及上至总统的任何政要的揭露、批判,和对私人一样,是否构成“诽谤”,只看是否属实,与对方身份无关。也就是说不能因为被批评的是政府官员就构成“煽动”或“危害社会”罪。在这种法律制度下,美国各届领导人经得起“骂”,也是一种基本功。

这种新闻自由对美国的社会改良,最终避免动乱保持稳定,起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和事件上,总是先有强大的舆论,然后有改革的法律、政策、措施。例如20世纪初期美国在急剧工业化过程中两极分化日益尖锐,权钱交易,政治腐化严重,此时美国新闻报刊重拳出击,对各种社会不公、丑恶现象、富商、高官痛

揭痛批,出现了著名的“耙粪”文学,与其他社会进步力量共同促成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进步主义”改良运动,对美国一个世纪的长治久安有深远影响,新闻工作者获得了“人民斗士”的美誉。还有我们熟悉的上个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等等。平时无处不在的对时政和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批判不断,对社会起到净化作用,更不必赘言。

就在今天,小布什政府的内外政策无时无刻不在舆论的监督批评之中。9.11以后一个短时期内美国人感到空前的危机,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情绪,新上任的小布什政府得到了不寻常的支持。大约从2002年下半年起,国内置疑布什政府政策取向的声音逐渐升起,包括反对攻打伊拉克。随着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的局势混乱,付出的生命和财政的代价日益高昂,更重要的是,以反恐为名,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反对的意见日益强烈。翻开《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大报,几乎没有一天没有批评政府内外政策的深度报道和社论。使美国在全世界蒙羞的虐俘事件,率先曝光的也是美国和英国的媒体,美国国防部长曾要求电视台晚一些发表那些照片,免得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处境更加不利,却遭到媒体拒绝。这种揭露,尽管一时间使美国政府处境尴尬,但是事实上促使政府采取措施使坏事得到控制,实质上当然对美国有利。

批判者的武器主要还是美国宪法的“权利法案”,而维护现政府政策的反批评者的武器则是“爱国”和“安全”,即指责批判者危害反恐斗争是不爱国行为。对此,批判者的回答是:他们保卫的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如果这一凝聚各族裔美国人的原则精神遭到破坏,美国就将变质,就不再是美国,也就无所谓“安全”。最激烈的言论是:美国不毁于恐怖主义,而将毁于决策集团中“新保守主义”之手。

可以设想,如果美国政府官员有权力压制新闻,对待逆耳之言或封报刊、或追究罪责,甚至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有关人士,他们未必不会这样做。事实上,当政者已经尽其所能缩小和掩盖真相,但是在美国的制度下他们无权封杀舆论,这就是美国的自我纠偏的机制,也是其希望所在。不但如此,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

丹·拉瑟因为独家率先报道美军虐俘丑闻，获得在纽约颁发的64届“皮巴迪广播节目奖”。举报虐俘事件的美军士兵约瑟夫·达比也获得著名的《肯尼迪勇气奖》，报刊高调报道。说明媒体和公民自揭家丑的传统和勇气还是得到承认和鼓励。虐俘事件可能是一个契机，唤起美国的社会良知，促使思想精英重新全面审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策和理念。

讲美国，只是举例说明一种普适性的内涵和民主的必要条件。当然，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施民主的形式和途径有所不同。说它不言而喻，因为纵观历史，横观世界，即使方今已经公认的欧美民主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形式也都是不同的。这点无人否认，所以根本不必担心全盘照搬某一个外国的制

度，即使有人想照搬也搬不了。相反，过分强调“国情”却足以成为阻碍民主进程的借口。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民主普适性的内涵。

另外，思想、言论自由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有助于造就善于独立思考、心胸坦荡、富于正义感、诚实勇敢的高素质国民。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会当然比“万马齐喑”的社会有活力。一国的国民如果长期思想禁锢，从小就培养察言观色，按一定“口径”发表言论，不敢讲真话，甚至已经不知独立见解为何物，长此以往，民族精神只能不断萎缩，靠虚骄的豪言壮语，是振兴不起来的。这样的精神状态而求其堪与世界竞争的创新能力和出现世界级思想和学术“大师”，无乃缘木求鱼乎？

(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接第56页) 哈尔滨，从此再没有见到毛泽东。尽管如此，萧军对毛泽东是非常热爱和崇敬的，直到晚年，仍然感念不已。毛泽东主席逝世时，萧军先生满怀悲痛赋诗悼念。

诗云：

万众同悲殒大星，古今中外拟何从？
一生赍志拯中国，天地为心济世穷。
八亿黎庶活化雨，千年古木挹春风。

谆谆遗教篇章在，涕泪抛将读大经。

“四人帮”覆灭后，党中央为萧军先生彻底平反，称赞“萧军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晚年，萧军先生重返文坛，焕发青春，又写了不少好作品。应该说，萧军先生在大节上是遵照了毛主席的教诲，没有辜负领袖的期望。

(责任编辑 萧 徐)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4641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7 84608848

邮编：100027

网址：<http://www.sw-tl.com>

解决听不见听不清
耳聋耳鸣的烦恼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 民主是科学的保障

章立凡

“科学的发展观”是当今中国大陆的主流话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举国上下不会有异议。本文要说的是——民主也是发展观,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

我这样说是根据的:自五四运动迄今,“科学与民主”历来相提并论,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大国”(且慢侈谈“崛起”),没有科学或没有民主,都是无法想象的。最近,胡锦涛主席着重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历史上有科学而无民主的“大国”,不是没有出现过。例如法西斯德国和极权主义的前苏联,科学不谓不发达,却难逃崩溃命运,殷鉴犹自未远。返观本国历史,古代科技文明有“四大发明”,至今为人津津乐道,但封建专制主义崇尚道统而鄙视科学,斥之为“奇技淫巧”,最终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坚船利炮前败下阵来。可见,没有民主也会窒息科学的发展。

中外的专制政体,不论有无科学这个“第一生产力”帮忙,都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在1945年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宣称:“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著作中,对民主宪政、自由和人权等都有充分的表述。由是看来,他在野时是认同民主的发展观的。

毛泽东多次表示过对发展科学的重视,对科学家的态度也远比对人文学者宽容,即便到了“文革”时期,仍主张“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他在1956年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与反对苏联在遗传学领域抬高米丘林学派压制摩尔根学派

有关。如果言行一致,“双百方针”就不仅限于文化上的指导意义,同时成为科学与民主之社会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遗憾的是,当处于执政地位并垄断了社会资源后,对民主的说法开始变调:“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毛泽东此后的一系列作为,就越来越偏颇了。没有民主,就难于有科学决策,“反右”后没有人敢讲真话,才有了全党全民头脑发昏的“大跃进”,造成了2000万的人口负增长。

在全国大饥荒的背景下,中国研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无疑是科学成就,但“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的豪言壮语,决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利用“大民主”手段发动“文化大革命”,推翻了依照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也决不是民主的发展观,因为“文革”不仅违宪和侵犯人权,而且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违反了自己正确的东西”,这也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有定论的。共和国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科学与民主不可偏废,如若没有民主,即便倾全国之力尽科学之成就,发展观也仍然是不科学的。科学与民主发展观的缺位,令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至少推迟了二十年。某些人至今不许触摸历史的耻部,但一个不知反省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更谈不上发展观。

中国在“文革”结束后告别“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后,改革开放中的发展观问题一直没有妥善解决:靠领导“拍脑门”决策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比比皆是;伴随经济繁荣产生的官场腐败一发不可收拾;资本二度原始积累的罪恶,左右两方都在强烈抨击;

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贫富悬殊,令改革备受争议。

有卫道士以“黑窑奴工事件”为口实质疑改革,谴责人吃人的剥削,疾呼腐败将致“亡党亡国”,抵制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他们也在伸张自己的民主权利,同时却拒绝反省僵化的意识形态,反对政治体制上的民主探索。这些同志们对亡党的担忧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找到了病开错了药: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农业社会的乌托邦主义已无路回头,中国改革绝不可刹车倒退,中国也绝不会灭亡。

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原罪,是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到共和国成立时,已历时一个多世纪。建国时确定的经济方针,是私人资本主义还要发展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决策者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提前发动对资改造,消灭了市场经济,接下来发动的“大跃进”和“文革”,带来了深重的经济、政治灾难。我们的发展观出了问题,才使现代化吃了夹生饭,生产力发展低下的后果是平均分配贫困,人民没有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鉴于这种历史教训,中国在1980年代回到原先的出发点,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开放使民营经济迅速崛起,资本开始了新一轮原始积累,同时也成为政权滋生腐败的营养源。社会转型的前后反复,令资本犯下两次原罪,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成本重复支出,这是以往发展观缺少科学与民主造成的。政府未能“节制资本”,需要质疑的不是改革,而是有待体制的改革。

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传统,公权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监督,特权很容易垄断资源,无偿的剥夺比有偿的剥削更可怕。激起全社会公愤的黑窑奴工事件,本质上是社会人权问题。一些地方政权的黑社会化,其实是会党政治传统的孽种。贪污、浪费和官商勾结下的巧取豪夺,侵犯的是公众的财产权利;危害人民利益和健康的伪劣产品,是对财产、人身权利的双重侵犯;以邻为壑罔顾民生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侵害的是中华民族及其后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追究产生这些社会罪恶的根源,归根结底在于没有让人民强有力的来监督政府。惟有人民有权,才会政府有能。

目前处于“工程师治国”时代的中国,比起“外行领导内行”时代已是一大进步。工程师的思维特点,是设计周密,计算精确,专业性强,如今各种社

会项目率以“工程”命名为时尚,不谓无由。但社会是发展中的活体,而非钢筋水泥浇筑的工程,没有百年不变之理,体制必须适应社会的变化。将社会建设视为工程,难免囿于“技治主义”的视角而“以手段为目的”,亟需拓宽人文视野,着眼于道德、文化的重建,建设一个公民社会。

在“文革”造成的道德文化真空下,信仰出现危机,全民趋于功利,科学未能免俗。决策过程中流行一时的“专家论证”,如今已大大贬值,于是封建文化沉渣泛起,欲乘机填充社会工程架构中的思想空间。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低层次组合,前途仍然是“科学与专制”,社会不可能良性发展。没有民主撑腰,科学与文化在专制之下都是婢女,在利禄面前只有腐败。中国科学拿不到诺贝尔奖,学术出不了大师,原因就在于此。

上文已经指出,以科学技术辅佐专制,中外历史不乏先例。今年流行于民间的奥斯卡获奖片《窃听风暴》(又名《别人的生活》),是监控思想的又一范例。自由表达和交流思想,是一项基本人权,科学理应服务于社会的文明开放,科技工程在公权力下介入亿万公民的生活,只会增加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和谐。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随时“触及灵魂”的时代早就结束了,控制思想的科学技术,是对科技文明与进步的莫大讽刺。

以“赛先生”挟制“德先生”或以民生换民主,都不是很健康很完善的社会发展观。从“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到“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是执政理念的进步。从“科学的发展观”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日趋完备,科学、民主和法制都讲到了,关键仍在于实践。对政治体制的选择与改革,不仅仅是执政党的事,更是中国人民的事。全体公民根据宪法享受自由并行使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与监督,公平分享经济繁荣的成果,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科学是民主的温床,民主是科学的保障,民主和科学一样,是社会发展观的两个方面。“科学与民主”不仅是人类的普世价值观,也曾是中国社会各进步阶层的社会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快五十八年了,理论界不久前还在清谈“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常识,我不知是喜是悲……

(责任编辑 萧 徐)

孙冶方的“最小最大”公式

冒天启

“最小最大”是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经济常识，但却被我国经济学界公认为是孙冶方公式。

孙冶方是上个世纪初踏上革命道路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50年代中期开始，他以自己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引领了一个时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他以崇高的道德情操和治学品德，给经济学人树立了做人治学的榜样。在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他命名的“经济科学奖”在全国享有崇高威望。

孙冶方经济思想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即“最小最大”是他整个经济学思想的一条主线。“最小最大”本来是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经济常识，但孙冶方却以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思想立论，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经济实践，用“最小最大”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教训，批评在“政治挂帅”下所出现的高消耗、低效益的痼疾；用“最小最大”判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真假，批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的弊病；用“最小最大”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重新编写中国的理论经济学。他用大半生的科学研究实践，使“最小最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绽放出了新的理论光彩。

孙冶方由“最小最大”而形成的主要理论包括：价值规律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效益低、浪费大，就是因为缺乏价值观念，要改革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是独立核算的生产单位，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内的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要改革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体制；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在价格合理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都是企业技术

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利润指标是企业管理的“牛鼻子”，要改革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制度。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代谢过程，要研究流通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流通渠道、购销形式、网点设置等等。到70年代末，孙冶方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批评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认为斯大林把所有制形式从生产关系中独立出来，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归属”关系，用政治运动来调整财产归属，把基于经济的所有，变成了基于暴力的占有，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经济利益关系。

孙冶方经济思想和改革主张，是左的指导思想日益膨胀的50年代中期后逐渐形成的。在那个令中国知识界心悸的年代，孙冶方独树一帜，为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经济学家的科学性高度统一，历经坎坷，进行了艰苦不懈的努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篇。经济学界公认：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最早倡导者；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他的理论活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极具开拓性。孙冶方在他从事科学研究的大半时间里，面对无休止的运动、批判和斗争，很少享受到一个科学家所应有的人格尊严，但他不畏权势，独立思考，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真理而勇于献身。60年代初，他曾被当作“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遭受批判，他毫无顾忌之虑，坦然地对批判者说：“错误的观点已经流行了半个世纪，要解决几十年的疑案，是要冒几分险的，尽管你们给我敲警钟，提警告，说这是修正主义，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以后也不准备检讨。”“文革”开始后，孙冶方被投入了监狱，他却毫无怯懦之

意,坦诚地对监管人员说:“死不足惜,名声毁了也不要紧,但是我长期从事研究的经济观点不能丢,我要为自己所坚持的真理活下去,要在死之前,把自己的见解留下来让群众去裁判!”在监狱的这一特殊环境中,他坚持对经济学问题的思考,用默忆的方法,对《社会主义经济论》22章183节在脑海中过了八十五遍,坚持每月一次,长达七年。他出狱上车对接他的军宣队员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性、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但是,孙冶方在学术讨论中,却平等待人,虚怀若谷,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意见,勇于放弃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构建严密完善的理论新体系。他不唯上、不唯书,把经济学研究始终面对实践,身体力行,多次深入农村、工厂,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到理论上加以研究,提出针对性很强的政策建议,表现了一个科学家务实求真、强国富民的胸怀。孙冶方的高尚情操和治学品德,是经济科学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

经济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实践的科学。进入90年代,我国经济实践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孙冶方价值规律内因论,是在对斯大林“自然经济论”的批判中确立的,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但是,他的商品生产外因论却又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否认全民所有制内部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这真实的反映了一位经济学家对历史的抗争和历史对他的束缚。从孙冶方留给我们的众多学术遗产看,他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的本意是要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模式去取代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为出发点,以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把费用对效用的比较即价值范畴贯穿于各章节,分析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从而揭示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这种“过程法”即对经济运行过程的研究方法,无疑要比“政策汇编法”、“规律排队法”高明得多。但实践表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搞清楚!不成熟的实践,自然也就很难产生成熟的经济学理论体

系。所以,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时至今日,也仅仅是我国经济学思想史上一篇很有价值的学术思想资料。

经济学研究,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孙冶方的一生,有两个颇让后人不解的数字:一个是 he 从事革命活动而被投入白色牢狱七天;另一个是他从事理论探索而身陷红色囹圄七年。何罪之有?是闹剧,还是悲剧?为了克服这种荒唐,有了区分政治与学术、思想问题的政策界限。这似乎很高明了,但孙冶方在1981年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此话现已为大家所接受,我也欣赏过。但是仔细一想,把政治、思想、学术(或科学)三者并列提,这对不对?如承认是对的,那就承认政治可以是无思想或非思想的,可以是不学无术或非科学的,而思想和科学则是超政治的。问题出在何谓‘政治问题’,根据一般含义,‘成了政治问题’即是“违反党纪国法的问题”,这是对政治的曲解。”因此,在他晚年,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反对“以言治罪”的文化专制主义,也以辛辣的笔调批评那种闻风起哄的“风派”,从而为经济学研究呼唤一个有体制基础和法律保障的社会环境。

1983年2月22日,孙冶方离开了我们。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理念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方向,一代代新人不断涌现,一个个新思想层出不穷,中国在和平发展,中国在和平崛起,如果孙冶方还在世的话,他一定也会对这个空前的历史变革感到深深的欣慰。

(冒天启: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87年底开始随孙冶方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任孙冶方的学术秘书并读在职经济学博士,孙冶方病逝后,受托参与整理遗稿。1985-1987年,1995-1996年先后去苏联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等高校访问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经济学动态》主编。现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评奖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

(责任编辑 萧 徐)

我的校长李品珍

胡竞成

2005年5月，我们衡阳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高20班同学在武昌聚会。这些年届古稀的老人，自1956年高中毕业分手后，穿过半个世纪的风雨，从全国各地走到一起倾诉衷肠。回忆高中生活，大家都忘不了李品珍校长给我们德、智、体、美的全面教育。最近，由彭水梅主编、杨泰波作序的《大写的人》一书出版。想不到看起来个子不高、举止文雅、和蔼可亲的校长李品珍，竟是名震湖南宁乡、福建永安、曾与郭沫若、羊枣共同战斗的老革命！还是卓有成就的《红楼梦》研究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至今97岁高龄，仍奋斗不息。

（一）创办《沔风》 宣传真理

李品珍1911年9月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自耕农家庭。他1925年投身政治活动，1926年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担任共青团宁乡县第四支部书记。他1930年入省立一中（毛泽东同志母校）前后，大量阅读进步书刊，始有了“爱与创造”人生观的构想，1931年作长文《生命论》，阐释“爱与创造”人生观。1935年9月15日，李品珍与同学黄鼎青自掏腰包创办《沔风》半月刊。利用《沔风》，将经过三年思考的“爱与创造”人生观重新阐释，认为：“这是唯一的合理人生观”。我惊奇地发现：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努力实现的创新型社会先进思想，原来70多年前已在李校长心中萌芽了！

《沔风》在揭露、批评宁乡教育落后的同时，还发表了哲理性很强的文章，很受读者欢迎，成为宁乡乃至长沙很有影响的刊物。李品珍也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政论、杂文，如：《论热情》、《道德

论》、《青年论》等，观点鲜明，战斗性很强，使国民党顽固势力坐立不安，C.C组织几欲点名取缔。

（二）抗日救亡 虎口脱险

1937年9月，李品珍根据中国共产党动员全民族实行抗战的宣言，自觉行动起来。他用毛边纸办起《抗战壁报》，同时，开办“抗敌讲座”，以显浅



李品珍与夫人郑颖于1993年合影

易懂的语言宣传抗日,观者听者如潮。10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发起为前方将士募捐寒衣活动,将被盖20床、棉背心100件、毛巾100条、力士鞋50双,敲锣打鼓送到抗敌后援会。接着,针对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施放毒气,他又办起了20多人的看护训练班,使八人成了正式护士,一人成了战地医生。1938年2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宁乡县工委书记兼任第一女校支部书记。

李品珍在宁乡建立了坚强阵地,自然为国民党顽固势力所不容。1941年农历除夕,他与祖父正在守岁,突然有人敲门。当中医的祖父以为有病人便打开门,来人一见李品珍,就叫喊,接着又拥入一伙人,为首的亮出驳壳枪:“不许动,房子已被包围了!”说着“叭!叭!”两枪示警。李品珍故意做出顺从的样子,被两个特务押出柴门。走到门外水塘尽头,听见他们耳语:“就在这里!”他知道他们要杀人了!随即一个“猛虎洗脸”,反身卡住持枪特务的脖子,特务来不及回神,李品珍已乘势将他一甩,反身从一丈多高的塘基上跳到塘下田里,接着双腿一弹,风也似的掠过了四丘稻田,弯腰跑进对面山下小水沟,后面追上来一串枪声,居然都没有打中。李品珍终于顺利冲进了夜色笼罩下的森林脱险。特务们只好在归途捉了一名农民交差了事。

这次历险,在当地百姓中传开,成了“那样斯文的李品珍会飞檐走壁,被捉住还能甩开五个拿枪的特务、跳过两米多高的围墙成功逃脱”的英雄传奇。

(三) 奔走革命 并肩羊枣

摆脱了特务追捕的李品珍,开始了长达两年九个月的革命流亡生活。他改名李达仁,先后潜至衡阳、桂林、香港,以笔名史任远为《野草》、《青年生活》、《力报》、《广西日报》及《开明日报》撰稿,为茅盾主编的《笔谈》(香港刊物)、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香港刊物)及《时代批评》撰稿。1943年10月16日李品珍来到福建战时省会、战时我国东南地区“文化名城”永安,被聘任《建设导报》主笔。该报发表了大量进步文章,评述抗战和反法西斯斗争局势,揭露和抨击国统区腐败丑恶的现实。李品珍写了20多篇社论,受到广大读者欢迎。

李品珍还和谌震等人创办了东南出版社,谌

任社长,李任经理。初期印行了当时的名著《天下一家》、《东京归来》、《联合国概观》后,许多作者将他们的著作拿到永安出版。其中有郭沫若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夏衍的《水乡吟》等。郭沫若收到绸面烫金的《浮士德》时,简直爱不释手,一再说:“印得很好,很好!校对、装帧都好。”亲自给李品珍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加以赞扬。后又把花了15年心血研究、刚刚才编好的《先秦学说述林》送东南出版社印行。此书后经郭老增补,后来成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现存北京“郭沫若著作陈列室”。正是由于李品珍带头艰苦创业,东南出版社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先后印行了30余种七八万册进步书籍。

李品珍还收集于潮(乔冠华)写的《方生未死之间》、茅盾写的《论“生活的三度”》等文章汇编成一本集子,定名《方生未死之间》。这是东南出版社出版物中最富战斗性、现实性的读物之一。李品珍为这本书写了5200字的长序。他写道:

“……我们负担着民族的不幸历史的重担,不能不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走完人家两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我们的工作繁重,任务艰巨。

……只有人性的充分发扬,人间生活才会至真至善至美。人性的体现方式是爱与创造的生活。爱人类,爱万物,爱生活;创造生活中的新事物。”

《方生未死之间》的序言不但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后来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中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上街游行时曾朗诵这篇序言,作为动员的武器。

1944年6月新闻巨子羊枣(杨潮)到永安,被聘为《民主报》主笔。羊枣请李品珍等组成“社论撰写委员会”。从1944年8月至1945年7月,共发360篇很有战斗性的社论,其中李品珍写了70篇,达10万字。今天,我们回头再看看《养成实事求是的作风》、《为民主政治进一解》、《改善儿童教育》、《完成历史的使命》、《论东南文化建设运动》、《论国民大会》、《世界政治的坦途》等篇章,仍具有现实意义。

1944年9月,羊枣创办《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任主编,李品珍、谢怀丹任编辑。从1944年9月1日出刊,到1945年6月26日停刊,共出了39期,是当时东南地区最畅销和具有较大影响的进步读物。李品珍积极协助羊枣工作,对羊枣的政治

军事论文十分钦佩，他在《羊枣与国际时事研究》一文中赞叹：“羊枣的军事评论的杰出，表现在他对每一次军事局势的重大发展的前因和各种可能的后果分析得那么透彻，敌对的双方战斗的结果往往恰如他所分析。他不但熟悉战斗双方的历史和地理，甚至对双方指挥人员的战斗性格和其指挥才能的特点都力求作尽可能多的了解，因而更有利于判断双方在战场上角逐的必然结果。”……连那些精心绘制的战地形势图，也无不出自羊枣一人手笔。”

国民党顽固势力终于对羊枣、李品珍等伸出了罪恶之手。1945年7月11日，永安少将特务俞嘉庸按顾祝同密电，命令立即逮捕重要“共党分子”福建省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谌震、福建省政府参事杨潮（羊枣）。7月12日谌震等3人被捕，7月15日羊枣、李品珍等4人被捕。后又将逮捕范围不断扩大，被捕者共达29人。这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永安发生的震惊中外的事件，被称为“永安大狱”。其中，优秀共产党员、著名记者、杰出的政治军事评论家羊枣遭捕半年后被虐死狱中，故又称为“羊枣事件”。

羊枣被虐死狱中激发的抗议和要求释放政治犯呼声达到高潮。仍囚在狱中的李品珍一方面联合狱中难友，向全国寄发“快邮代电”，另一方面通过重庆的好友林一青，将永安大逮捕情况报告民主人士冯玉祥、宋庆龄、罗隆基，罗隆基曾当面质问蒋介石。狱内狱外的斗争，特别是全国形势的好转和强大抗议力量，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1946年4月8日下令释放尚囚禁在永安监狱中包括李品珍在内的12名政治犯。

（四）教书育人 义无反顾



1986年秋，李品珍参加广铁集团公司老干部理想报告团报告“老战士林场”情况

1953年12月李品珍来到衡铁一中任校长。衡铁一中的前身是创建于1943年的交通部部立衡阳铁路扶轮中学。学校地处一个黄土小山岗，设施简陋，卫生条件差，当时学生纪律松弛、教职工思想比较混乱。李校长一上任，便深入各环节了解情况，制定治校方案。他认为：实施德、智、体教育方针，还必须重视美育与劳动教育的作用。他遵循马克思“按美的规律改造世界”的思想，提出“要把学校办成一件艺术品”。他启发学生树立“爱与创造”人生观，使衡铁一中迅速改变面貌，一跃成为名校，高考成绩连续三年（1954—1956）在中南六省名列第一，是湖南四个省级先进单位中唯一的学校先进集体。

严格自律，为人师表是李校长带领大家建校的法宝。第一是“勤”，同学们曾议论：李校长为何精力充沛，我想他是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第二是“信”，他视“诚信”为进入“爱与创造”生命流的基本条件之一，在李校长身上，从来是遵循“言必信，行必果”的原则办事的。第三是平等待人。一天中午，学生没吃饱饭，纷纷向总务科提意见。李校长亲自向学生道歉，立即让厨房再做饭，并以此为鉴，整顿食堂。

李校长曾说：“学生入校，首先要将其调教成为一个活人。”又说：“我认识到，训斥学生是错误的，批评学生也欠妥，教育学生的正确方法应当是

帮助、引导和鼓励。”这一教育思想很快被老师们所接受,从此确立了衡铁一中的新校风。所以师生关系十分融洽。

我们最爱听的,是每周开周会听校长讲话。他的话很有哲理、深入浅出,经常博得师生的热烈鼓掌。有一次他讲“爱与创造”人生观,说:“有的人心无大志、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不是人生观,是‘猪生观’。”我至今还有深刻印象。

我们最热衷的,是学校的各种课外小组活动,我们做雪花膏、肥皂,感光纸、简易显微镜、电路实验、矿石收音机、飞机模型、湿度计等,有趣又能培养动手能力,使我完成了从理性到感性的认知过程,对于我后来的学习、工作、生活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我们最快乐的,是参加学校的各种文艺活动。学校有舞蹈、话剧、合唱、乐器等团队,遇有庆典、汇演活动,每个班级还排练文艺节目,有的节目还获得市里大奖。连我这个不太爱活动的人,居然也参加排练空军舞,至今我还没有忘却那时所学的“走鸭子步”。

李品珍校长就是这样,把素质教育做到了细微之处。学校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有的市民说:“不用看校徽,就知道这是衡铁一中的学生,气质那么好!”当时省教育厅准备进一步推广衡铁一中的办学经验,终因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而搁浅。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李品珍在韶关铁中任校长。在那个没有人性的年月,虽然他为学校的教育、建设呕心沥血,仍然在劫难逃。他被监督劳动长达七年之久,轮番批斗、“即兴批斗”达四五十场之多,人格被侮辱、肉体被摧残、肋骨被打断,被囚禁在身子伸不直、腰不能弯的人间地狱。八届十二中全会永远开除了刘少奇党籍,韶关铁中党支部也作出了永远开除李品珍党籍的决定。直至1972年底才宣布“解放”。

后来,李校长回忆:“‘文化大革命’横直是‘造反有理’,也有得讲理的地方,我也就有得工夫去想自己受委屈的事。”1973年4月他又回到教育岗位,1975年去梅村主持广铁二中农村分校的工作,不到一年,把广铁二中农村分校办成广州市教育局系统的先进单位。直到1976年11月离休。

(五) 大爱无垠 创造无限

李校长离休了,但他对“爱与创造”人生观的追求没有离休,他仍然选择了继续奉献。开头,他一方面研读英译本《红楼梦》、《红岩》、《青春之歌》及《林海雪原》,一方面做《宁乡人民革命史》编撰工作,继续积极宣传“爱与创造”人生观,做青年的引路人。从1980年至今,他以70到90岁高龄,不断向各地学校的学生、教师、机关干部、工厂的工人做革命人生观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报告数百场,听众达数十万人。

李品珍对《红楼梦》的研究,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写出多篇红楼梦人物评论。1944年东南出版社出版的《贾宝玉的出家》一书中,李品珍写了长序;1948年香港千代出版社出版了李品珍写的《林黛玉的悲剧》一书。离休后,他为该书补入三篇文章,以原书名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2001年又将新作六篇加入,仍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增订精装本。

1984年,《宁乡人民革命史》被中国历史学会及中国出版家协会从2000多种史学著作中评为28种“爱国通俗历史读物”之一。

同年,李品珍看到家乡森林破坏严重、水土流失惊人,当时已73岁的厅局级离休老人,喊出“誓染故乡山水绿”的豪言,自带行李,自带钱粮,不要国家一分钱,还带上90岁的老母亲,与其他16位离退休干部一道,离开大城市,住进偏僻山乡的破房,过起了没电、缺水、漏雨、连睡床都成问题的老游击队生活,在宁乡办起了“老战士林场”。短短三年,他们为家乡义务植树4100亩、40余万株,带领群众造林3000余亩。他连续多年被评为广州铁路局优秀共产党员,1989年6月获全国老龄委颁发的“老有所为精英奖”。1991年被中组部评为优秀老干部。老战士林场亦被广州铁路分局委托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成电视片《金涛绿浪》。

李品珍校长在20岁萌发“爱与创造”人生观,就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他立志“缔造爱与创造的人间天国”这个理想,贯穿着他近百年的人生轨迹,至今97岁高龄仍矢志不渝。他说:“过着爱与创造的生活的人生,便是有价值的人生。”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怀念父亲李宇超

李晓光

2006年4月14日是父亲李宇超百岁诞辰。

父亲18岁投身革命，1968年1月11日“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终年62岁。

一

父亲李宇超，山东诸城人，地主家庭出身，在诸城高等小学毕业后，1921年入济南正谊中学，受五四运动影响，1923年起接触进步书刊，开始革命活动，被推选为正谊中学学生会长。

1924年夏，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济南地委负责人王尽美领导下，于佩文介绍我父亲参加国民党，并由王尽美介绍秘密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任济南团地委第一支部（正谊中学支部）书记，参加帮助国民党发展山东组织的工作，并任国民党正谊中学的一个区分部书记。团三大社青团改称共青团后，他任团地委候补委员。在反帝、反军阀斗争中，坚决贯彻共产党的主张，团结发展进步力量。年底，他参加了济南“非基督教运动周”活动，担任济南非基督教大同盟委员会委员。

这时期王尽美和1925年初来山东任中央特派员的尹宽对我父亲的思想帮助最大。

1925年初父亲在正谊中学毕业，他在共产党安排下到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委员，接受该委员会主席恽代英领导。五卅运动中，他是反英、反日游行的积极分子，曾与英国巡捕搏斗劫救被捕同志并遭逮捕。被释放后，他受组织委派，同康生、孟超、于达赴山东宣传和组织声援五卅运动。

二

1925年10月，父亲参加中共中央第一次军事训练班学习，由贺昌介绍转为中共党员。结业



1931年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时的李宇超和刘叔琴

后，根据中共中央军事部负责人王一飞、颜昌颐的指示，任中共山东军事特派员做兵运工作。1926年夏，调回上海任浦东军事工作员兼商务印书馆工会工作。

父亲1926年与母亲在上海结婚，母亲牛淑琴（后改名刘叔琴）是山东桓台人，1905年10月出生，1924年入党，1925年任济南女师第一个党支部书记，1926年因声援北京“3·18”惨案被学校开除，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学习。

1927年2月，父亲调江浙区党委参加组建沪中部委（书记康生）任部委委员、宣传部长。他和母亲都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4·12”后，父母更坚定了革命意志，放弃了去苏联学习的机

会，留在国内继续斗争。1927年冬，他们一起调到中央秘书厅文书科工作，同战友们为党中央印制秘密文件、宣传材料和党内刊物。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彭湃同他们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1929年春，父亲调到中央训练班学习。6月，母亲担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掩护工作。会后，他们一起调全国总工会党团，父亲任宣传部文书，母亲在秘书处工作。这年冬，父亲调中央军委训练班任书记，母亲调训练班掩护机关。刘伯承、李硕勋都曾来讲课。11月间，在周恩来领导下，父亲参加了处决叛徒白鑫的行动。

1930年夏，李立三主持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父亲奉派参加总行委机关工作。某日，顾顺章把一个说有特务嫌疑的人带到训练班，父亲批评这是对训练班的安全不负责任，因此被认为思想右倾，对组织不满，随即调离工作，给予党内警告处分。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同母亲一起调到中央特科工作。

在中央特科，父亲曾在负责情报的二科和负责行动的三科工作。郝在今著《中国秘密战》一书说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潘汉年、陈养山、欧阳新、刘鼎和李宇超都是“中共的情报奇才”。父亲参加过在周恩来领导下采取果断措施保卫党中央机关安全的行动；曾接收处理许多重要情报，看过何孟雄被捕就义前宁死不屈驳斥敌人的“供词”记录；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打入国民党的钱壮飞立即逃离南京向中央报告，父母亲担任了掩护钱壮飞在上海安全的任务。

三

1931年6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机关采取应变措施，父母亲调中央组织部招待处做联络工作，两个月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不久，父母亲调内部交通工作，父亲任内交主任。1932年9月至1933年3月，父亲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与母亲一起掩护中央宣传部机关。宣传部负责人张闻天、杨尚昆等常来这里。

1933年，临时中央迁往中央根据地后，在上海成立了由李竹声为书记的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央领导白区工作并负责与共产国际的联系。1934

年6月，上海中央局遭敌破坏，李竹声叛变，盛忠亮接任书记。10月盛忠亮被捕叛变，黄文杰接任书记，父亲任秘书长。这时上海地下党的处境已非常艰难，党的机关不断转移。在此前后，父亲受命布置从左联调来的廖沫沙建立上海中央局同江苏省委间的警报站。但数月后目标暴露，廖沫沙等人被捕。

1934年底，陕南特委军委负责人汪锋去上海治伤，父亲根据中央局决定向汪锋传达任务：一、恢复与杨虎城所属陕西省警卫团张汉民（共产党员）部党组织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决定该部要待有更大作用时起义；二、恢复红25军与上海中央局的联系；三、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意见转告红25军，肃反时对地主、富农不要消灭肉体，对富农不要扫地出门，要给生活出路；四、还要找一下红26军。汪锋于1935年3月间回到西安，张汉民部后被红25军误会打散，张汉民被杀。汪锋为营救张汉民被扣，后平反。

盛忠亮被捕叛变后，上海中央局遭受了第三次严重破坏。父亲接到敌人要动手的消息后，数次递送紧急警报，此次中央局多处机关被破坏，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等被捕，父亲是少数脱险者之一。

四

1935年5月初，党组织决定父亲同刘秉琳经西安去川陕苏区，因西安接头处发生问题，父亲返回上海后失掉组织关系，从此开始了寻找党的艰难岁月。

9月，父亲想通过文艺界同党联系，先找不相识的《涛声》编者曹聚仁转交一封信给鲁迅先生，信中暗示想找党的同志，若能帮助，请寄一本月刊，否则寄一本半月刊。10天后，他收到一本《论语》半月刊，封袋字是鲁迅亲笔。为了找党，父母亲宁过艰难生活，不谋任何职业。一年过去了，父亲痛感远离斗争，“这不是生活”。于是再次请周建人转信给鲁迅。发信后9天，即有上海党派人与他联系。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党组织曾派人与父亲取得联系说要他到苏区，不久又说不再找他联系了，于是组织关系又告中断。

1937年8月，父亲通过《救国日报》与潘汉年取得联系，潘要他参加与党有关系的第三别动队

(全称军委会江浙皖行动委员会别动纵队第三大队),由负责人朱学范安排帮助整理情报,并送一份给潘汉年。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向潘汉年表示要去延安找中央解决问题,潘写了给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的介绍信,于是他只身奔赴延安。

五

1937年10月中旬,父亲到达西安,请八路军办事处熊天荆转交潘汉年给李富春的信,并给洛甫(张闻天)发了电报,洛甫复电同意他去延安,但数日后又通知在西安解决问题后再去。这期间他被国民党宪兵以“汉奸嫌疑”罪名逮捕,经八路军办事处证明被释。以后经一再争取终于在11月上旬到达延安。但过了不久,他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软禁,要他写“交代材料”,从此开始了一年的监禁生活。直到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结束时才宣布解除监禁,释放后一面工作,一面继续审查。直到1942年2月7日,中央作了结论(组织部长陈云签署),证明他与上海党的破坏无关,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失掉组织关系期间,仍坚持为党工作,决定团龄、党龄合并按党龄计算,恢复1924年以来的党籍。在长达五年的被监禁、审查中,他虽受了委屈,但从无怨尤。

父亲1941年冬调到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室,1942年7月以后调边区政府交际处时恢复党员身份。1943年春,父亲调行政学院参加审干工作,任高级研究班主任。他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审查出有问题的人最少,没有发生冤假错案,行政学院有许多学员因此提出“要求组织派李宇超当院长”。但后来行政学院与延安大学合并,周恩来点名要父亲参加招待中西记者团工作,他被再次调任交际处秘书,进行统战工作并配合隐蔽战线的斗争。

六

1944年冬,父亲抱定“有生之年,皆为报党之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随王树声、戴季英纵队南下河南。当时我在的安塞保育小学的第



1949年8月26日李宇超刘叔琴和子女在一起

弟北婴因患麻疹转肺炎病逝,但并未动摇父亲出征的决心。王戴纵队出发前,毛主席、朱总司令、叶剑英、林彪、陈毅都讲了话。父亲任河南区党委城工部长,刘少奇同他谈了话,还由刘宁一介绍了城市工作经验。王戴部队进入河南后,因先期到达的皮定均、徐子荣支队已在豫西打开局面,需要干部,父亲被留在豫西任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并参加了豫西干校的授课教育和主持《豫西日报》等工作。《豫西日报》是河南解放区最早的8开油印和石印小报,比《河南日报》前身1948年创刊的《豫西日报》早三年。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中共决定撤出豫西,地委及各县地方干部、干校学员编为河南军区豫西分区教导团(父亲任教育长)。10月,部队遭保安团袭击,父亲胸部受伤,子弹从前胸射入,经肺脏从后背穿出,所幸较快痊愈。休养期间,他先后挂职豫南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原军区第一纵队(王戴纵队)联络部副部长。1946年1月,父亲到宣化店任中原局统战部科长,4月派赴武汉以“董必武公馆”为掩护同吴德峰做情报工作。这时国共谈判

已频破裂，秘密活动极为艰险，他以中共执行小组中军官身份建立了五处情报关系，工作两个多月。6月，国民党进攻中原一触即发，武汉工作结束，吴德峰飞北平，父亲回到宣化店，随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司令部突围，王树声指示父亲化装离队去武汉。从武汉登机回北平时，父亲被国民党宪兵扣了一天一夜，他坚持不写“未受虐待”的字据，经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交涉才获释。后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关怀下，从南京转北平返延安。

七

父亲1946年8月回到延安，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分配他到保安处帮助工作，任机关党总支书记。这时一年前已在山东参加革命的哥哥和我与他取得联系。当他知道我们都已入党时来信说：“由于我党革命事业之发展，已把你们一代吸收到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之中了，正是毛泽东时代你们有此发展，这是很光荣幸福的，必须用一切力量努力学习和工作，要无限忠诚的牺牲自己的一切。”

1947年2月，父亲参加由李卓然、周兴率领的西北局工作团到米脂杨家沟土改。5月，中央组织部介绍他到晋冀鲁豫中央局，7月随军进入鄂东地区，任(田)麻(城)工委委员、麻东工作队队长，配合军事行动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工作。11月下旬，国民党大举向大别山区进攻，父亲随部队突围至豫皖边，留中原中央局，在李雪峰、陈少敏、刘子久领导下进行土改工作，不久调回后方。1948年5月，华北局成立，父亲于8月1日返华北局组织部，调任冀中河间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1949年4月，为迎接全国胜利，他任冀中南下第二地委书记兼南下第二干部支队政委，同司令员万振西带队南下准备接收南京。到合肥后，因坠马负伤，赴济南养伤，6月间调华东大学任副校长兼党委书记。

八

1948年成立于潍县的华东大学，在济南解放后迁到济南，父亲调去工作了10个月。当时党政军急需大批干部，他为此做了许多工作，使一批学

生提前毕业参加了工作。

1950年2月，父亲调任中共山东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并兼任济南市委统战部长，做了大量工作，参加了全国一、二、三次统战工作会议。因工作需要，父亲1951年1月兼任山东省宗教问题委员会委员，1952年10月兼任山东省政府人事厅副厅长，1953年1月兼任山东分局工商委员会委员。他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广交朋友，尤其重视团结知识分子。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因一般历史问题遇到麻烦时，他亲自登门拜访，报告有关领导予以解脱安排公职，主持山东省文管会工作。山东大学创办《文史哲》杂志，经费拮据，他从统战工作经费中拨款支援。交际处归统战部领导，他参加过许多党内的接待工作：1950年接待出席全国英模大会的华东代表；毛主席、董必武到济南都向他问起王尽美遗属情况，在毛主席和董老的关怀下，山东分局指示他安排王尽美之母到济南由公家赡养，与他比邻而居，度过晚年；1952年毛主席由杨尚昆、罗瑞卿等陪同到济南，他也参加了接待工作。

1953年11月，父亲调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党组书记，1956年5月调任山东省副省长。他任副省长六年多，不仅努力搞好自己分工的工作，而且关心其他方面的工作，凡是能出力做的，都积极去做。他分管手工业局，为此钻研过工艺美术。后来负责基建工作，兼任建设厅长、党组书记、基建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山东省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在1958年大跃进中，他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曾指出山东“农业大丰收展览会”展品中的虚假现象。他支持一些重大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主持了对山东城乡基本建设规划的调查工作。他在基本建设工作中的一些实事求是的言行，在反右倾时一度被认为右倾，被迫作检查。但不久山东省委安排他去北京领导人民大会堂山东厅的装修工程，他和有关专家、施工人员通力合作，圆满完成了任务。

解放后，父亲以“革命不应后人，当权不必在我”自勉。他在山东工作十三年，这期间山东党内发生过多次错误的斗争事件，他总是尽可能的采取实事求是留有余地的态度。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搞运动，凡自我批评或批评别人，必须尽量客观地进行分析……绝不要过左过右地提意见……激

一时之愤，逞一时之气，快一时之意，取一时之宠等等个人主义的东西，必须经常警惕，因为我们时常在有意半有意或无意中躬自蹈之。”他还指出：在党内正常生活困难日多的情况下，实事求是说易行难，但这是必须遵守的原则。

九

1960年代父亲患肝炎后，向中央组织部提出调动工作的要求。经山东省委、华东局同意，于1962年10月4日调任华东局副局长兼机关党委书记。

1964年10月，他参加罗毅率领的华东局社教工作团，到安徽全椒县进行社教工作。他在蹲点中，以较大精力研究了改善农村住房建设问题，从改变农村浪费土地及节约建材、降低建房费用、便于生活等方面考虑，提请安徽省委指示安徽设计院派建筑设计人员参加规划，以两个村庄作典型，制作一套标准设计方案，作为安徽试验推广的参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任质斌谈起父亲在安徽社教期间关注农民住房问题，仍极称道。

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是最早受冲击的干部之一，最早被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被扣上“修正主义”帽子。8月24日，一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打着“机关红卫兵”旗号，以“扫四旧”为名，首次来抄家，砸烂了一些器物。次日，父亲被撤销华东局机关党委书记职务，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和斗争，逼他进行检查。12月9日，他被宣布“靠边审查”。华东局机关也已陷于瘫痪。但他没有擅离机关，而是出以公心，坚持在自己的宿舍里接待上访群众，至1967年1月23日共接待1800余人。他以个人名义规劝他们不要丢下生产和工作，不要武斗，不要乘机发财，并介绍他们与华东局接待员联系，为他们垫付路费、饭费，送他们书籍、鞋子和衣物。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被上海“造反派”夺权，许多党政负责人被打倒。在1月17日“炮轰华东局”大会上，他同华东局、

上海市委许多部委办以上负责人被逼上台挨斗。他被批斗时，因申辩、不低头下跪而遭毒打。此后，他被“勒令”每日8时至18时在机关管制劳动“交代问题”，并被第三次抄家。冬天，有以“杨尚昆专案组”“中央调查组”名义的“外调”人员逼迫他“交代”上海地下党及周恩来、康生等人情况，他拒绝回答，遭到外调人员的训斥和侮辱。11月28日，他被再次批斗，“造反派”贴出了污蔑他是“大叛徒、大特务、大地主、大少爷、走资派、修正主义分子”的大标语，扬言已经“开除”他的党籍，12月起拒绝收他的党费，扣发他的工资，仅发每月50元生活费。1968年1月11日，他不堪折磨，含冤离开人间，表示了他最后的抗议，临终遗言郑重声明：“我没投过敌，没出卖过任何党的组织，我的确对敌斗争是闯过来了。我已经写过的证明材料以及自己的东西，内容都是真的，可以全部收回作参考。”

父亲去世后，造反派第四次去抄家，到3月还揪着母亲不放，逼她“揭发李宇超，老实交代问题”。母亲回顾了父亲的革命历史，写成大字报回答他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中央关照下，由上海市委于1979年2月22日为父亲平反昭雪。结论指出：他是在迫害杨尚昆的“专案组”于1967年12月对他逼供后含冤去世的。经过复查，“他历史清楚，政治上没有问题，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立场坚定，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不论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都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为人民革命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少贡献，尤其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期，曾掩护党中央机关的安全，对党有过重大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为党为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为人光明磊落，正直无私，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和好干部。“1979年3月20日，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为父亲举行骨灰安放仪式。上海市及原华东局领导同志和他生前友好、各界人士数百人参加了悼念活动，中共中央和全国各地800多人送了花圈和发来唁电、唁函。

母亲于1990年12月30日逝世，走完了60多年的革命征程。

(责任编辑 李晨)

萧军与毛泽东

张毓茂

我和萧军先生是忘年交。在上一世纪 50 年代初期有幸拜识先生。那时他正身处逆境,对我这个敢于同他交往的东北小老乡,十分亲切,无话不谈。谈的最多的是关于鲁迅和毛泽东。

萧军说起毛泽东,总是充满尊敬和爱戴的感情。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伟大人物,文治武功,都是前人所无法比拟的。在延安时期,萧军与毛泽东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书来信往,毛泽东经常邀请萧军“惠临一叙”,称赞萧军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萧军是非常讲义气重感情的人,对于领袖给予的关怀和友情,铭刻在心,终生不忘,即使在被严厉批评、遭受不公正处分的二十年里,也始终没有动摇对毛泽东亲切的感情。

萧军先生说,他第一次到延安是 1938 年 3 月中旬,那时萧军因反对阎锡山倒行逆施,愤而辞去“民族革命大学”的教职,想到五台山去参加抗日游击队,直接投身前线的战斗,为此途经延安。毛泽东听说萧军到了延安,就派秘书邀请萧军见面。萧军却以不便打扰为由辞谢了。想不到第二天毛泽东却亲自登门拜访,并在招待所宴请了萧军。这下子把萧军深深地感动了。萧军晚年回想这一往事,还感到愧疚。他说:“毛主席当时真是礼贤下士,平易可亲,气度非凡。和毛主席相比,伟大的是毛主席,自己年轻气傲,就太渺小了。”在延安逗留期间,萧军曾应邀参加了不少活动,又曾见到毛泽东。如在陕北公学开学典礼的会场上,毛泽东看见萧军时就把他介绍给在场的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同志,拉着萧军一起在操场上会餐。在尘土飞扬的大风中,轮流地共喝一个大碗里的酒,开怀畅饮,高谈阔论,放声大笑。那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壮观的场面,非常

投合萧军的脾气,使他激动万分。直到晚年回想起来,仍然神采飞扬,心向往之。

萧军第二次去延安,是在 1940 年 6 月,从此生活和工作在延安,直到抗战胜利。萧军刚到延安,感到这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光明,到处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便满腔热情地投入工作。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的理事,以后又被推为七个主席之一,还担任了《文艺月报》编辑,“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鲁迅研究丛刊》的主编等等。在从事大量的文化社会工作的同时,萧军仍继续撰写他的长篇巨制《第三代》,还不时在《文艺月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杂文和评论。萧军到延安的初期,工作辛勤积极,心情是十分振奋的。

然而,萧军生性豪放不羁,坦率直言,却不注意方式。这就使他在人际关系上很快出现了矛盾。比如,他在《文艺月报》上发表文章批评何其芳的诗《革命,向旧世界进军》和周立波的小说《牛》。说何其芳那首诗“我感觉不到情绪、形象、音节、意境……只是一条棍子似的僵化了的硬棒棒的东西。”萧军甚至说“这不是诗,何其芳不适宜写诗。”如此尖刻的批评,自然引起何其芳等人的反感。当时刘雪苇曾出来为何其芳辩护,萧军又在报上同刘雪苇展开激烈的争论。再加上革命文艺队伍从上海左联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宗派主义倾向,在延安也仍然存在,就更使萧军感到苦恼、烦躁。这时,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烦躁的萧军看了这篇文章就更烦躁了。周扬这篇文章在论及延安当时文艺界情况时,指责了一些作家,说他们写不出东西却把原因归之为没有肉吃……周扬的指责激怒了萧军。他便与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开了一个座

谈会。由萧军执笔，把大家意见归纳为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与生活漫谈 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这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说：人要吃肉，是生理需要，和吃饭、睡觉、结婚一样都是正常的。只有三种人不想吃肉：一是发下了宏愿决心不吃肉……二是生理上有不吃肉的毛病，三是像周扬同志那样有自己的小厨房可以经常吃到肉……此外，还讲到凡是到延安来的，都不是为了吃肉，是为了来革命；正如周扬到延安来不仅是为了当院长、吃小厨房和出门有马骑……一样。文章也寄给《解放日报》，却被退回来，艾青、罗烽等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争强好胜的萧军却认为不公平，太不民主。在萧军看来，既然周扬可以写文章批评别人，为什么反批评的文章得不到发表呢？他对这种“宗派主义和行帮作风”十分反感。这期间，萧军还碰到一些其他不愉快的事，懊恼之余，便想索性离开延安回重庆去，以便直接和反动派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省得在这里生闲气。

1941年7月下旬，萧军到毛泽东那里去辞行。毛泽东感到十分意外，便诚恳地询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延安？希望开诚布公地提出来。毛泽东的热诚感动了萧军，他便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也指出了所见到的延安的一些不良现象。当然也谈到了同周扬的有关争论和《解放日报》的不公平做法。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取了萧军的倾诉，虚心接受了其中合理的部分，同时对有些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和解释，对萧军的偏颇和局限，也没有一味迁就，做了平等的朋友式的批评和劝导。萧军是一个豪爽的硬汉。毛泽东的理论素养和人格魅力，使萧军感佩和倾倒。至于他和周扬的争论，毛泽东并没有表示什么倾向性意见，只是给萧军出了个主意：

“《解放日报》不发表你们的文章，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是有个《文艺月报》吗？可以在那上面发嘛！你看怎样？”

萧军心情舒畅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接着又问毛泽东：“在文艺方面，党有什么政策呢？”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只忙着打仗、种小米，暂时还顾不上呢！”毛泽东诚恳地请萧军提建议，萧军便把自己近来考虑的想法和盘托出：

“党应当制订有关文艺的政策，使延安和各

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有所遵循，统一思想和行动，加强团结，更有力地引导革命文艺工作健康发展。”作为具有高深文化素养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早已在构思和设计文化战线上的战略部署，为了鼓励和安抚萧军，并把他纳入革命文艺发展轨道中来，毛泽东便因势利导地支持萧军的建议，说：

“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作为将来制定文艺政策时的参考，你看怎样？”萧军当时即爽快地表示：一言为定，不走了。

萧军回家以后，立即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了毛泽东，并于7月8日给毛泽东写信，向他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同时要求再次见面谈谈。萧军等了将近一星期，未见毛泽东回信，他便不耐烦了，又萌生去意。7月15日萧军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泽东同志：

本月八日曾有一函奉达，想已收到。惟迄今不见回示。我推测原因或许不外以下三种：1.信未收到。2.近来工作忙。3.或是我的要求“不可能”或有“越级”等嫌疑。如属第一、第二两项，我还愿



20世纪30年代的萧军

再等一星期，如属第三项，我也就决定不再干求了。我所以要和您作一次谈话的原因，除开施政纲领之中引起我一点不能决定的疑惑外，附带还有把一年来在边区的观感，尽情说出，虽言一得之愚，对于党的本身，或有小用。因为我到边区一年有余，近来很想到大后方行走行走，此会晤算作“告别礼”也可。余无他求。敬祝近好。附上第一信收条。

萧军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

8月2日，萧军接到了毛泽东的复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而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该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对萧军这样知识分子的心理和特点，是非常了解的。当时的毛泽东非常能听取不同意见，非常能团结和吸引各种来到延安追求革命的人，也非常善于做思想工作。萧军后来遭到那么不公平的待遇，受到那么残酷的折磨，即使不是毛泽东亲自授意，至少毛泽东是知道的。但萧军一直对毛泽东心悦诚服，没有丝毫的抱怨情绪。毛泽东去世时，萧军当时还处于逆境之中，但却失声痛哭。这固然说明萧军对党对领袖忠贞不贰的情操，但也显示出毛泽东作为领袖的魅力是何等深远。

萧军接到毛泽东信后，立即回信。表示毛泽东“诚恳地指出我的病根，这是值得尊重感谢的！”承认“缺乏信心”，“走极端”，“不善于调理人我关系”是在社会上碰钉子的主要原因。萧军又十分苦恼地说，“一个人和自己格斗所费的力气，

那是十倍于敌人的啊！”同时萧军又心悦诚服的表示，“我是很羡慕你那样从容宽阔的，但这一时是不容易学习的。”萧军向毛主席提出请求：“如果可能，将来可以随时寻你去谈谈。”

从此以后，萧军成了毛主席座上的常客。毛泽东热情耐心地接待萧军，也想通过萧军了解和团结更多的文艺家。萧军呢，他也很希望更多地从国统区来的作家们见到毛泽东，像自己一样得到毛泽东的关怀和教诲。有一次，他在和毛泽东谈话时说：

“现在有大批的国统区作家到延安来了。他们到延安来投奔革命，都想见见您。艾青、罗烽、白朗、舒群都有这种愿望，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群贤毕至，有失远迎啊！”毛泽东亲切风趣而又深表歉意地说，同时要萧军转达他的问候，“你代我向大家问好，过几天我一定去看看大家。”

8月11日傍晚，毛泽东从杨家岭住处漫步来到萧军等作家在“文抗”的住处。萧军喜出望外。一边请毛泽东到自己住的窑洞里坐下，一边赶快去通知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作家。由于毛泽东事先并未通知他要来，所以罗烽、舒群都未在家等候。只有诗人艾青在家。他像过节日一样，脱下平时穿的旧军装，换上仅有的西装，系上一条漂亮的红领带，显得笔挺、潇洒。这显然是为了向领袖表示欢迎和敬意的一种礼节。艾青很兴奋也很拘谨。萧军却很随便，一则生性豪放，不拘小节；再则他与毛泽东多次交往，知道毛泽东平易近人，喜欢无拘无束的交谈，便毫不在乎地在毛泽东谈话时插话，开玩笑……毛泽东不但不以为忤，而且在谈话时也不时和萧军、艾青开玩笑。那时领袖与作家间的亲密朋友关系，萧军终生铭记难忘。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深夜，毛泽东才由勤务兵点亮了马灯陪着下山而去。萧军望着毛泽东远去的身影，望着夜空中闪烁的星斗，心中有说不出的虔诚的感情，他一时间好像回到小时候读的演义小说中去，心想毛泽东不正是旧小说中下凡的星宿吗？……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来信：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应毛泽东之邀，萧军、王德芬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茨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到毛泽东住处做客。毛泽东还请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部长凯丰前来作陪。毛泽东同大家非常亲切地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中午，毛泽东招待作家们吃午饭。当时，毛泽东在团结知识分子方面所做的工作，确实热情体贴，亲切感人，无懈可击。作家们也确实心悦诚服地拥护党，热爱自己的领袖毛泽东。

受毛泽东之托，萧军不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寄给毛泽东。也经常到毛泽东那里畅谈，有时一谈就是一整天。有一次萧军同毛泽东谈到深夜，越谈越高兴。毛泽东把他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期所受到的排斥和打击，都向这位党外作家倾诉。萧军听到毛泽东曾受过十一次处分，感到很震惊，又为毛泽东能如此正确对待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深受感动。回家之后连夜写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等文章。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谈的有关受处分的事情。萧军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萧军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如提倡所谓“真正的爱”，“且不管你爱的是什么”，对那些“在血和铁底试炼中，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的人，而后仍然回到革命队伍来战斗。不管别人对这样的人如何看法，我是尊敬他们，比对那些从来没有见过铁和血，在‘保险箱’里逞英雄的英雄们，似乎更尊敬些。”毛泽东当然不会赞赏萧军这种关于“爱”的观点，但在当时，毛泽东只是删去了有关他在党内受处分的事例，并没有反对萧军文章的发表。直到十五年后，在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萧军这篇文章连同王实味、丁玲、艾青、罗烽等当时写的几篇文章，一起重新公布，当作大毒草进行“再批判”。再批判的

《编者按语》就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可见，当时为了团结萧军，争取萧军走上毛泽东思想轨道，作为高明的政治家，毛泽东对萧军是相当克制和容忍的。

就在萧军同毛泽东畅谈的那天夜里，毛泽东曾认真地建议萧军弃文从政。毛泽东说：

“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

“改什么行？”萧军有点莫名其妙。

“入党，当官！”

“哦，不行！不行！”萧军虽然有点受宠若惊，但立即谢绝了。萧军说：“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我连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毛泽东见萧军是这样态度，便哈哈大笑。说：“也好，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在革命队伍中，大约像萧军这样公然拒绝领袖要其入党的指示的人，恐怕不会有第二个人。毛泽东对此虽然一笑置之，但他对萧军的政治态度和为人处世，必定有了深刻印象。

在入党问题上，萧军尽管没有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可是对毛泽东交给他收集文艺界资料供给毛泽东制定政策参考的工作，却是做得非常认真，非常细致，不断地交谈，不断地通信。毛泽东也不断给他指示。1942年4月13日毛泽东写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毛泽东在同党内外同志充分交换意见后，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通过这次会议，明确文艺运动的发展方向，研究和制定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次会议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伟大意义，一直被史学家大书特书。然而，古怪的萧军在为会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之后，却不打算参加。因为他知道自己心直口快，脾气急躁，有时冲动起来，自己也管不住自己，如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

问题上和别的同志发生争论，冲突起来很不愉快，何苦呢！所以便借口要到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泽东代他向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一张通行证。毛泽东回信说：希望他“迟一些再出巡”，以便同他商量召开座谈会的事情。萧军又给毛泽东写信，坚持要求去旅行。毛泽东再次写信留他：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 1-14 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早

毛泽东给萧军的礼遇，可谓高矣！当时延安没什么交通工具，出门都以步当车，从这个单位到那个单位，少则几里，多则几十里，很不方便。少数领导同志为了节省时间，才用骑马代步。毛泽东用自己的马去接萧军，一方面说明毛泽东急于同萧军研究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萧军格外尊重。见面后，毛泽东再次挽留，要他开完会再走。盛情难却，萧军只好留下了。

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毛泽东、朱德、陈云、凯丰、贺龙等出席了会议。到会的文艺界人士一百多人。会议由凯丰主持。毛泽东致了开幕词后，就请萧军做第一个发言。萧军有点犹豫。丁玲悄悄鼓励他说：“你是学炮兵的，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想了想，就站起来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对当前文艺诸多问题底我见》。他谈了六个问题：一、立场。我们要站在什么立场写作呢？第一为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二为求得人类解放。一切是为这“解放”而服务。二、态度。科学的态度——要严肃，要客观，把握住事物和人的最本质的东西。三、给谁看？第一要使读者读得懂；第二要使他们发生兴味；第三，能使他们从感觉到思维；第四，再由思维到行动——又复归于社会。在内容上尽可能深而又深；在形式上尽可能浅而又浅，提高和普及要并行，朦胧和模棱的作品要不得；要健康，要团结，要向上。四、写什么？多写进步的，典型性较大的，必然的，尖锐的一面，“从卑污中寻出美来——发扬它；从美中寻出卑污来——消灭它”。

五、如何搜集材料？不要特殊化、居高临下，犯“牧师式”的毛病。作家应是下海——生活的海，去取珍珠的人。先到那些最复杂、变化最快、斗争最尖锐、明暗度最显著的地方去。六、学习，要支出，也要收入。在学习速度上，别人进一步，他们要进三步；在学习宽度上，别人可以不知道他的东西，他一定要知道别人的东西；在学习深度上，一定要懂得事物最本质的东西，等等。萧军在论述这些见解时，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当然，有些话也相当偏激，如过分强调作家的“自由”和“独立”，甚至说鲁迅在广州就不曾受哪个党哪个组织的指挥……激起了胡乔木、吴亮平等党员作家的反驳（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54页）。萧军在争论中所举的事例，不免又触及了一些人。虽然他的发言后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时，删掉了这些事例，但话既出口，人，也就得罪了。抛开这些不说，就萧军的文艺见解而言，固然没有毛泽东后来总结讲话那样气势磅礴，深刻精辟，可是他从创作的实践感觉出发，也确有独到之处。在总的方向上，是符合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的。

这次座谈会充分发扬民主，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即使对毛泽东的见解，有不同意见，也毫无顾忌地进行商榷。如戏剧家张庚就公开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说法（见《文人毛泽东》232页）。毛泽东对不同意见，认真听取，充分尊重，深入研究。因而，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经过激烈论辩，达到一致意见，统一了思想认识。不过，萧军在争论中又同某些同志伤了感情，使他很苦恼。在休会中，他顾虑复会后继续发生冲突，不愿再参加会议了，便又向毛泽东提出要动身去旅行。毛泽东回信说：

萧军同志：

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再等了，你就出发吧。

此复即致

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五日

萧军当时任性得出格，想怎样就得怎样。但毛泽东还是宽容的依从了他。萧军夫人王德芬却觉得萧军太过分了，劝萧军说：“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人情了吗！有什么

么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不觉得难为情吗?萧军听了妻子的规劝,也觉得自已过于任性和偏激。决定把会开完再走。

5月16日座谈会复会。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到5月23日会议闭幕。毛泽东做了总结讲话。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傍晚时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全体与会同志在大礼堂前合影留念。在这历史留影中,人们争先往前坐,要离毛泽东近些。萧军却远远地站在最后的台阶上。他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他几次想离会而去,不单是因为与同志们争论伤了感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尖锐批评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也包括萧军的文艺思想。丁玲、艾青、罗烽等党员作家,都纷纷做检讨,表示悔改。唯独心高气傲的萧军,在感情上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所以,会议一结束,萧军又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毛泽东向王震要一张通行证。毛泽东复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收悉,王旅长现在^在县,俟他回来,即与他谈。

此复
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给萧军最后一封信。从此萧军与毛泽东交往的黄金岁月,也就结束了。王震不归,萧军只好静候。然而,还未等王震回来,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就是著名的“王实味事件”。正是“王实味事件”,使萧军未能实现其旅行计划。

1942年延安整风时,发生了“王实味事件”,不但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瞩目,而且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个事件也把萧军牵连进去。此后萧军一直背着“同情托派分子王实味”的罪名。萧军和王实味本来素不相识,一个在“文抗”工作,一个任职在中央研究院(前身为中央马列学院),从来没有什么交往。那么,萧军怎么竟搅到“王实味事件”里去了呢?

王实味是位翻译家,杂文写得也不错。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共产党。他虽然对敌斗争很英勇坚决,但性格孤僻、高傲,在党内的人际关系总

是弄得很紧张,一度脱党。1937年10月,同一些向往革命的青年到了延安。先在陕北公学,后到马列学院(后改称中央研究院)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时,王实味在《谷雨》和《解放日报》等报刊上接连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杂文,还办了壁报《矢与的》。同青委的《轻骑队》、西北局的《西北风》等壁报互相呼应。有几期《矢与的》还贴在布上,挂在延安最热闹的地方——南门外。看的人川流不息,像赶庙会一样。王实味他们主张“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阵营的工作”。在杂文中,王实味强调艺术家要做“改造灵魂的工作”,要“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他尖锐抨击“‘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指责“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并与前线流血牺牲相对照……这与当时延安歌颂光明的主潮立即形成激烈的冲撞。一时间王实味成了延安明星式人物,出尽了风头。毛泽东后来回顾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19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转引自戴晴:《王实味与野百合花》)

所谓好好整风,包括展开对王实味等人的严厉批评。丁玲、罗烽、艾青等人都写了被认为有错误倾向的文章,都受到了批判,但这些人不久都承认了错误,做了检讨,党也宽恕了他(她)们。而王实味则不肯承认自己有错误,因而批判就不断升级。许多往日与他接近的朋友们都起来揭发他,说他散布“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任”,“苏联对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等等。今天回顾,王实味这些言论,没什么骇人听闻之处,甚至有一定的真实性,但在当时的延安,是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尤其是关于托洛茨基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是非常尖锐非常严重非常可怕的问题,谁若与此沾边儿,万劫不复。而王实味在批判他的大会上,公然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甚至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够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

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王实味这话固然十分狂妄,可是,在当时的延安确实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更没有人敢探究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斗争的真相。那是一个谈托色变的年代啊!王实味这种态度,自然被认为顽固不化,死不悔改。对此,康生大喜过望。他有了用武之地。这个人当时正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是个狠毒险诈的阴谋家,他一生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残害了无数革命同志。王实味一案,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已。毛泽东最后把王实味判定为暗藏的敌人,原因可能很多,而康生的罗织周纳,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于是,王实味由思想错误,而政治错误,最后是作为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而逮捕囚禁起来。五年后,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王实味也被押出延安,关在兴县的监牢里。6月12日兴县遭到敌机轰炸,当地公安部门向中央社会部请示如何处理王实味。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批示处决王实味。7月1日夜,将王实味砍杀后扔进一眼枯井里。据说,毛泽东得知王实味被杀,雷霆震怒,要李克农再赔他一个王实味。李克农不敢分辩,不断地检讨,请求处分。毛泽东以后又多次提到王实味不应杀掉。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在批判王实味不断升级的时候,有一位既是王实味的朋友又同萧军熟悉的作家,跑来找萧军,希望萧军能仗义执言,救救王实味。因为这个人知道萧军同毛泽东交往密切,幻想毛泽东能看在萧军的面子上从轻发落王实味。这个人政治上天真幼稚,非常糊涂。他不明白,批判王实味是毛泽东“统一党的思想”的部署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获得了军事领导权。六届六中全会获得政治领导权之后,就开始着手在思想领域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以便在全党树立起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权威。本来,这场运动并不要王实味充当什么重要角色。他们既不是对象也不是动力。他们应该做的是好好听报告,好好参加讨论,结合自己的思想好好写心得或总结。然而,他们却大叫大嚷地跳出来……

遗憾的是,萧军毕竟不是政治家。他对王实味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他自恃与毛泽东有交情,便轻率地承担了说情的使命。毛泽东听了萧军的倾诉后,是很不高兴的,但

却宽厚地原谅了萧军的鲁莽。毛泽东告诉萧军,王实味的问题很复杂,不但犯了政治错误,还有托派和国民党特务嫌疑问题,要萧军不要管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萧军碰了个软钉子,但他一向粗心,以为不要管就不管吧,也没有多想。可是,萧军找毛泽东给王实味求情的传闻很快不胫而走,引起一些同志的误解和强烈不满。不久,在延安召开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丁玲、周扬、陈学昭等党内外七名作家论战。会后又写了《备忘录》上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过去,凡萧军给毛泽东写信,总是很快接到回信。这一次,事情这么大,毛却没有回信,根本不予理睬。萧军却还不清醒,竟然与王实味来往,还给他向毛泽东转信。王实味在十月一日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信,申诉他的痛苦心情:“为什么说谎的是好干部,而老实人却是反革命呢?”救救我吧,把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去哟,我要安静要安静呀!不一定要颐和园北戴河或莫干山呀,看看吴满有家里能有一席之地没有?我必须离开中央研究院,必须!”萧军转信时又给毛泽东写了一信:泽东同志:

这是一种意外的事,今天早晨王实味在山下呼着我的名字,把这封信放在山脚下,要我代转给您。后来他又说“做错了”,要我交给“文抗”支部再转给您,我就如此照办了。专此祝好。

萧军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日晨

毛泽东仍然没有回信,还是不予理睬。事情到了这地步,毛泽东的态度已经清清楚楚了。他对萧军不听劝阻继续过问王实味问题,无疑十分反感。换了别人,这时早该知趣回避。但萧军却锋芒不减,顶风而上。当然,王实味问题,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大冤案。今天党已经为王实味平反昭雪,恢复了他革命者名誉。可是,当年萧军对王实味的情况,也并不十分了解。他到毛泽东那里为王实味说情,是一种单凭直觉的感情冲动,并非是一个成熟的革命政治家清醒的理智判断。毛泽东对萧军的宽容和厚爱不是无限的,他是不能容忍萧军在重大政治问题干扰他的部署的。他对萧军的冷落,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批评,可惜萧军当时并未体察和理解。1945年8月抗战胜利,萧军从延安告别毛泽东主席,重返(下转第36页)

鲁迅的一世纪

朱 正

鲁迅作为一个著作者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是在1903年，二十世纪刚刚开始，到今天是一百年出头了。这年6月，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杂志第五期上刊出的《斯巴达之魂》，作者署名自树，这是鲁迅公开发表文章的开始。

义和团之乱引起了八国联军的入侵。1901年9月，清廷接受了谢罪、惩办祸首、赔款等等屈辱的条件，签订了辛丑条约。接着各国联军开始撤退。可是俄国却拒不从东三省撤兵。几经交涉，到1902年4月8日，中俄才签订东三省撤兵条约，规定俄兵于十八个月内分三期撤退。到了1903年4月8日，俄军应该退出沈阳、牛庄、营口、辽阳和吉林，可是不退。俄国反而向中国提出七项新要求。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愤怒。4月27日，上海张园开拒俄大会，反对俄国对东三省的新要求。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大会，拒绝俄国要求。愤怒的情绪扩大到了国外的留学生中间，4月30日，东京中国学生拒俄义勇队成立。5月2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就参加了这一活动。拒俄义勇队成立，即函电各方，在致北洋大臣袁世凯函中说：“昔波斯王择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万里之帝国而无之乎！”鲁迅的这篇《斯巴达之魂》，写的就正是这次德摩比勒（今译温泉关）之役。文章气势磅礴，该刊编者许寿裳说，“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可以认为鲁迅是以这篇文章参加拒俄运动，他的写作活动从

一开始就是怀着救国的、爱国的目的。这种态度，一直贯穿着他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

鲁迅在日本留学。他看到，刚刚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同晚清的衰败之象，对比是太强烈了。这更加深了他的忧国之心。在将两国比较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国民性。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说：“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4卷第410页，以下《鲁迅全集》的引文出处只注卷次及页码，不注书名）。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是为了探索救国的道路，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思考这些题目。

正是这些思考决定了他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第一卷第438页），使他一度学医；后来受到刺激，“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第一要着，是在改变国人的精神，从而选定文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在这些年里，他读得多，也想得多。因此，他1907-1908年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就不只是反映出一种爱国的激情，还有他自己的不少思考了。

刊登在《河南》月刊第五号（1908年6月）上的《科学史教篇》，扼要地介绍了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活动、应用技术跟理论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文章不但指出了“实业之蒙益于科学者固多，而科学得实业之助者亦

非鲜(《第一卷第33页)这种两者“相互为援”的关系之外,更指出了“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第一卷第32页),以见理论科学的研究并不总是可以立竿见影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强调了理论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尽管一时还看不出它有什么用处。

这篇文章论证了科学在推动社会进步、提高人类生活品质方面的巨大作用,但是它同时提醒读者,不能因为强调科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精神生活。人群既需要牛顿,也需要莎士比亚;不但需要波义耳这样的科学家,也需要拉斐尔这样的画家;既要有哲学家康德,也要有音乐家贝多芬;既要有达尔文,也要有卡莱尔这样的史学家。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以拜伦为代表的被人称为“恶魔派”的诗人。后来,鲁迅在《杂忆》一文中说:“那时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裴多菲(《第一卷第233-234页),后面这两位,在《摩罗诗力说》里也都作了详细介绍。此外,还介绍了挪威的易卜生,英国的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等等。

鲁迅在介绍了这些他所喜爱的、引起他心的共鸣的作家之后,想起了中国。他问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悲哀的是,他接着答道:“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第一卷第102页)文章里没有说的是,它的作者,已经决定自己来担当精神界之战士的使命了。

鲁迅在《河南》上发表的文章,《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这两篇最可注意,它显出了作者对中国现状的深思。那时,中国必须变革,可以说是已经成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的共识。在东

京的中国人,从政治上的亡命客到留学生,有主张民主革命的,也有主张君主立宪的,活动很多。鲁迅自己参加了留学生的一些活动,观察了不少号称爱国志士的人物,了解到了他们的主张和作为,于是在这两篇文章里对这些作出了自己的评价。

出国留学,目的是给中国图富强。到外国学些什么才好呢?鲁迅看到的是:“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第一卷第45-46页),“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第一卷第29页),“试按其关,乃并方术且非所喻,灵府荒秽,徒炫耀耳食以罔当时”;“掣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第八卷第27页)。

鲁迅以为,学外国,重要的还不是那些应用技术之类。“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第一卷第58页)提出了“立人”这个首要目标。具体的纲领,鲁迅提出:“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培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第一卷第47页)假如能够做到这一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第一卷第57页)应该指出的是:他在这里说的“世界之思潮”;主要是指尼采的学说。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就说过,他在弘文学院,就爱读尼采的书了。明白了这时鲁迅所受尼采的影响,就可以知道他这些文章里写的“少数”和“多数”,并不只是个数量的概念,而是尼采所说的“超人”以及与之对立的庸众。他是把希望寄托在超人身上:“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器,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鹭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惧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内之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第八卷第27页)

“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第一卷第54页’）。显然，这英哲就是尼采说的超人了。

二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鲁迅成了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十多年之后，他在一封信中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哪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第十一卷第469—470页’）

这样，又回到国民性的问题上去了。这时他给《猛进》周刊编者徐炳昶的信中，说得更加痛切：“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强聒不舍’，也许是一个药方罢，但据我所见，则有些人们——甚至于竟是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对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你想，二十七年了，还是这样，岂不可怕。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际是国民的代表。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第三卷第22-23页’）

他想到的唯一的办法，是循着《新青年》开创的路走下去。陈独秀1916年创刊的《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1918年9月鲁迅开始在上面发表文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但

就倾向来说，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第四卷第468页’），“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第一卷第307页’）。

在《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钱玄同，吴虞等人的文章，对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鲁迅为了批判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批判旧的伦理观念，反对保存“国粹”，也写了好些文章。他说：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

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

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第一卷第321-322页’）

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辫，吸鸦片，也正与土人的奇形怪状的编发及吃印度麻一样。至于缠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装饰法中，第一等的新发明了。（‘第一卷第343页’）

反对了保存国粹，就要引进外国的观念：

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第一卷第349页’）

主张保存“国粹”的人，对于引进“西学”，一种态度是抵制和排斥。鲁迅描写说：“从前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大抵专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击佛教的人，往往说他是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第一卷第316页’）即以“道德”的名义来抵制“西化”或曰现代化。

另一种态度要开明一些，主张将“西学”和“国粹”调和起来。鲁迅描写说：“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

于是乎要维新。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句话说，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第一卷第352页）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不失为一种主张。若问：这种主张能不能行得通呢？能不能够“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鲁迅回答说：“‘西哲’易卜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 Brand 的嘴说：‘All or nothing!’”（第一卷第353页）。

这些不过是举一点例。在鲁迅的文章里这一类意见还可以摘引出许多来。我们还记得，批胡适的时候，批过他的“全盘西化论”，批胡风的时候，批过他的“民族虚无主义”。那么，怎样来评价鲁迅的这些意见呢？依我看，这些意见不多不少就是全盘西化论。不要以为这只是他在《新青年》时代的观点，到了1934年他还说，“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第六卷第84页）这可是毛泽东说的他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后期的杂文”（《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3页）。应该看到，固有文化的保守性或者说惰性是很大的，即使以全盘西化为目标，努力接受外国的先进文化，旧文化的惰性也会对接的幅度加以强有力的限制，并不会失掉固有文化的特征。鲁迅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第四卷第14页）把话说得极端一点，绝对一点，在事实上也有他的必要吧。

时间过去几十年之后，回过头来看就一切都明白了。要不要保存“国粹”；要不要现代化（即“西化”的同义语），这问题早已由生活给出了答案。我们对鲁迅以及当年许多为此作了努力的人们满怀崇敬和感激之情。经过他们的努力，“国粹”一词，是早已没有人再说了。不过近年又出现

了一个类似的新词，叫做“亚洲价值”论。这是“国粹”（“中国之粹”）的放大，性质却是相同，提出来也是为了抵制世界先进思潮。预料它最终也将同五四时期喧嚣一时的国粹论同其命运吧。

三

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夺取了政权。为了摆脱孤立的处境，于1919年建立了第三国际。第三国际即派人到各国去组建共产党。1921年维经斯基来到中国，找到了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

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在发生的当时，鲁迅似乎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反应。他还是在书斋里写他的《彷徨》，写他的《野草》，办他的《莽原》。晚年，他在答苏联国际文学社问中，说他当初“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第六卷第19页），是确实的。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是《新青年》的同人，鲁迅了解他们，知道他们都是为了中国的改革和进步而努力的人物，虽然他并没有参与他们的活动，可是同情他们的事业。他1926年9月从厦门寄给广州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说：“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第十一卷第546页）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来。

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1928年初开始，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发动了猛烈的批判。创造社中人好些是共产党员，太阳社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冯乃超、李初梨、钱杏邨、彭康、潘汉年、弱水（潘梓年）、石厚生（成仿吾）都写了文章。骂得最出格的是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上的封建余孽》，说鲁迅“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谛！”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说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

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好几篇文章反驳冯乃超、李初梨他

们。对于署名杜荃的这一篇，鲁迅回答说：“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第四卷第213页’）。”

因为这些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来批判的，鲁迅要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第四卷第6页’）”

到了1929年，这一场批判就停了下来了。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干预而停下来的。1930年3月，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一起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里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柔石、殷夫、冯雪峰，很接近鲁迅，鲁迅对他们有很好的印象。

鲁迅以他过去在文学工作方面的成绩和声望，以他现在的政治态度，成了左联的领袖和旗帜。对此，鲁迅自己也是重视的。他在《两地书》序言中声称：“我现在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第十一卷第5页）。但是在左联那些主持工作的人那里，只不过是借重他的盛名罢了。比方说，左联秘书处编印的内部刊物《文学生活》，就对鲁迅保密，不给他看。（见第十三卷第358页）在他致胡风的一封信中，这样说起他在左联的处境和心情：“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第十三卷第543页）

可见这并不是怎样愉快的合作。为了不能让敌对者看热闹，只得隐忍着。这分歧的公开表露，是1936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之争。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第六卷第546-558页）。他在致杨霁云的一封信中说：“其实，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

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第十四卷第138页’）。这篇长文中被鲁迅称为“四条汉子”的周扬、夏衍、田汉和阳翰笙（第六卷第554页），不就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简称文委）的成员吗！积累了几年的矛盾，一时爆发，当然有点显得猛烈。这时，鲁迅正在病中，他给王冶秋的信中说：“我病倘稍愈，还要给以暴露的，那么，中国文艺的前途庶几有救。”（第十四卷第149页）只是他没有能够再好起来，写此信之后三十四天，他就与世长辞了，没有能够把他想说的话说出来。

在左联的这段时间里，鲁迅还参与了一些与文学无关的活动，像自由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反战会议。这些都是不无风险的活动，如杨杏佛，就是因为是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而遭到暗杀。这团体不惜以伪造的文件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胡适不赞同这个做法而被开除。有意思的是同盟的副会长蔡元培在开除胡适之后写给胡的一封信中说：“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蔡元培书信集》，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下册第1487页）果然，不久他就退出了。

也影响到写作上。参加左联之后，鲁迅接受了并且转贩了第三国际的一些宣传。例如，“九一八”日本占领东北，鲁迅说这是“进攻苏联的开头”（第四卷第318页）。又如《我们不再受骗了》（第四卷第439—441页），全面为苏联辩护，连物资匮乏而出现的排队购物，连大镇压中的冤案都加以讴歌。今天读来，真不能不为他受到蒙蔽而叹息。对于他这几年的文章，王元化说：“在这几年中，纵使从鲁迅身上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某些思想倾向的影响。早年，他经常提到的个性、人道、人的觉醒……在他的文字中消失了。直到他逝世前，才开始超脱左的思潮，显示了不同于《二心集》以来的那种局限性，表现了精神上新的升华。”（《思辨短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页）

他在逝世前，对苏联的看法也有了些改变。1972年12月25日胡愈之在鲁迅博物馆的座谈会上谈有关鲁迅的一些事情，其中谈到1936年

二三月鲁迅没有接受邀请去苏联休养这一件事的时候,最初的记录稿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再后他又说:“苏联国内情况怎么样,我也有点担心,是不是也是自己人发生问题?”鲁迅是指当时斯大林扩大肃反,西方报刊大事宣传,他有些不放心。这也是他不想去苏联的一个原因。(转引自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四

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一周年,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的纪念大会上讲话,说:“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43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说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等等等等(《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8页),做出了一个政治领袖能够作出的对于一个作家的最崇高的评价。

这样公开表明对鲁迅的推崇是有其现实的必要性的。那时正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一个月以前,中共中央才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了当时的一个严重情况:“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拚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各种方法收买和麻醉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8-619页)。鲁迅在知识界有着广大的影响和很高的声望。一些知识分子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并没有很多了解和同情,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赞颂引起了他们的共鸣,而投身到这一运动中来的。

这些人来到延安,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左倾态度,带来了反对国民党,拥护苏联和拥护共产党的态度,这当然很好。可是他们同时也带来了从鲁迅书中得到的批判精神,有些人还带来了从鲁迅学到的写杂文的本领。这可是成了问题了。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就是专门反驳“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一论点的,毛说:“鲁迅处在黑

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2页)他说这些,就是指不久以前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这正是一篇“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的杂文。鲁迅说过,“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第六卷第54—55页)。”他写这几句的时候,大约并没有想到这也将是他自己的命运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精神”在全国推行。鲁迅更加受到尊崇。现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被尊崇的程度就是他被歪曲的程度。像《我们不再受骗了》这样的文章被选进了中学的教科书。号称出版史上盛事的第一个注释本《鲁迅全集》却并不是真正的“全集”,不但抽掉了大量的书信,还删改了一处鲁迅的原文,注释中的曲说就不必提了。

在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讲话,动员知识分子消除顾虑,大鸣大放,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毛说,假如鲁迅还在世,“大概是文联主席”(《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254页)。这是安排给郭沫若的职位。成问题的是他不像郭那样会凑趣,能不能像郭那样当好这文联主席很难说。

毛这话是三月份讲的,过了三个月,风云突变,整风鸣放变成了反右派斗争。报纸上的许多说法都同三个月之前完全不同了。7月7日,正是反右派斗争的白热化高潮之中,毛泽东同上海知识界三十六位代表人士“围桌闲话”的时候,翻译家罗稷南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的回答是:“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其实人们不必假设什么,只要看看同他接近的人的命运,胡风在1955年就遭到整肃。冯雪峰、萧军、丁玲、黄源等人,到了1957年全被打倒。以鲁迅的个性和气质,大约不难推测那可能的命运。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间,对鲁迅的“尊崇”和歪曲同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被尊为“亚圣”,出版了他的《全集》,即重印1938年版二十卷集,以取代周扬掌权时候出的十卷集。在那些

年里，除了《毛选》之外，也就只印造了这一部个人的多卷集了。报刊上常常出现他的“打落水狗”之类的引语，作为打击“走资派”的棍子。是的，这“尊崇”，就是把他棍子化。

说到歪曲，例如196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学习鲁迅的革命硬骨头精神》：“他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旗，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势不两立。”鲁迅在长期的斗争生活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鼓舞下，……终于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假如没有写“像他那样”这几个字，人们还不能说这篇文章不通，写上了，那么，鲁迅不但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而且他还遵照林副统帅所教导的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了。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上海市委写作组”，它的“文艺组”下面又有一个“鲁迅传小组”。据古远清《“石一歌”与“文革”匿名写作研究》（载广州《鲁迅世界》2001年第一期）说：“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共十一个人，谐音为笔名‘石一歌’。他们的任务，就是塑造出一个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鲁迅来。他们写的《鲁迅传》，陆续在《学习与批判》刊物上发表，到1976年4月，将前半部汇编为上册出版，几个月之后“四人帮”垮台，当然也就没有下册了。他们“影响”更大得多的作品是《鲁迅的故事》，不但上海大量印行，有些省还租型重印，我看到的一本湖南的重印本，一次印数就是三十二万册。这十一个作者都是会写文章的人，他们从文献中找到一句半句话作为素材，再来进行艺术（政治）加工。他们歪曲材料到什么程度，这里只举一例。

1933年4月11日鲁迅日记：“是日迁居大陆新村新寓。”在这之前半个月，3月27日日记：“下午移书籍至狄思威路。”就这十个字，石一歌的生花妙笔就把它铺衍成一篇《秘密读书室》，说“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了。……鲁迅在家里存放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非常不方便了。”“于是……租了一间房子，专门收藏他的书籍，并作为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秘密读书室’。”多

少个漆黑的夜晚，鲁迅来到这里，用纸张罩着电灯，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街上囚车飞驰，窗外寒风呼啸，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光辉驱散了阵阵寒气，温暖着他的全身。”如此等等。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鲁迅书多，如果全都搬到大陆新村新寓里去，占地很大，一家人住着那一套房子就嫌局促了。于是在迁居之前先租定一间房子堆放一部分藏书。从他写给友人的一些信件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唐珩向他借书，他回信说：“《清朝文字狱档》本有其书，去年因嫌书籍累赘，择未必常用者装箱存他处，箱乱而路远，所以不能奉借了。”（第十四卷第76页）1936年3月7日致沈雁冰信：“礼拜一日（按：3月2日），因为到一个冷房子里去找书，不小心，中寒而大气喘，几乎卒倒，由注射治愈，至今还不能下楼梯。”（第十四卷第42页）可见房间里的箱子是乱放的，找书很麻烦，且都是不常用的书，路远不能常去，房间里又冷，稍不小心即受寒气喘……除了确实另租了一间房子存放书籍之外，有哪一点同石一歌所说的相符呢？这样把一切生活琐事都政治化，和实际情况相距就远了。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鲁迅渐渐回到他应有的历史定位上。他卸下了“亚圣”的冠冕，也解脱了当棍子的使命。人们对于这一位二十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和思想家，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研究，让他的文学遗产和思想遗产，永远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中发光发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历年合订本价格如下：

2006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5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2004年精装	75元；	简装	70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真空罩”下： 1920—30年代 的苏联

金雁



内战结束后的苏俄

十月革命后又经历了 1918 年 - 1920 年的国内战争，不但使俄国的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完全丧失了 19 世纪下半叶文化上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战前的 1913 年俄国大约出版了 2 万种图书，而 1920 年只出版了 3260 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许多人，包括曾经反抗过沙俄专制、相信自己追求的是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自由的社会的某些“老派的布尔什维克”们都认为，内战时的严酷是迫不得已，1921 年内战结束，革命渡过了最紧要的关头之后，党内外都企盼着布尔什维克党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内战时也讲过在得到政权、清除内乱以后会放松“专政”的阀门，还人民一个“民主社会”。当时的说法是：“（自由）条件不成熟是因为政治反对派还存在，这将导致新诞生的制度夭折。”

但人们发现：和平到来后“自由的条件”似乎更加“不成熟”了。1921 年 4 月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我们要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论他们是公开的或装扮成‘非党人员’的，统统关进监狱。”^{注 1}1922 年对这些过去的“社会主义同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逮捕变成大规模的行动。全俄肃反委员会- 国家政治保卫局因此得以顺利完成“在较短的时间内彻底消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任务。俄共

中央委员会提交给党的十一大的《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纲领中说，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允许任何政治派别出版物“以写作为掩护”毒害人们的思想。^{注 2}

从《白天》到《长夜》

但那时到底还不同于后来的斯大林时代，最厉害的铁腕尚未出现，人们还在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玩捉迷藏：最典型的故事后来常被人提起：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特列索夫，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最早一批社会民主党人、著名的《火星报》创办者之一和列宁的老战友，当然也是孟什维克首领之一，他原办有一家报纸叫《日子》。十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的媒体纷纷被关闭，但除文字外并未参加任何反抗活动，而且又与列宁是老搭档的波特列索夫却得以坚持下来，整个内战期间都维持出版。然而到和平时期，当权的老朋友逐渐不客气了。1922 这一年，它先后被查封了 6 次。但老资格的波特列索夫本人并未失去自由，于是，每一次被查封他都换一个名称再次出版：先叫《白天》，查封后改出《夜》，再被封又改叫《深夜》，然后是——《午夜》，——《漫漫长夜》，——最后一次叫《未来的日子》……^{注 3}报名恰如其时。直到 1922 年夏天，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200 多人被驱逐出境。波特列索夫也在其中，他在国内的报纸才最终停刊，而“未来的日子”则成了他的期待。（在国外波特列索夫又办了新的《白

天)》1922年6月8日,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图书出版总局,以统一全国的书报检查机关,它的明确职能是:预审各种出版著作、期刊并作政治上的把关,开列查禁书单、管理出版社、杂志社、印刷厂、图书馆、并唯一有权举办图书订货会。

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然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使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一定的松动,而当时执政的俄共(布)也急需革命后新社会秩序的复苏和新政权下的文化繁荣。于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大背景下,众多的私人出版机构纷纷开办,图书出版总局的预审和政治把关尺度也相应作了调整。1923—1925年,剧目审查委员会共审定了3686部电影,没有通过的有632部,占16.3%,1923—1926年审查剧目1106部,禁演134个,占12%。可见当时还未出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局面。那时关于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呼声再次高涨,对此党内也有强大的动力,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瓦尔金事件和米亚斯尼科夫事件。

1921年4月,全俄肃反委员会特派员瓦尔金首先上书中央,要求允许“苏维埃中有反对派”,建议给他们“法律允许内的自由”。紧接着5月份一位有15年党龄的老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向列宁写信,信中特别强调必须“给予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说这曾经是俄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宣布的“主要任务”,兑现这一承诺将会大得人心,激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米亚斯尼科夫在信中说:“我们需要制订一个言论和出版自由法,使那些发昏的热心人不至越轨。必须把全国最大的日报之一办成各派社会思想进行论战的报纸。苏维埃政权将拥有像罗马帝国一样的胸襟,用自己的钱供养起攻击他的人。这也将是我们俄国条件下的出版自由,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的出版自由主要为遵守法律的人所享用,而不是为资产阶级所用。”^④米亚斯尼科夫没有说明那些“攻击”布尔什维克但又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是谁,但这似乎不言自明:十月革命后一个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或者社会主义运动只能有一种声音。立宪民主党也许是“资产阶级”的,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不是,他们只是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派

别,1917年布尔什维克曾经呼吁与他们组成“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虽然后来转而镇压他们,但像米亚斯尼科夫那样的人显然认为那是内战中的非常措施,和平到来后还是要“关系正常化”的。

但是政治局否定了瓦尔金的建议,米亚斯尼科夫则被开除出党。从此全党噤若寒蝉,再没有人敢提“政治自由”,在党内斗争中一次次地把“敢讲真话的人”剔了出去,只留下那些识时务者和知趣者。社会民主党曾经强调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已经被连根拔去,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

“真空化政策”

苏共中央当时尽管拒绝了米亚斯尼科夫的建议,但新经济政策时代毕竟还是有点舆论空间,就像那时有市场成分一样。但是到1920年代末,国内的私人媒体又一次遭遇查封停业,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大转变”以后私人出版社全被取缔。这时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国家文化安全单位和新闻检查机关的一元化控制下,按理说出版审查制度的作用理应降低。没想到新闻检查和出版限制反而常规化、制度化了,查禁书目、勒令停演的比例大大上升,而且掌控的尺度较20年代大为缩小。按当时苏联人自己所说,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斯大林以渲染“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真理。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的便捷材料,就必需有“真空化”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

当时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被终止。他们与世界学术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来访,而且让他们参观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⑤。在反对“世界主义”和抵制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

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陈旧得几乎无法使用。中央组织局更换了共产主义研究局和各意识形态机构的大批干部，以替换那些党不信任的知识分子，解散了几乎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建立了由中央统管的权属统一的学术团体。为形成命令畅通的组织领导系统，当时明确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知功能必须退居到第二位甚至第三位，它的第一位功能是歌功颂德的“宣传”功能。

焚书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毒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籍的清单。在这次“焚书”中被销毁的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册、宣传画223751份，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注6}从此“人民敌人”的成千上万册图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少数个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留这些书籍。^{注7}就是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随着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建立，整个知识界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20年代苏联学者与外部的联系中断，苏联学者对西方同行一无所知。在1917年以前浑然一体的俄罗斯知识界已经一分为二为“白俄学者”与“苏联学者”。一部分流亡在外，另一半在国内遭到贬黜，革命将他们分裂成两种不同的人。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从20年代末到二战前夕，社会完全原子化，知识分子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层”。对知识界而言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暗淡的年代，也就是所谓的严寒“结冰”时期。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生活在苏联国内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生存压倒了一切”，“对知识分子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年代”^{注8}。而那些保持人文精神的学者都把自己

视为19世纪俄国最后的代言人，从学术传承上他们都说自己属于俄国，绝口不提苏联。他们觉得19世纪文化是自己的真正家园和避难所。

“真空罩”打开以后

然而这种“真空”的“无菌世界”使苏联失去免疫力。正如麦德韦杰夫说的：“苏联时期的很多东西不仅是靠暴力维持的，也是靠欺骗和伪造维持的，建在‘铁幕’后面的苏联社会缺乏民主制度和传统，不具备进行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机制。它不允许异己思想和反对派，粗暴的拒绝任何外来的批评，借助镇压手段来保护政治上的无菌状态，结果社会丧失了对各种疾病的免疫力。而这些疾病在别的社会很容易对付。”麦德韦杰夫因为讲了这些话而被开除党籍、公职并被流放。但是到1991年苏联剧变、苏共被解散时，几千万浑浑噩噩的党员像当年顺从斯大林统治那样低眉顺眼地接受现实。苏维埃与人大会议上，几千名“党信任的”代表鸦雀无声，唯一一个起来抗议的人，就是这个当年被开除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刚刚恢复党籍的麦德韦杰夫！

一个大国如果只有在精心隔离的环境中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像一个失去了免疫系统的肌体只有在玻璃罩下靠人造食物才能生活一样，一旦玻璃罩打碎，社会就开始崩溃，这种制度在历史上注定是要失败的。（责任编辑 萧 徐）

注：

注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230页。

注2 参阅《列宁全集》第2版，第52卷，334页、第43卷30页。

注3 . . . , 2002, 523

注4 《自由思想》1992年第1期。

注5 指俄国历史上叶卡特琳娜女皇外出视察，宠臣波将金在女皇路经之地搞的粉饰天平的假村庄，俄国人讥称“波将金村庄”。

注6 格·维·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莫斯科2001年，339页。

注7 罗·伊·麦德维捷夫：《让历史来审判》896页。

注8 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选编》外文出版局1980年，279页。

莲花峰七勇士

张天来

(一)

2007年7月5日，“七七”事变七十周年两天前的上午，我们一行四人，走在莲花峰的一条山脊上，探寻67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我接触这个故事，是从去年秋开始的。那天是我们单位组织一些人到天津蓟县参观游览。在盘山烈士陵园的陈列馆里，当壁上出现一位老军人的形象，耳边响起年轻女讲解员清脆如铃的声音：“在抗日战争期间，盘山发生过‘莲花峰七勇士’的故事，就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她说的是在抗战初期的1940年，七名八路军战士，在完成阻击敌人、掩护部队转移任务之后，从莲花峰顶西侧跳下了山崖。这声音如洪钟，似惊雷，让我这七旬老者迟钝的心灵，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首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蓟县人，在我的同胞中出现了如此顶天立地的英雄集体，怎能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呢？！接着就问自己：这样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发生在你的故乡，你为什么竟然一无所知，亏你还作了几十

年的记者？！

于是，今年6月，我邀请摄影记者吴力田一起两探蓟县，又飞四川，寻访英雄的家属亲朋、生前战友和众多知情人士，搜集大量有关史料，为读者提供这份报告。

1940年春天，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十三团团团长包森，率领人马来到盘山东北部深山里的梁庄子，开始了创建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他是陕西蒲城人，延安抗大毕业，1938年跟随宋（时轮）邓（华）支队来到冀东。他那勇敢的独立作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斗作风，给了敌寇很大的打击。他领导的那支队伍，硬是在遵化活捉了日本天皇表弟、宪兵大佐赤本。疯狂狡诈的日本侵略军为扑灭将要熊熊燃起的抗日烈火，紧紧盯住了包森，纠集强大兵力，分几路向着梁庄子猛扑过来。敌强我弱，部队只能转移。警卫班长马卫东率领6名警卫战士，主动向包森副司令请求担任阻击任务。

七勇士开始由东坡攀登莲花峰，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登山路。他们用密集的火把敌寇吸引过来。一次次地隐蔽射

击，一批批地杀伤敌人，像牵牛鼻子般把敌人牵到莲花峰顶。直到最后，子弹和手榴弹打光，又用尽了山顶上的石块。当石块也打光，敌人围上来的时候，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7名“誓死不做亡国奴”的青年勇士，由最陡的悬崖跳了下去。

在七位勇士中，六位警卫班战士光荣殉国，贡献了人类最宝贵的生命，把鲜血洒在了祖国神圣的大地上。班长马卫东被树枝挡了下来，摔成了相当严重的脑震荡。深山小村里的一位农民救护了他。

(二)

莲花峰七勇士这种感天动地的壮举，人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就给予了重视。最早报道此事的是十三团二营教导员王文。他就是蓟县人，参加过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后来，他成为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并曾经担任司法部副部长。1941年，他一到二营就听到人们动情地传说着隶属二营的警卫班战士跳崖的故事，深深地受到感动。这一年，王文的简短报道刊登在十三团的

《生活报》上。这是七勇士事迹最早的一次见诸报端。

当时《生活报》的编辑是十三团宣传干事，后来成为著名的军旅作家的刘大为。包森副司令员1942年光荣牺牲之前，不止一次地向刘大为交待任务，要他深入细致地采写莲花峰七勇士的动人事迹。包森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马卫东英勇杀敌的许多故事。为此，包森副司令向刘大为赠送了一支钢笔。刘大为不久就调离十三团，而且他在后来的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无论他怎样努力寻找，却始终没有能够探访到马占东的踪迹。

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几十年间，人们仍然在怀念莲花峰七勇士。蓟县档案馆馆长王雪松，也是蓟县抗战时期的老干部，而且也办过报纸，当然也了解七勇士的感人故事。他通过马占东家乡的亲属，找到了马占东在四川的通讯地址。在广泛搜集并在马占东来信提供许多材料之后，王雪松撰文歌颂莲花山七勇士的事迹，发表在1989年3—4期合刊的县办刊物《山里红》上。这是报刊上对于莲花峰七勇士的第二篇文字记载。

2002年2月，83岁的马占东在四川省军区干休所与世长辞。遵照他的遗志，他的妻子、儿女由四川护送他的骨灰到故乡，将其埋葬在盘山脚下瓦岔村北的一片墓地中间。

老人的去世，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首先，是青年业余作者、县国税局干部杨银华，在2002年3月的天津《今

晚报》上报道了60几年前的这一动人故事。同年，寻找马占东60多年的已近80高龄的军旅作家刘大为，闻讯由北京赶来墓地，抱着墓碑悲愤地说：“你让我找了60多年。”他满怀深情地赶写两篇文章，发表在《天津日报》和天津《公益时报》上。2004年，80高龄的刘大为逝世。在他逝世之前出版的文集中，我看到了有关莲花峰七勇士的纪念文章。我们可以说，刘大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60年前包森副司令员的委托。

在采访七勇士的过程中，有两种想法在我的头脑上越来越加浓重，这就是：莲花峰七勇士的动人故事，为什么竟然沉睡了60多年，至今仍未如同“狼牙山五壮士”那样家喻户晓？！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则是，七勇士中幸存者马占东，在60年的漫长岁月中，为什么没有想方设法把七勇士的故事传扬开来？！

(三)

马占东1919年出生在盘山脚下瓦岔庄的一个雇农家庭，六七岁刚刚具备劳动能力的时候，就给地主当长工，常年在野外放猪。1935年起，他担任蓟县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1938年，宋时轮、邓华支队挺进冀东，他入伍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1940年，随包森开辟盘山根据地，担任警卫班长。任何一个并不刻意追求名利的人都会认为，马卫东参加革命的历史，怎么说也应该从

1935年算起，而且当年蓟县地下党的几位负责人已是河北省的高级干部，完全可以为他作证。而马卫东却怎么也不肯去找这些当年的战友。而且坚决不许孩子们去找。他硬是把应得的报酬坚决地拒之门外。

当我们跟随马占东的深深的足迹，走到他的尽头，我们就看到了一位在熊熊战火中走出来的只讲奉献、不计报酬的英雄。家乡的父老乡亲只知道马老莲花峰跳崖的往事，而且牢牢地记住了他所说的“情况忒紧，没办法啦。宁肯跳崖，也不能当俘虏。”这一段虽然简短却铿锵有力，感人肺腑的话。之后，他在北方和南方接连参加了打垮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无数次战斗。新中国诞生之初，他又走上抗美援朝战场，在打击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回国之后，他又接到命令，率领三个团的指战员，奔赴四川西昌，指挥了大小凉山的剿匪战斗。

在战火的锻炼和考验当中，他一步步地由连长晋升营长，又晋升为团长。肩上的重担不断在变化中增加分量。唯一不变的是他的身先士卒的战斗风格。几乎是每一次大小战斗激烈进行当中，他的岗位都不在指挥所，而是战场的最前沿。这是一切称得上“优秀指挥员”的必备品格，最神圣的地方就在最前线。

他就这样在前线上打了好多年。在战争中一只眼球被打掉，他自己竟然不能准确记得时间、地点，更不记得是被什

么人打掉的。只有他 80 岁老伴至今还记得，他的眼睛伤残是在同日本鬼子交战中被炸的。他身经百战，九死一生，体内取出和留下的弹片共有多少，他自己也并不准确知道。他老伴知道，直至逝世，身上还有 18 块弹片没有取出。他只是跟家人说起过，有一次战斗负伤，外科医生想要锯掉他一只伤势相当严重的胳膊，引起他怒火万丈，在昏迷前大声吼叫：“谁给我锯掉胳膊，我枪毙他！”这一吼，把外科医生的潜在能召唤了出来，团长的胳膊完好地保存下来了。任何正常人都会相信，马卫东的这种怒吼，完全不是为了自己。

在我们的访问的人们当中，我要特别介绍一下马卫东的一位战友所提供的情况。这位战友是马占东在西昌剿匪时的政治部主任兼副团长，后到四川省气象部门工作的冯玉贞。冯老今年已 85 岁高龄，但对几十年前的老战友的表现，却记忆犹新。冯老同马老在西昌剿匪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钦佩马老，首先是马老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他时常带领全家到干休所看望老团长。马占东往事重提，对冯老说：“谁都知道前边有危险，那时候只有我们两个经常上第一线！”冯老记得十分清楚，有一次正在吃饭的时候，有人报告土匪来了，大家放下饭碗，拿起枪就追，跑在最前面的仍然是团长。冯老还深情地谈起在西昌剿匪时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马占东讲述剿匪和战斗艺术。怎么做到

有理有节？怎么剿？怎么抓？由于包含着他的丰富的战斗经验，所以讲得十分精彩。在座的县委委员们对这位团长钦佩极了。县委书记问冯玉贞：“团长什么程度？”冯说：“大学毕业。”又问：“什么大学？”冯说：“高粱地大学。”

朋友，看到这里，你是否对马占东没有向外界讲述七勇士跳崖事迹，更没有留下六位烈士的姓名，能够有所理解了呢？！一个不怕苦，不怕死，不要名也不要利的人，当然不会主动向外界宣扬自己，原因是他们忘记了自己。

马占东闪光的思想和行动，在和平的年代里继续坚持了下来，让我们听到了这位

“高粱地大学”的毕业生的出色的表现。

(四)

走在莲花峰的山岭上，七勇士的事迹在我眼前不断地显现。马占东的高大形象在我眼前好像是活了下来。马占东代表着共产党人的一切优良品质，集中到一句话就是：只讲奉献，不谋私利。他就像是一块纯度最高的金子，没有杂质，任何大染缸都没有办法让他遭到污染。我想，在七勇士特别是马占东面前，一切不合格的，只知谋取私利的所谓“共产党员”，都应该低下头来。（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7 年第 8 期目录

口述历史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李先闻
书屋讲坛	生命的转折点：回忆文革后的高考	张隆溪
	我的大学	邓晓芒
说长论短	很想向上海市长提个建议	方成
史海钩沉	乱花迷眼：毕加索与中国	李兆忠
	天助自助者——忆先师费孝通教授	刘绪贻
	文史大师姜亮夫	散木
法制经纬	一船明月一帆风——作为开风气人的李石曾	叶隼
	言论自由与诽谤罪	任东来
域外传真	“水门事件”的历史遗产	陈伟
	情报人员的命运	
	——谈电影《特务风云》中美国的 CIA	孙康宜
	作为精英游戏的美国政治	
湖湘人物	——重看电影《华氏 9·11》后的思考	陈心想
	龚橙与魏源	夏剑钦
裁书刀下	宋教仁登南高峰	傅国涌
	大话唐僧和孙悟空	伍国
	小人陈经济	石定乐
	现代作家眼中的钗、黛	黎荔
灯下随笔	林语堂的“玩世主义”	赵立坤
前言后语	《愚公移山》与《中国》	蒋晗玉
书屋品茗	议事程序与公司治理的民主制衡	
	——《新编罗氏议事规则》中译本导言	孙涤
	并非序言	
	——写在康华楚兄近七十载旧体诗结集出版之际	李冰封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 6 日出版 定价：5.00 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汤恩伯与南口战役

吴家林



汤恩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至当月底，平津两市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决定日军分兵三路：一路从平汉线南侵；一路由津浦铁路南犯；另一路则沿平绥线西出南口，向晋察绥奔袭，直接战略目标为山西。

南口是扼冀察与山西的咽喉，其地形多崇山峻岭，关隘重叠，易守难攻，乃古今兵家必争之地。

日军也清楚认识到南口在军事上的战略地位。从平绥路进军山西，可以夺取整个华北；另外可以清除后侧之威胁，保证日军顺利南下。日本政府抽调精锐部队有：铃木重康率领的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酒井镐次率领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以及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共计兵力在七万人以上。因此南口天险对日军来说，是势在必得。

汤恩伯在南口防御，主要依靠两个人。一个是第四师副师长陈大庆。汤军急援南口，当地仅派参议作形势之联络，对南口方面的地形，还是陈大庆自己去摸清楚的。他在横岭城，组织临时司令部，用电话指挥前线部队作战，听取敌情，随时遣调布置，同时向后方高级长官报告，或传达上级命令。他对于前方地形相当熟悉。

另一位是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他访问怀来城内八旬老者，询问八国联军是如何攻下南口天险的？8月4日，“为明了南口一带地形现象，以便战术应用，达成战略目的”，他携副师长、参谋长、旅、团长诸人，同往南口及两翼山地视察。接着采取了缩小南口正面防御阵地，固守两翼高山作战计划。将南口车站……改为前进阵地，而将主阵地移至南口及两翼山麓、山腹。”总之利用“复杂地形”，决定配备纵深阵地，以阻敌军，达到持久战消耗敌人之目的。

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很赏识汤的才华。

汤经常向蒋呈递“手本”献策。第十三军在百灵庙一战后，奉命屯兵平绥路，其指

挥部设在平地泉。7月9日，当汤恩伯听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立即上电蒋委员长：“卢沟桥事变传来，愈感边防危急，职除督饬所部坚固驻地防御工事外，并饬属随时准备待命中。关于冀察当局方面，亦正设法联络中。”第二天，汤便收到蒋的回电：“所见甚是，希妥为准备应付时局外，并对于冀察方面密切联络，务期中央与地方融成一气为盼！”接着汤恩伯给第一战区的军政要人宋哲元、冯治安、秦德纯等去电称：“本军戍驻边陲，责任卫国。贵方如有所需，请时予指示，誓率所部，为贵军作后盾。”一星期以后，汤恩伯又上电蒋委员长暨军政部长何应钦，表示第十三军将士誓死抗战的决心。平津两地陷敌，日军向北平的沙河、昌平一带集中，南口战役即将揭幕。

汤恩伯是南口战役的前敌总指挥，又兼第十三军的军长。旗下兵力近六万人。包括两个军、两个师及一个旅。而第十三军是南口战役的主力；全军人数有两万八千人。第十三军是中央军嫡系部队，其素质和装备较其他部队为优秀。

从7月底至8月底，蒋介石几乎每天给前敌总指挥汤恩伯发指令。有时一天两三次。1937年8月18日，蒋介石致汤恩伯电：“汤总指挥，兄部无线电报应每日晨、午、晚三次与京中通电，怀来等据点城防工事已成否？盼复。中正手启。”

8月13日，汤恩伯给罗芳疆团长电令称：“南口阵地，关系国家对抗战之成败……尤其吾人赖

以抵抗强敌者，为战斗精神，而非大兵与精良之武器，吾侪誓死决不离开阵地寸步。人生百年，终须一死，好汉死在阵头上，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请以此意转告与吾侪同生死、共患难之全体官兵，倍加努力，争取胜利为盼！”又给王仲廉师长电示：“南口阵地，即为吾侪光荣之归宿。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吾侪宁死尽以维护此阵地，并不幸求生还也。并转告全体同生死之官兵们！”苟吉堂在《南口之役》一书中称：中国军队“固守南口之恶战，已达白热化，有形之实力，固已对敌战斗作最有效之使用，而在无形的精神因素上，亦已发挥到最高限度，形成有我无敌之气势，此实为汤总指挥守备南口指挥作战之伟绩。”

作为战役的前敌总指挥汤恩伯责任重大：他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指挥好这一场战役，打好这一场仗。他把总指挥所放在怀来城内；但经常去师、旅、团指挥所，与下属将士商讨如何打击敌人，同时还鼓励官兵为国争光。汤恩伯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那么卫兵、勤务兵呢？早已加入火线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挥，对着兵士沉痛地说：“我们要好好的打呀！”他只能说这样简单的的话了。他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里就充满了泪水。兵士们见到这样一个人，也认不得他是谁了。猛然认出，这是军长呀！当他们想过来这个人与他们的关系之时，也感动得流出泪来。

著名记者范长江在当时《大公报》上报道：“汤恩伯先生因为日夜辛劳的结果，瘦得不成样子，两个眼睛深深的凹入，整个身体留下了皮包骨头。”故日夜操劳精密指挥，已半月未曾得一安眠机会，整天和电话、地图接近，时时注意敌人一尺一寸的移动”。

8月25日，日军猛攻横岭城和居庸关；接着日军随即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攻击怀来城。这样，长城线上各据点守军已处在日军前后夹击态势下。张家口已失守；卫立煌部队仍未联络上。加上居庸关、横岭城告急。汤恩伯当天晚上将战况紧急电告蒋介石。蒋于26日上午来电，仍叫“死守阵地，切勿再退”。作为前敌总指挥的汤恩伯，经过周密分析和正确判断，决定于下午1时30分下令要全军突围。退却令下达后，第二十一师、第八十九师分两路突围，都到甘家堡、辛店集结。第七十

二师、第四师经洋河左岸，向土木堡一带集结。独立第七旅固守怀来，并掩护其他部队转移。第八十四师，向长安岭、沙城一带集结。第九十四师，一部开赴涿鹿担任城防；另一部占据延庆以东阵地以掩护二十一师、八十九师转移。总指挥部已转移至桑园。撤退令到达各固守点时，各部队仍在与深入围困我阵地的敌人激战，各处的战场几乎是交错混乱的胶着状态。为了脱离接触，激战昼夜不停。直到8月27日，转移中的部队，仍与四面来袭的日军苦战。汤总指挥再令各部分别向广灵、蔚县、谢家堡、龙门口、马水口等地集结。

南口激烈的攻守战，历时20多天，中国军人以伤亡33000人以上的代价，歼敌15000人。第十三军是这一场战役的主力，伤亡12600人，占全军人数28000人的45%以上。这一场防御战，中国军人打得勇猛、顽强、悲壮、机智。打掉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创下了一次战役日军死伤万人以上的纪录，延缓了日军攻占山西的时间，使日军“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破灭了。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短评写道：“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久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责任编辑 赵友慈）



中条山战役引发的 『笔墨交锋』

王
鹏

《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发表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为此，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由此引起了的“笔墨交锋”，曾经轰动重庆城。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瞰制豫北、晋西，屏蔽洛阳、潼关，是抗战期间日军进击华北的要地。1938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中国军队为了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区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基础的游击根据地。在而后的二、三年内，日军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了十多次围攻，企图摧毁中条山根据地，消灭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但终未得逞。1940年秋，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在重新检讨了自己的作战方略后，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在1941年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有计划。他们认为，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而晋南中条山地区国民党卫立煌部队长期牵制日军四个师团，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队又无意与卫立煌合作。因此，日军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1941年3月，日军进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而蒋介石却置之不顾，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而庞、高部却强调种种困难，仍按兵不动，情绪低落，疏于防守。国民党军队的某位高官不得不承认，“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4月初，日军开始在中条山地区集结，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这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军事会议，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而第一、二战区军以上长官对日军大举进犯前毫无思想准备。4月20日，何应钦再次召开军事会议，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但因指挥系统繁细，迟延费时，各地国民党军队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一之准备”，出击部署未及传达和实施，而日军于5月7日下午开始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

日军从东、北、西三方面发起对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守军的进攻，经过近三周的激战，国民党军队主力陷入重围，给养中断，损失惨重。一部分士兵突围南撤，沿途又受到日军的截击，溃败四散。在这次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守军被打死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以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他们惊呼：“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日语对华广播说：“以中条山为中心盘踞于山西省东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注：即八路军，下同）主力，于我军攻击重庆军时，不但始终持对岸观火态度，且出动游击队威吓重庆军侧面，并乘机解除败残军之武装”；“日军与共军素不彼此攻击”，以挑拨国共关系。其实，在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

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太岳部队在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自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八路军还应何应钦的要求,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二、三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利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逃避不抵抗的罪责,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一时间真相难明。国民党军队虽吃了败仗,却得到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们的同情,在舆论上占了便宜。但蒋介石仍嫌不够,指派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渝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当时在重庆,《大公报》作为一份民间报纸,影响比《中央日报》大得多。蒋介石这样做,是要进一步掩盖事实真相。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篇《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

此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5月21日《大公报》重庆版的这篇社评后,感到事关真伪曲直,需要认真对待,用事实给予“反证”。因为当时《大公报》在读者眼中的分量,周恩来是清楚的,蒋介石之所以要《大公报》出来说话,其原因亦基于此。为此,周恩来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将信送到李子坝建设新村《大公报》重庆馆。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信中说:“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的。”最后提出希望:“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四五年常持此语自励励人。今敌

欲于积极准备南进之际,先给我以重击,并以封锁各方困我,力不足辅之以挑拨流言,和平空气。我虑友邦人士不察,易中敌谣,故曾向美国通讯社作负责声明,已蒙其十九日在上海广播,不图今日在此复须又一次声明。我信贵报此文是善意的督责,但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使贵报的希望得到回应,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周恩来的信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引起反响,起到了澄清事实、纠正谬误的作用。这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是张季鸾先生扶病撰写的,他在社评中说:“读周先生的来信,关于此点得到圆满答复,就是十八集团军一定协同作战。我们知道周先生这几年对于促进团结抗战,尽力之处特多。在现时,几乎是政府与延安间惟一有力的联系。此次给本报的信,我们不但相信其有根据,有权威,并且相信他正为此事而努力。”社评还重点提出了对处理好国共关系的希望:“最好借此次在晋协同作战为起点,对于统帅部与十八集团军之间的许多应妥善处理的事情,都协商解决,重新再建团结的壁垒。”社评最后说:“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的谅解,则其他小的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甚么都伟大。在此意义上,盼周恩来先生今后更多多尽力。”在这里,张季鸾始终把共产党当作政党看待,并放在与国民党对等的地位,是有远见的。

周恩来看到自己的信在《大公报》全文发表,对张季鸾的气度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周恩来的信是在批驳《大公报》社评的错误观点,而《大公报》能够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批驳自己观点的来信,且又不得不冲破国统区的新闻管制,这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周恩来曾经对张季鸾有这样的评价:“作报社的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下转第7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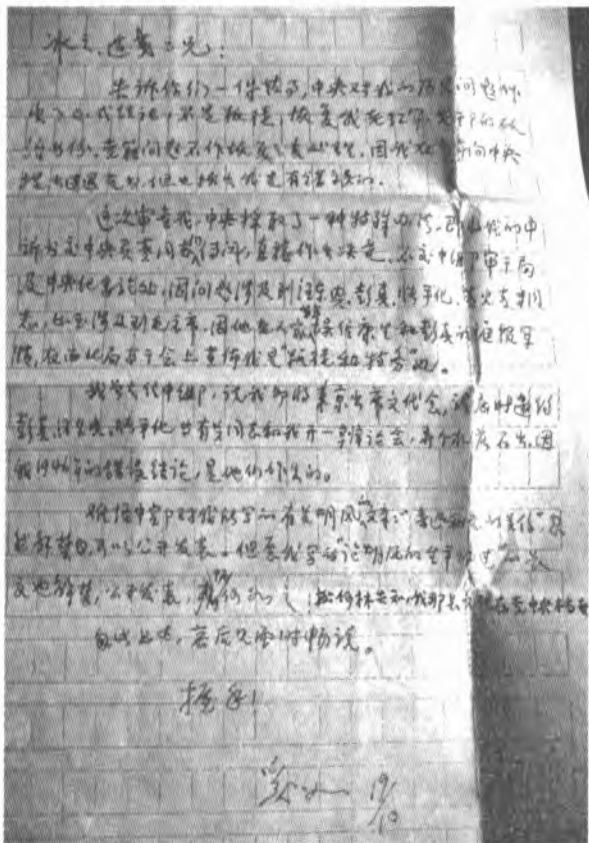
涉及吴奚如平反的几封信

李向东

1979年10月下旬,丁玲刚搬入木樨地新居不久,楼适夷来看她,带来一个消息:吴奚如来信了!

听到这个仿佛十分遥远的名字,一下子让丁玲回忆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1937年抗战刚一爆发,延安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宣部的朱光在成立大会上宣布:丁玲任主任,吴奚如任副主任。他们从延安出发,开往山西抗日前线,一路行军,一路宣传。那是一段多么令人怀念的豪迈生活!丁玲急切地说:“快把信给我看!”

“冰之、适夷二兄:告诉你们一件喜事,中央



吴奚如致冰之、适夷信的复印件

对我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不是叛徒,恢复我老红军、老干部的政治身份。党籍问题不作恢复之类处理,因我在当年向中央提出过退党书,但也指出我是有错误的。

“这次审查我,中央采取了一种特殊办法,即将我的申诉书交中央负责同志们传阅,直接作出决定,不交中组部审干局及中央纪委论处,因问题涉及到汪东兴、彭真、张平化、黄火青等同志,甚至涉及到毛主席,因他老人家当年误信康生和彭真的谎报军情,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宣布我是‘叛徒和特务’也。

“我曾去信中组部,说我即将来京出席文代会,请届时邀请彭真、汪东兴、张平化等有关同志和我开一辩论会,弄个水落石出,因我1946年的错误结论,是他们作出的。

“难怪中宣部对我所写的有关胡风的文章《鲁迅和党的关系》,忽然解禁,可以公开发表。但愿我写的《论胡风的生平功过》的长文也解禁,公开发表,痛快何如之!据何林告知,我那长文现存党中央档案馆,成为历史文献了。

“勿此上达,容后见面时畅说。”

吴奚如也称得上是老资格共产党人了。他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叶挺独立团政治处副主任,1928年任湖北省委常委、军委秘书、军委书记。1933年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调入中央特科。1938年离开西北战地服务团之后,调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后来到新四军,任江北纵队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但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受到审干扩大化的迫害。1942年底,在西北局的高干会上,毛泽东误信了康生等人的不实汇报,讲话中说:我们

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我们这里来闹乱子。

吴奚如提出申诉，不被理解，一气之下提出退党。此后，他在东北解放区从事工会工作，后来回到武汉，从事写作和教育工作。所以吴奚如的所谓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所谓“叛徒”，一是退党。

丁玲收到吴奚如的信后

不久，吴奚如就来到北京，出席第四次文代会。11月6日中午，丁玲与陈明一起，去看望这位老朋友，陈明当年是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宣传股长，他们回忆起当年的往事，尽情地开怀畅谈，尽兴地开怀大笑。会议结束之后，11月20日，吴奚如夫妇来看丁玲，但丁玲由于气管炎导致糖尿病加重，这时已经急诊住进友谊医院。陈明留他们在家里吃了午饭。吴奚如回到武汉后仍然不放心，于12月17日写信来：

“冰之姊：临离开北京时，曾率内子到你处告别，不意你病了，进医院治疗，心情极为怅惘！曾托陈明兄转致慰问，愿已告愈！古人有言：‘别时容易会时难’，我真意识到这话的深意。回首卅多年前，在哈尔滨匆匆分别后，谁也不知道谁还能活到现在，但愿这次的北京之会，不是永诀！我们真的老了，离坟地不过‘五尺之遥’（托尔斯泰语）。望你珍重，首先要使自己健康，别的放在第二位，写作亦然，不知以为然否？”我是一到冬天，就像草木一样衰竭——多病，‘与草木同朽’，人与自然有共性。望随时告我平安！”

本来吴奚如在北京登门看望丁玲时，是想要告诉她一件事，他与聂绀弩一起，在文代大会上准备提出给胡风平反的问题。周扬听说后，找他们谈话，说中央有精神，不要纠缠历史旧账，要顾全大局，劝阻了他们。



1939年4月，吴奚如与参加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八路军国政教官在一起。从左至右：吴奚如、叶剑英、李崇、李涛、边章伍、薛子正

但这时吴奚如已经写了两篇为胡风说话的文章，一篇是《鲁迅和党的关系》，一篇是《论胡风的生平功过》。当时胡风问题还是一个“禁区”。吴奚如是在上海左联时期认识胡风的，他对胡风有好感，说胡风在联系鲁迅和党的关系上有功劳，他也不相信胡风会是“反革命”。这两篇文章，吴奚如本打算在刚刚创刊不久的《新文学史料》发表，但未能遂愿。其后，《鲁迅先生和党的关系》在武汉的文艺刊物《芳草》上发表，据说《芳草》还因此受到了批评。11月29日吴奚如致丁玲信中说，“12月份的《芳草》，要登我一篇论胡风生平的长文，你想看看吗？”指的就是此文。

1980年2月，吴奚如的儿媳妇戴行健从北京回武汉过春节，谈到丁玲陈明想要一本《芳草》看。2月14日，吴奚如给他们写信说：

“这期的《芳草》有我一篇短文，无非为了澄清不少人对胡风的诬蔑，因写作时传闻胡风已死，更是为了纪念他的缘故。这篇短文原是为《新文学史料》写的，另外还写了较长的两篇，遵照中宣部的决定，双方文章都不再公开刊出，但夏衍以老卖老，公然把他的文章交《文学评论》发表。以此，廖井丹同志就批准我的及何林等人的文章一律发表，除我在《芳草》上发表的这篇外，还有另一篇将在《鲁迅研究资料》发表。而专论《胡风的生平功过》的长文，发表还未到时候，原稿存中

宣部,节录稿在我这里。《新文学史料》编辑组有抄印件。《芳草》一发刊,被人抢购一空,引起轰动,据说外省都有人寄信来购买,可是已无存本可寄,我的两本也被人借去看,至今借来借去不还给我,因此暂不能寄给你们,但有一份附印(复印)件,现随函寄上一阅,其实,这不过是游击战的一兵发的一枪而已。因我参加省政协 我被增选为所谓省政协常委)及省文联会议,迟了几天才写信奉达,乞谅!祝愿冰之健康,陈明愉快!弟奚如”

以后吴奚如写信,抬头均为“丁玲姊”或“冰之姊”,而落款都是“弟奚如”。

吴奚如 1985 年 2 月 27 日在武昌去世,在处理丧事时,他的亲属要求为吴奚如恢复党籍,彻底平反。这个问题湖北省无力解决,他的子女来到北京,向有关方面申诉,并向吴奚如的好友寻求帮助。3 月 11 日晚上,吴奚如的三个子女来到丁玲家里,希望她能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把申诉信件转交到胡耀邦总书记手里。丁玲答应了,次日上午,丁玲去看李锐,讲了吴奚如的情况,希望能得到中组部的帮助。李锐说,这个事情,如果在周总理生前,比较容易处理,现在恐怕很难了。他收下了丁玲带来的信。

3 月 18 日,丁玲陈明飞往桂林,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广西,他们接到聂绀弩夫人周颖 3 月 21 日的来信。聂绀弩、周颖夫妇与吴奚如关系甚好,1933 年在上海左联时期,他们就是邻居,住在同一寓所,胡风也常到他们那里吃饭聊天。1935 年,党中央特科要吴奚如物色一些上海左翼文化人到特科系统工作,吴奚如就挑选了聂绀弩,因为“他和国民党许多上层分子,包括康泽在内有故旧关系”。(见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

周颖信中说:

“关于亡友吴奚如的问题,已于 18 日写信给邓大姐了,具名是您(丁大姐)和我,还有朱惠朱端绶两姐妹。邓大姐是会看到这信的,还不知结果如何。今天我给李锐同志通了电话,他说组织部还无回音,我请他再为询问,奚如的子女还在北京等着,李锐同志已答应将询问情况告我。他们给胡总书记的信准能送到,只是也无消息。据长春说,武汉方面也无动静,好像他们对奚如停放殡仪馆也满不在乎。我们这做朋友的为奚如不能很快安息,十分焦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您们还能想到什么办法?”

朱端绶,她的爱人熊瑾玎,在党内有一著名的绰号“老板”。1928 年党的六届中央机关在上海,他们夫妇的住处就是秘密的中央机关办公地,那时他们就与周恩来非常熟识。全国解放后周总理邓颖超对他们老夫妇也一直十分关照。朱慧是朱端绶的妹妹,吴奚如的前妻,抗战爆发前,吴奚如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做教员时,丁玲与他们夫妇住过邻居,过从甚密。

在热心的周颖、丁玲等人积极奔走活动下,吴奚如的党籍问题终获解决,1985 年 5 月 18 日,吴奚如的儿子吴长春给丁玲阿姨、陈明叔叔写信:

“我欣喜的告诉你们,父亲的党籍得到解决,党龄从 53 年算起(因组织上查阅档案时,发现 53 年有父亲要求解决党籍的文字材料)。事情办得比较顺利,是因为中央组织部打长途电话给湖北省组织部,叫他们 1、解决党籍;2、丧事要办得隆重些。这样,省文联这些人才不得不办。在办理此事的过程中,处处得到像你们这样的父亲的老朋友的帮助,出力出智。我们全家都十分地感激。” (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接第 73 页)余。“张季鸾提出的‘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的希望,在 1945 年 8 月 28 日得到了实现,而张季鸾已在 1941 年 9 月 6 日病逝,他再也没有机会对国共和谈发表见解了。

通过这次“笔墨交锋”,王芸生对周恩来有了深刻的印象,对他爱憎分明、坚持真理、忠于事业的精神深为敬佩,特别是对“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的名言,牢记在心,折服不已。

为此,王芸生将周恩来的来信一直珍藏着,在以后的十数年间,无论是遭国民党的追查封杀,还是辗转迁徙,他始终将这封信保存完好,直到 1955 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时,才将这封信作为新闻史研究资料交予系主任安岗。现在,此信完好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成为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今谈

官伟勋

晋文勾践死里逃生艰辛倍尝终成霸主；殷纣周幽沉湎酒色，国破家亡成了遗羞千古的著名昏君。从刘汉、李唐到元、明、清，哪一个开国君主不是生于忧患？哪一个亡国之君不是毁于安乐？事迹凿凿，示意昭昭。所以有识之士无不把孟老夫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作为至理名言，不时提醒自己。

—

安乐之所以能令人致死，用一句俗话讲，因为它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能让人在没有痛苦没有畏惧，而且是在心荡神逸的舒舒服服的心态中，“自觉自愿”地奔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安逸享乐离不开酒色财气。财是基础，气是权势，酒是饮欲，色是情欲。其中尤以色欲为甚，它常常是抓权捞财的潜在动因。“食、色，性也！”“男女乃人生之大欲。”不要说一般凡夫俗子，即使佛门弟子因淫心缠绕激情难耐“欲自断根”，决然“以刀自割其势”以求“塞源除根”者，《法句譬如经》等经书里就多有记载，《太平广记》也记有“释空如均求不破色而自宫”之类的极端行为。不独中国和尚，国外如《新约全书》中不也有“有人为登天而自宫”之说吗？见钱钟书《管锥编》？可见，所谓“佛曰断根不如断心”的教导，确为有据而发，而且带有国际性。

能自“断心”自然好，但谈何容易！好色既是天性，且是“大欲”，想断就能断得了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有的人就是宁肯断头也是不肯断这心的。不是说欲火难填、“色胆包天”吗？为了色欲，天都不要了，还要命？《春秋》二百多年间，亡国

五十二，弑君三十六。其中许多都与淫乱私通有关。我们共产党对干部教育不能说少，要求断绝此心以“克己复礼”的意思不能说讲的不明确不透彻，然而，依然有那么多人贪污腐化包二奶养情妇！可见，教育是必要的，但仅凭这类教育是绝对塞不了源断不了“根”的！

在安乐日久而又没有有效制约、与“食色本性”的本能驱动下，一朝权势在手，日日盛宴夜夜歌，看不够的秀色，饮不完的美酒，听不尽的阿谀逢迎，收不完的礼——在这种高温腐蚀缸里日复一日地泡着，泡久了，多硬的骨头也泡酥了，多坚强的意志也泡成汤了！

安乐是如此的厉害，所以用“安乐”为手段敌于死者，不绝于书。越王勾践“以美女宝器”离间了吴国君臣，使吴遭了灭顶之灾。齐国不动干戈不动刀，送了几十个女人就把刚刚崛起的鲁国搞垮了。勾践的事，早已家喻户晓；齐鲁间事，《史记·孔子世家》有生动记载。

孔子在鲁国当了大司寇兼丞相，很快便把鲁国治理得不仅路不拾遗，而且连一向掺水卖羊肉、猪肉，掺水卖粥的也不再掺了。人们安居乐业文明经商。男女分行，礼让成风。齐国紧张了，鲁国称霸，齐国最近，怕首先遭兼并。有人主张献地求安。大夫黎锄说不忙，先设法阻遏其发展看看，不行再献地不迟。他劝齐王选出80个美女，给她们穿上极其艳丽华美的服装，教她们学会令人心荡神逸的“康乐舞”，外加三十驷文马，送给了鲁君。此计果然见效。鲁君一看就迷上了，一连三天不问朝政，连祭祀的烤肉分给大夫这样的重大礼仪都不顾了。孔子说道：女人厉害呀！她们的嘴能离间君臣，能败坏国政。我这个官不能当了，走



吧！再呆下去就危险了！

满腹经纶名扬四海的孔老先生，也只好挂印下岗，雇了车，带上徒弟，饥一顿饱一顿地周游列国另谋高就去了。鲁国呢？很快便衰败了。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不久，“三桓攻公，公奔于卫”，如邹，如越，到处流浪，最后“死于有山氏”。之后，“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鲁周已名存实亡。

16世纪意大利一位政论家说：“安乐为人生之大敌，其难御远过于苦困”。古人曹大文慨叹的：“人只念救苦救难观音，何不念救安救乐观世音？”（《管锥编》）观音自然是不存在的，他也救不了谁，但能说出这样的话，却是对人生有着丰富阅历而又具备异常观察能力的人才说得出的！

二

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一向把邻国饱经患难自强不息而居尊位的人，视为可怕对手。楚国大将子玉力主发动对晋国的战争，楚王说：“晋侯

（因遭骊姬谗害）在外逃难十九年，什么艰难险阻他没遇到过？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见识过？他遭受那么多挫折，受了那么多罪，他已深知民间疾苦，所以他能很好地对待他的子民。这样的人，老天都会帮助他！我们与这样的人为敌，是很难免失败的！”子玉不听，结果惨败。勾践卧薪尝胆、身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人，其夫人也自己织布做衣服，伍子胥听说了，大为震惊，寝食难安。他一再对只重视齐国轻视越国的吴王发出严重警告：“此人不死，必为国患”，齐国是疥癣，勾践才是心腹大患，力劝吴王趁勾践还没有强大，赶快彻底灭掉他。招一个树苗容易，拔棵大树可就难了。吴王不听，结果终于被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越国彻底打败，自己落了个被俘自杀身亡的可悲下场。

忧患是灾难是坏事，但若正确对待，它会成为砥砺人才的极其可贵的宝石。许多人耳熟能详的“西伯拘犍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人都是耀眼巨星，他们全都是惨遭迫害或屡罹忧患后而功成名就永垂青史的光辉人物。司马迁自己不也是在遭受了令他想起来就愧恨得汗流浹背的宫刑后，而发愤写出了光耀千古的巨篇——《史记》吗？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的确是富有哲理的结论！

三

忧患能造就人才，但绝非人人经历忧患都能成材，只有那些有理想有抱负而又自强不息的人才能成材。安乐会致人死地，但安乐也绝非能致所有身处安乐的人于死地，防患于未然的明智之士也还是有的。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的全句是：“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可见，安乐会不会导致灭亡，是有前提的，即：国内没有深明法度以法治国的士子，对国外之敌不感到有任何威胁而松

懈麻痹苟且偷安，不肯兢兢业业励精图治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才是一定要灭亡的！如果有“法家拂士”治国，又能发奋图强戒安逸，自然就不会灭亡了。孟老夫子的这些话是就国家说的，对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生于安乐而又避免安乐之害不是命定的不可改变的。事在人为。

战国时期赵国发生的一件事，就很可给人以启示。秦国来打赵国，赵向齐国求救，齐要赵以长安君为质。当时是赵太后当政，长安君是她老人家的最疼爱的儿子，她哪里舍得？谁劝说谁遭怒斥，并称：谁再想来说服我，我就唾谁。老态龙钟的触苍，好像腿很疼的样子慢腾腾地来了。他先从彼此的健康、吃饭怎么样说起，后来谈到老了，说唯一不放心的是小儿子，想死前在宫里为小儿子谋个差事以了心事。太后问，男人也爱小儿子？“嘿，比女人还厉害呢！”不可能！比女人差远了！”触说：“我看您爱燕后比爱长安君深多了。”“哪里？比长安君差多了。”触说：“爱谁不爱谁，要看是不是为他做长远打算。我看燕后出嫁的时候，您哭的那么厉害，直到她上了车，您还抓住她的脚哭。祭祀时您还祈求她不要回来，让她在那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世世为王，不是吗？”当然。”触问：“三世以前，赵王之子孙还有为侯的吗？”没有了”。又问：“不光赵，他国还有传及三代的吗？”老妇没听说还有。”触说：“这叫近者祸及自身，远者祸及子孙。并不是君主、诸侯的儿子都不好，而是因为他们位尊而无功，俸禄优厚而没做过什么实际工作，还让他们身居要职而挟重器的结果。像长安君，您给他那么高的地位，又封以最富饶的土地，还让他管那么多要害部门。而不让他为国建功立业，一旦山岭崩（您不在了），长安君还能在赵国呆得下去吗？所以我认为您爱燕后胜过爱长安君！”赵太后恍然大悟，立即决定派车百乘送长安君去做人质了。（《国策》）

专制时代给头头提个不同意见很难，弄不好要掉脑袋。触苍的“提意见法”曾为众多官员所仿效。这在民主时代不足为训，但他的道理讲的确到位。

孟老夫子的法家拂士治国与居安思危的主张，以及触苍对如何正确对待君主子弟的主张，都抓住了封建时代防止因安乐而致亡的重大的

根本的问题。

孟子和触苍所处的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那时的经济结构简单，主要的农业附有少量的手工业、商业。孟子与触苍的办法，遇到能听得进去的君主，可以管一阵子，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毕竟是个人专制的时代，是个靠人治的时代，人在政在，人去政息。因而，由忧患崛起到安乐亡国的循环往复现象，就成了难以摆脱的血腥怪圈。

四

“死于安乐”这一警告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还是有的。尤其对于脱胎于旧制度旧体制不很久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这样的国家，总是难免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旧意识与旧体制的残余与影响。而其中最重要最有害的影响之一就是特权意识，以及由于体制的缺陷，由这种意识导致的特权阶层实际上的存在。

所谓特权，主要表现为用人权以及对财与物的支配权。凡是在这三个方面，行政权力机构的成员，有超越体制享有个人专断的权力的时候，特权就出现了，腐败也就会跟踪而来。这如同蝇趋腐肉、蛆拱败鱼一样，是很自然的不可避免的。

在有特权存在的地方，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因而，所谓群众监督之类，往往就成了纸上谈兵的表面文章。

防止安乐恶性演变的关键在于消除任何人凌驾于集体之上的特权，在于社会公平与社会公正，在于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切实为民所用，为民所享。惟其如此才是釜底抽薪“塞源断根”的治本之策。为此就需要通过不断改革不断完善新经济所呼吁的新的管理体制，以完成历史所赋予的这一使命。我们已经认识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探索并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但积习太深，难度不小，成效不彰，尚任重道远。但，只要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安乐所孕育的危机，就会像一棵没有去掉引信的炸弹，不知什么时候会爆发。

当科学民主的体制能管住任何人，令任何人都无权超越制度行事的时候，全民才会脚踏实地地享受到长治久安的和谐盛世。

（责任编辑 致 中）

对《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的补正

李
鹏

我拜读了《炎黄春秋》今年4月号中的文章《军队医疗事业的奠基人贺诚》，文章讲述了贺诚将军传奇的一生，资料珍贵，很值得一读。对于29页中描写贺诚参与营救彭湃同志一部分，做一些小小的补正。

一、文中提到“由于前中央军委秘书、叛徒白鑫告密出卖，发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四人被捕的恶性事件。”第一，1929年8月24日，在沪西区新闻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二楼主持召开江苏省委军委会议时，因白鑫告密出卖被捕的共有5人，分别是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邢士贞和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不是文中所说的四个人。（见人民出版社《彭湃传》P222，中央文献出版社《浦江魂——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P123）。第二，据人民出版社《彭湃传》的生平年表，《浦江魂——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和六大的相关资料，彭湃在1928年7月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在八七会议时曾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因此，在他被捕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不是文中所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二、文中提到“8月30日清晨，敌人将彭湃、杨殷等人从拘留所解往龙华警备司令部。”这里时间有误。查人民出版社《彭湃传》P250的年表：“8月28日，彭湃等被解押往龙华国民

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央文献出版社《浦江魂——白色恐怖下的周恩来》P126：“28日一早，要把彭湃等人由警察局转移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可见，时间应为8月28日。

三、文中提到“然而后来由于送武器的人临阵畏缩，行动迟缓（此人后来叛变），加之敌人警戒森严，未能成功。”这个说法不够准确。人民出版社《彭湃传》P224根据《访问李强、柯麟记录》（1979年8月《未刊稿》）讲述事实如下：……负责运送新买枪支的，是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间，以开“三民照相馆”作掩护的同志。他把新买来的驳壳枪装在小皮箱里，驾机器脚踏车赶到了设在同字路的中央军委特科。特科的同志马上取出了枪，发现枪上涂了一层保护黄油，需要把它洗净后才能使用。于是又立即买回煤油来洗擦。洗净以后，参加营救行动的同志在李强的带领下，装扮成外出拍电影外景的队伍，乘卡车出发。这时比预定出发的时间已晚了一、二个小时。营救的地点选在枫林桥附近。这是由水仙庙看守所押送“犯人”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必经之地。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可是押送彭湃同志的囚车却一直没有到来。后来才知道，由于拖延了出发的时间，在他们赶到枫林桥附近时，押送彭湃等同志的囚车已经开过去了。

以上所写的内容，如有错误，还请批评指正。

祝《炎黄春秋》杂志越办越好！

欢迎订阅2007年《炎黄春秋》

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不唯书，不唯上，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政局(所)均可订阅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 68532048

传真：(010) 68532569

近年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每期定价：5.80元

全年定价：69.60元

如在当地邮政局(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 精品书系(第一编)再版隆重推出

1998年推出的《炎黄春秋》精品书系，系从1995年以前45期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为：《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历史迷案揭秘》、《名流写真》、《血荐轩辕》。书系出版一年后，即脱销。在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之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书系再版发行，以弥补本刊早期合订本销售之不足。

本书系全套5本，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因存书不多，恕不分卷出售)。



任鸿隽“科学”理念的社会意义

言论自由是民主的必要条件

孙冶方的“最小最大”公式

“真空罩”下：1920-30年代的苏联

涉及吴奚如平反的几封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今谈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